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 全国文明城市
- 东夷文化发祥地
-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 中国市场名城
- 中国地热城
- 中国书法名城
- 国家园林城市
-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 国家卫生城市
- 国家森林城市

图例

	市、县、区
	镇、街道
	村、居委会
	铁路
	国道、省道、县道
	乡道、村道
	河流
	湖泊
	水库
	海洋
	海岸线
	领海线



2014 · 03, 2

主 办：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
编委主任：赵爱华
编委委员：徐福田 秦鸿伟 刘广阔
李洪彦 赵建民 王长利
赵宗远 王培栋 刘兆东
李凤军 刘耀华 孙建中
李延杰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钱 进 尹传贵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韦瑞芳
朱海涛 伊永航 段 洪
于 芹 王卫东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刘兆东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本期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贾 梦
孟玉玉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轩正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1）第Q1023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萧华在沂蒙 辛鸿义 04

【峥嵘岁月】

奇兵制胜 何克希 08

“万里长征”记

——烽火岁月中的山东省立托儿所 鲁 档 13

沂中锄奸二三事 王利民 17

抗战中鲜为人知的日特“水原清实验区” 王贞勤 19

【名人素描】

读《黎玉画传》 宋元明 22

【史海撷萃】

沂蒙匪事（中） 李存葆 28

【古城旧事】

老城夜话（连载） 刘家骥 36

【探索发现】

临沂钩沉之李全一家（中） 高 雷 43

【蒙山沂水】

三月三 赶青山 孙 健 46

【典籍考辨】

东沭河源头考 平 凡 49

【文化掇英】

西汉刘疵印 高 昂 51

【影像沂蒙】

解放战争时期沂蒙略影——

潍县战役：胜利日（上）

本 编 52

【诗画赏析】

从《王琳墓志》看“颜体”演变形成（上） 佚名 54

【史料辑存】

抗战期间全国汇集山东根据地的干部名录（三） 58

【百家渊流】

姓氏百家漫谈——黄姓（下） 赵丹峰 63

【沂蒙名医】

状元手

——散记韩相珍

刘凤才 69

【文史论坛】

临沂市旧志考述（中） 解修丽 75

【沂蒙乡亲】

争议中的“草根明星”：草帽姐 高雪萍 78

【史志动态】

80

封面：西汉·刘疵印

（封面文物介绍见本期《西汉刘疵印》）

封底：金·党怀英《日照道中》/胡石 书



地 址：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0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萧华在沂蒙

辛鸿义



抗日战争时期，萧华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参加过平型关战斗。后被任命为三四三旅政治委员。1938年六七月间，奉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之命，率一批干部赴冀鲁边区，统一领导那里的抗日武装斗争。罗荣桓对此极为重视并积极支持，立即抽调一一五师补充团团长邓克明、政委符竹庭等100多人随其东行。8月27日，萧华一行到达鲁北的乐陵县城。随后成立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萧华任书记。同时整编了当地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萧华任司令员兼政委。早先到达的、由一一五师六八五团第二营组成的永兴支队为第五支队，边区地方抗日武装组成第六支队。1939年底，萧华调任鲁西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1940年，又兼任鲁西行政公署主任。

1940年6月，中央军委任命萧华为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他于9月间到鲁南师部驻地报到。从此时起到抗战胜利，他长期在沂蒙地区，协助罗荣桓开展对敌斗争，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萧华（1916—1985），江西兴国人。1928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时年仅14岁。少共国际师成立后，萧华任该师政治委员，后调任红二师政委，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参加平型关战斗，后任第343旅政治委员。1938年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创建冀鲁边抗日根据地。1940年起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15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率先遣部队进入东北辽东地区，开辟南满根据地。

1948年起任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政治委员、特种兵司令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空军政治委员、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等职。1975年后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兰州军区政治委员、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等职。1983年6月，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萧华到鲁南，正值一一五师在天宝山区的桃峪举行为时三周的高级干部会议。他在会上汇报了冀鲁边区的工作。会后，罗荣桓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号召和会议讨论的意见，在部队普遍开展建设铁的模范党军活动。铁的模范党军的要求是：（1）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不折不扣地完成党所给予的任务；（2）普遍深入地建立与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要成为爱护根据地与民主政权的模范；（3）实现高度的政治团结，建立无产阶级的友谊，自觉地遵守纪律，不断地求进步；（4）灵活、机动、果敢、坚决，发扬我军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5）坚持严肃、紧张、精细的工作作风，坚定不屈不挠的革命立场。萧华配合师部深入连队进行工作。同时，积极贯彻由罗荣桓签发的《关于营连党组织的决定》和《建立模范党军的支部工作》。在提高部队素质的基础上，根据八路军总部的要求，一一五师部队统一编成6个教导旅，共6万余人。

1941年3月上旬，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分局转移到滨海区。1941年8月1日，成立以罗荣桓为书记的新的山东军政委员会，萧华为委员。8月22日开始，在临沭县蛟龙汪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萧华根据罗荣桓的指示，起草并作了会议报告。报告全面总结了一一五师抗战四年来的政治工作和基本经验，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革命战争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战争胜利。”报告说：“军队战斗力不但取决于军事技术的高低，而且主要取决于政治工作的强弱。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战斗力，也不可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我军之所以能百战百胜，无坚不摧，成为革命战争中最优秀的铁军，就是因为有党的保证以及整个政治工作的保证。”会议开了一个多月，讨论的问题除关于政治工作的性质、基本任务及其与提高战斗力、保证胜利的关系外，还涉及政治工作的方法、政治工作人员的表率作用、政治机关联系群众以及加强部队的干部教育等。

会议期间，罗荣桓相应地向军事、供应、卫生部门提出要求：党员干部要增强党的观念，尊重党的工作机关。规定旅长、团长调动工作，都要到政治部组织部谈话和办理手续。所有党员都要参加组织生活，对政治机关提出的政治学习、支部工作等各项要求，都要积极响应，认真执行。这次会议强化了部队的政治工作，也使政工人员的思想作风获得显著提高。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军区司令员兼政



1943年，罗荣桓（右二）陈光（右三）萧华（右一）在滨海区临沭县朱樊村

治委员、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8月，朱瑞奉命回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由罗荣桓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抗日根据地完全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这时的山东分局由罗荣桓、黎玉、萧华组成（1944年增补舒同为委员），萧华从此进入山东党的领导核心。

不久，根据获得的关于日军欲进行大“扫荡”的情报，罗荣桓、黎玉、萧华联名发布《山东军区反“扫荡”紧急动员令》，部署反“扫荡”斗争。因为事先各战略区作了充分准备，只留小部分部队坚持内线，支持群众斗争，大部队都转移到外线，与内线的小部队配合，积极打击敌人。在对敌作战中，八路军取得许多重大战果。鲁中第二军分区第十一团八连的93名指战员，凭借岱崮险要，抗击了2000敌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多次进攻，取得毙伤日、伪军300余人的胜利，被山东军区授予“岱崮连”的光荣称号。11月15日，鲁南军区发起讨伐惯匪刘桂堂的战役，全歼该部，刘桂堂被击毙。19日，滨海军区发起赣榆战斗，连克赣榆县城和周围11处敌军据点，伪和平建国军七十一旅李亚藩部1600人缴械投降。不幸的是，26日凌晨，敌援军对滨海军区机关进行袭击。军区政委符竹庭在反击时受重伤。萧华闻讯后，亲自到奥地利籍医生罗生特的住处请他前往抢救，同时，又安排骑兵班护送罗生特前进。终因符竹庭伤势过重，不治而逝。12月4日，鲁中部队乘敌人移兵“扫荡”清河之机，继夏季第一次讨伐伪军吴化文部后，又发起第二次讨吴战役。经四昼夜的战斗，攻克了北沂蒙地区的东里店、大张庄、岱崮、石桥等20余处据点，歼敌800余人。直接配合了清河区的反“扫荡”。

这次反“扫荡”，于11月9日开始，至12月13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在八路军的沉重打击下，敌人策划的冬季轮回大“扫荡”，以彻底失败告终。延安《解放日报》于1944年发表题为《山东军民反“扫荡”胜利》的社论称，这次山东军民的反“扫荡”斗争，“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持久、主动、有准备、有计划，山东军民的团结一致，斗争的奋不顾身和战术的灵活机巧，在这次斗争中有了极其优良的表现”。

进入1944年春，山东抗日斗争形势有了很大好转。日本侵略军由于战线绵长、兵力严重不足，不得不收缩防线，采取重点守备。为了适应反对敌人重点主义的斗争，山东军区实施了攻势作战，相继发动了对日军的春季、夏季、秋季、冬季攻势，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同时，决定加强武装工作队，使其成为在敌占区的一种重要对敌斗争形式。为此，军区政治部于1944年11月15日，由萧华主持召开了武工队代表会议，总结交流了武工队对敌斗争的经验，规定了今后的任务和斗争策略。会议确定，针对敌人的重点主义，今后要大力加强配置在铁路两侧、大城市近郊以及敌人守备的矿山附近的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继续巩固与大量发展在伪军和伪组织内的进步势力。要提高对敌之兵站、仓库、经济团体、交通部门、重要机关等的破坏能力。敌人“扫荡”时，要以适当的特殊活动方式，对其进行打击。会议还要求队员作战时，要灵活、机警、大胆、勇敢、神出鬼没、飘忽不定，如袖中匕首、怀中利剑，让汉奸寒心，敌特丧胆。

会议期间，山东军区对鲁中泰山第一武工队、鲁南峰东武工队、滨海第四武工队、泰山区孙齐武工队、胶南海第一武工队等进行通令嘉奖，会上，还对38名模范武工队员进行奖励。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13日，罗荣桓、黎玉、萧华根据延安总部于10日至11日发出的关于向敌占区进攻的命令，联名发布动员令，号召各部队紧急动员起来，完成对敌人的最后一击，迫其投降。15日，又命令五路大军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在一个多月的大反攻作战中，山东八路军共收复县城46座，



整风学习中的萧华
(左二), 右一为
萧华夫人王新兰

烟台、威海等海口、商埠六处，歼灭日、伪军6万余人。山东的日伪军已被压缩在铁路沿线和少数孤立的城市里。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罗荣桓于9月11日收到中共中央的来电，内称：“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的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2.5万人到3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萧华前去统一指挥。”

罗荣桓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发电通知正在胶济前线指挥作战的萧华迅速赶回军区。见面之后，罗荣桓先让萧华看了中央电报。接着向他说明此次受命挺进东北意义重大，任务艰巨，勉励他要坚定决心，克服困难。至于萧华的行程安排，罗荣桓对他说：“分局已讨论决定，你可带上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等机关一部分干部，立即出发到胶东，从那里取海路去东北。至于中央要求调东北的四个师，由我来布置。”

萧华跟随罗荣桓多年，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意。罗荣桓在谈了工作之后，又关切地提示他：“过海要防备美国军舰的干涉，应身着便衣于晚上偷渡。为便于你们同中央和山东的联系，可带去一部电台，就由王新兰同志当台长。至于你们的小雨，就暂且留给我和月琴照顾吧。”罗荣桓提到的王新兰，是萧华的妻子，小雨则是他们刚满周岁的女儿。说起萧华夫妇的结合，罗荣桓还曾帮过大忙。那是在抗日战争初期，红军刚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驻三原县。年方21岁的萧华与王新兰相识，并悄悄地爱上了她，不过一直不好意思向她开口。后来听说王新兰要调往延安。她这一走，两人就要劳雁分飞，天各一方，也许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萧华着了急，便向罗荣桓求援。罗荣桓立即把王新兰叫了去，先问了她的情况，接着对她说：“我们这里有个萧华，他喜欢你，你喜欢他吗？”王新兰羞涩地点点头。罗荣桓说：“好，这件事就算定了。”1940年，王新兰随萧华被调到一一五师师部，一直受到罗荣桓夫妇的关心和照顾。

任务紧急，萧华接受了指示后，立即于当天带领一个轻便的指挥机关，踏上了赴东北的征程，从此告别了他长期战斗的沂蒙大地。

奇兵制胜

何克希



孟良崮战役发起前后，情况瞬息万变。

临蒙路反突击战役结束，野指命令我们一纵、六纵，南下鲁南，以调动重点向我进攻的敌人，制造战机，进一步打乱敌人的部署。但是六纵经卞桥进入鲁南以后，敌人除在临沂、海州间局部调整部署、准备阻止我们南下以外，正面进攻的敌人丝毫不动，仍挟其20余万人马的绝对优势，继续向沂蒙山区猛烈进犯。

南下调动敌人未成，野指立即另作部署，决定我们一纵暂不南下，计划在敌人进攻正面时，放开沂水、莒县，以部分兵力向北围攻潍县，吸引援敌围城打援。我们还没有向北开进，敌人两翼已经伸进沂蒙山区，全线摆开了“山东决战”的态势。根据新的情况，野指又重新变更计划，决心集中优势兵力，寻找敌人的弱点，集中主力围歼敌人的右翼即桂系部队第七师或第四十八师。我华野全军刚向东转移，敌人向北推进很快，中路国民党军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已经推进到蒙阴以东，坦埠以南。

七十四师是蒋介石反动军队的五大主力之一，是重点进攻山东的头一块王牌，如果消灭了七十四师，对整个战局影响巨大，可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其意义将远远超过于歼灭敌人桂系部队第七师或第四十八师。虽然任务艰巨，但野指经过多方考虑，最后决定修正部署：坚决打掉敌人这块王牌。1947年5月13日下午，我们接到野指的电话，到指挥所去受领新的任务，围歼国民党王牌七十四师。

华东野战军指挥所设在坦埠东北西王庄的一条山沟里，在千山万壑当中，非常隐蔽。指挥所里没有张挂军用地图，只摆着一张山东老乡的小矮方桌和几条破旧的小板凳。

各纵队负责同志先后到达指挥所的时候，陈、粟首长早已坐在那里，小方桌上的烟缸，已经积满了烟灰，看样子陈、粟首长在那里已经等候很久了。他们一看到我们进来，就招呼我们坐下。山洞外面，敌机盘旋不停，不时轰炸扫射；正面进攻的敌人，炮声已经清晰可闻，预示着大战将临。兄弟纵队的负责同志到齐后，陈士榘参谋长拿来一张地图，往地下一放，粟裕副司令员开始布置任务。他说：“中路敌人七十四师，孤军突出，两翼缺乏保障，我们利用结合部的空隙，一纵在右，八纵在左，向敌人的两翼穿插，把七十四师从敌人第一线八个师当中剝割出来，而后四纵、九纵南压，

作者简介

何克希，四川峨眉人。1929年参加革命。文中身份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2年逝世。

六纵由鲁南北上，我们以五个纵队的兵力，四面向里围攻，把敌人聚歼在孟良崮地区。”粟裕副司令员布置完毕，陈毅司令员又着重给我们讲述了战役的意义。他说：“敌人对陕北、山东实行重点进攻，这两个战场打不得赢，关系着我们的生死存亡，陕北战场有毛主席亲自在那里指挥，那是没有问题；可是山东战场，就全靠我们大家，当然打下去，敌人最后还是‘孔夫子搬家——少不了输（书）’。”陈、粟首长的讲话虽然保持着一贯的镇静，幽默，但是语重心长，我们大家都感到了陈、粟首长对这一次战役兢兢业业的态度。各个纵队的负责同志在接受任务后，纷纷离开野指，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考虑着本纵队的时间部署和兵力使用。当我走出野指的山沟，陈毅司令员在后面又一次叫住了我，叮嘱说：“你们一纵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一定要完成任务，你们的部队也比谁都大，四个师编制（当时中原突围的皮定均旅，暂归我纵建制，为独立师），战斗作风也好，是可以信赖的。”当时我任一纵副司令员。我迅速回到纵队司令部，纵队叶飞司令员、谭启龙副政治委员，已经把纵队的四个师长召集在指挥所里，等待着传达任务。纵队叶飞司令员一边面对着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细心地听取我的汇报，一边用红蓝铅笔轻轻地敲击着桌面。我的汇报刚停，叶飞司令员猛然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条长长的弧线，果断地说：“我们不从左边走，不从右边走，我们应当不惜代价，不惜牺牲，就是从二十五师与七十四师的中间插进去！”顺着这条红色的弧线望去，一条红色的箭头沿着沂蒙公路，从塔山、尧山，一直伸向界牌、垛庄，这是一片已经被敌七十四师、二十五师、六十五师占领的山地，全长有六十华里，把敌七十四师与二十五师一分为二。接着叶飞同志抬起头来对大家说：“我带一师、三师，割断六十五师与二十五师的联系，攻占塔山、尧山，打掉二十五师的牙齿，保证你们向纵深穿插；老何、老谭带独立师、二师抢占天马山、蛤蟆崮、界牌、垛庄，一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割断二十五师与七十四师的联系。”

四个师长战斗作风都很勇猛，大家一致赞成叶司令员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打法。我们一纵队也习惯于这种作战方法。任务布置完毕，我们纵队的几个干部，分头纵马疾驰，向部队的集结地点驰去，这已经是每次大战之前，我们几个人的照例分工。当我和谭副政委赶到南平黄土崖，天已经黑了下来，独立师的部队开始向敌人穿插，沿着崎岖的山路，忽东忽西地约摸走了一个钟头，两边的山脚下就看到了新挖的工事，远远的山头上，隐约地可以看到闪闪的灯光，头顶上不时有敌机掠空飞过。我们已经开始楔入敌人阵地了。我悄悄地对谭启龙同志说：“老谭，你看，这旁边就是敌人！”“可他们就给我们留下个穿插的空隙。”谭启龙同志非常幽默地回答我说。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东拉西拖，又累又渴，走着走着，有的战士停下不动了，站在路上打起瞌睡，直到后面的同志撞到背上，方才醒过来。有时路边出现了一条山溪，大家掏出洋瓷碗，轮着舀凉水喝，舍不得离开。独立师师长方升普同志骑在马上，前前后后跑来跑去，督促着部队迅速前进。经过了一夜的穿插，我们已经插入了敌人的纵深，根据军用地图上的标示，部队接近了天马山和蛤蟆崮。这时天也麻麻亮了，两侧山头上敌人的机枪工事尽收眼底。“得赶快抢占这一线山地，保证部队继续穿插！”我刚刚说完这句话，方师长一抖马缰，就向前卫团跑去。一会儿，信号弹升起，部队就“哗”的一下向两侧摸去。独立师到底是经过中原突围的老部队，战斗力很强，一听到枪声，精神抖擞，动作很猛，原来那一些疲惫不堪的现象霎时全部消失。我和谭启龙同志进入小曹家圈时，在一片枪声、榴弹声中，就接到方升普同志从一团打来的电话，他非常兴奋地对我们说：“敌人骄气很足，工事非常简单，我们一个冲击，已经占领了天马山、蛤蟆崮，一刀切断了二十五师与七十四师联系。”独立师开始战斗的前后，一、三师开始发起攻击。战斗打响以后，蒋军几十架飞机，几十门大炮，空军和炮兵配合，集中向我们的阵地轰击，再加上这一线都是石头大山，我们还未来得及构筑工事，飞机大炮的威力就显得格外强大，炮弹、炸弹满山爆炸，弹片、沙石到处飞舞，打得我们无法立足。在炮火和成群飞机的掩护下，敌人像一群鸭子一样向我们阵地拥来，一

师占领的塔山、尧山，又被敌人重占，三师占领的凤凰山、曹庄一线，亦遭到敌人反击，正在这各个阵地告急的时候，从重山山口飞跑过来一匹快马，二师师长刘飞同志跳下马来，气喘吁吁地对我说：“二师四、五团前进到重山山口，遭到丁宫庄敌人的阻击和飞机大炮的阻拦，被挡在山口子外面，进来不得！”二师的部队，被敌人拦住了，我们楔入的部队又被敌人拦腰切断。“这怎么能行？要想尽办法把部队带进来！”我命令道。刘飞同志执行任务非常坚决，喘息未定，又回身上马，往枪声、炮声激烈的山口奔去。

为了取得战役的胜利，独立师占领了天马山、蛤蟆崮以后，不顾面前敌人的猛烈反击和背后的第二梯队被切断，前卫一团以最先到达的五个连队，集结起来奋勇往垛庄穿插，像一把钢刀直插敌人胸膛。七十四师遭到分割以后，几万大军立即调头往垛庄回窜，沂蒙公路上骡马、车辆、部队，挤在一起，黑压压的一片向南溃退。根据情况发展，我和谭启龙同志研究决定，立即要独立师一团调头向东，横插沂蒙公路。一团接到命令以后，先头的五个连队，在长夜行军九十里后，又一口气翻过四五里路的山岗子，以六个榴弹开路，抢占了面向孟良崮丛山、紧靠沂蒙公路的二八五高地，在沂蒙公路上安下了一根铁钉，封闭了敌人向南回窜的通路。抢占二八五高地以后，仅仅半个小时，敌人立即组织集团冲锋，妄想突破这个缺口，继续南逃与二十五师靠拢。在打垮了敌人五次冲锋以后，我们的机枪全部打坏，守山的连长在敌炮火下连续向兄弟连队借了三次机枪，才稳住阵地，到打垮敌人第十次冲锋，班、排长全部负伤，山顶上指挥员只剩下连长一个，又打退了敌人的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冲锋……“挨打不叫苦！”“危急不求援！”方升普同志亲临告急的阵地指挥，子弹打光了战士以石头、枪托抗击敌人，二八五高地始终像铜墙铁壁一样，使敌人不能前进一步。

激战到傍晚，二师师长刘飞同志第二次策马前来报告，四团、五团已经分散通过重山山口，运动到大小曹家圈。我们有了后续部队，战斗这才又渐渐地缓和下来。天黑以后，纵队叶飞司令员和一师师长廖政国同志一同来到了小曹家圈，叶飞同志问我：“独立师打得怎样？”我说：“三三〇高地、二八五高地反复争夺，整整打了一天，现在两个阵地，又刚被敌人夺去。”我问他：“一师打得怎样？”他说：“塔山、尧山拿下来了，黄斗顶山区还没有拿下。”独立师和一师在沂蒙公路边上的一线山地，战斗都打得非常激烈，整个形势相当紧张。野指要求我们先插进来再往里打，现在插是插进来了，但没有力量往里打。我们交换了一下意见，叶飞同志说：“不管怎样，要完成任务，从阻击部队里抽兵！还要集中主力，向孟良崮攻击。”大胆插进去，坚决往里打，这是穿插部队应有的积极主动的精神，我和谭启龙同志都赞成这个勇敢的决定。叶飞同志抓起电话听筒，具体向各师师长交代任务，最后对一师师长廖政国同志说：“我们把主力部队都拿去攻击孟良崮了，只留给你两个地方级的三团、九团，加上你们二团，固守塔山、尧山、天马山、界牌一线，紧靠沂蒙公路的六十余里的阻击阵地，要打垮三个师敌人的增援，要保证我们顺利打下孟良崮高地，你看行吗？”每遇重大任务，叶飞同志喜欢与廖政国同志商量，因为只要廖政国同志答应下来，任何任务他都会完成得十分出色。这一次把艰巨的阻击任务交给一师，还要把一师主力抽出来攻击孟良崮，要一师圆满完成任务，是有很大困难的，但是廖政国沉默了一下，又点头答应了下来。

孟良崮战斗的第二个白天，我纵主力勇猛向东南攻击，逼近了孟良崮以西的五二〇高地、五四〇高地，右翼迂回部队八纵已经从东北打到了孟良崮以东，开始向芦山进攻，整个战役向着非常有利的形势发展。但敌人为了挽救他们战局的颓势，国民党第六十五师、二十五师、八十三师在蒋介石的亲自督饬下，疯狂地向我阵地猛攻，企图与七十四师靠拢。一师的阻击阵地情况逐渐紧张起来，60余里的阻击阵地，全线展开了激烈战斗。

三团浮山阵地西南的小高地，在六十五师猛攻下，首先告急，一师以师预备队驰援，协力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紧接着敌人拥向了三团的蛤蟆崮阵地，蛤蟆崮上杀声震天，蛤蟆



崮的形势又突然紧张，我与一师阻击指挥所曾如清政委通话，问他怎样打算，曾如清政委非常有信心地对我说：“三团缺乏大战经验，顶住敌人的进攻很不容易，师长已经决心要二团抽出部分兵力，去支援他们。”二团的一部分部队从阻击阵地上抽出来，向敌人的侧背反击。蛤蟆崮旁激烈冲杀，二团的反击打退了六十五师进攻，再次保障了三团整个阵地的安全。阻击阵地遍地硝烟弥漫，在危急中度过了一个上午。下午，二十五师猛攻九团界牌阵地，并继续攻击东界牌，我军寡不敌众撤退到天马山。敌人又猛攻天马山，以密集的队形多路冲上了天马山腰，幸遇四纵二十八团一营协助九团反击，方才打退敌人，守住阵地。但当四纵的部队继续向孟良崮攻击，敌人再度攻上了天马山腰，九团指挥所里所有的同志都打得筋疲力尽、捏着一把汗的时候，一师师长廖政国同志却响亮地向我们报告：“我们又从三团的阵地抽出一个连队，去增援九团。”三团自北而南，每人只有几发子弹，突然从敌后出击，敌人根本想不到我们还会有反击的力量，一时慌了手脚，又垮了下去。一师的指挥沉着坚定，一师的部队英勇顽强，一师各个阵地上兵力不足，一师各个阵地又互相支援，英雄的战士，以鲜血和生命，保卫着60余里的阻击阵地。

5月15日下午，野指发布了总攻的命令：所有的炮火集中轰击孟良崮大山，所有的部队向孟良崮挺进。孟良崮上碎石横飞，遍地烟火，骄横一时的蒋匪七十四师不得不开始低下头来，承受着猛烈的捶打；孟良崮上到处刀光闪闪，杀声震天，我们各路大军，逐次突破着蒋匪七十四师的阵地。我军的勇士，像潮水一样冲向敌人。在我们总攻击的时候，敌人为了挽救七十四师的被歼，从东西南北四面再次疯狂地向孟良崮靠拢。七十四师在孟良崮上固守待援，并扬言以“碾盘”战术吸住我军主力。总攻孟良崮的我军必须在敌人的援军赶到之前全歼蒋匪七十四师，才能取得战役的全胜。于是孟良崮高地的围歼战，就成为整个孟良崮战役的焦点。

总攻开始之后，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几乎每隔五分钟就要来一次电话：

“要争取时间，时间就是胜利！”

“要拿出战果，不能放走七十四师一个人！”

我们也几乎不停地用电话向他们报告情况：

“我们已经冲上了五二〇高地！”

“五二〇高地又被敌人突然在山腰里出现的重兵反击下来。”

“我们已经打上了五四〇高地的崮顶！”

“敌人崮顶上的火力，压住我们，两侧的敌人，又把我们压下山腰。”

起初我坐在电话机旁，听到铃声，再抓起听筒，与部队通话。后来铃声不绝，我索性就一直把听筒放在耳旁。经过无数次反复冲击，我纵一部分兵力占领了五二〇高地，我纵另一部分兵力，冲到五四〇高地的石圩子下面。孟良崮战斗的第三个拂晓又到了，黑夜慢慢地被黎明代替。天亮以后，困守在五四〇高地的敌人，又蠢动起来，疯狂地呼叫着：

“冲呀！杀呀！”并且洋洋得意地高喊：“天亮了，我们的援军到了，你们缴枪吧！”这时我纵组织了连续攻击，几十挺轻机枪、重机枪、几十门小炮、掷弹筒，武器挨着武器，部队挨着部队，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我军冲到了圩边。敌人也组织反复的反击，排子榴弹在突击队旁爆炸，排子六〇炮封锁着左右前后，我们的炮火只有一会儿的间歇，部队又被敌人反下了石圩。但一听到嘹亮的前进号声，又猛冲上去……

激烈的战斗，正如陈毅司令员咏孟良崮的诗句：

孟良崮上鬼神嚎，七十四师无地逃。

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

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

喜见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

16日拂晓后，我纵攻击部队占领五四〇高地，大军继续向东，最后围歼孤守在孟良崮上的敌人。这时华野全军已经攀登上所有的峭壁悬崖，控制住孟良崮所有的制高点，所有的轻重火器，全部向孟良崮高峰上倾泻，火力完全压倒了蒋军，简直听不出来蒋匪的还击。我军排山倒海地攻上了孟良崮高地，胜利的欢呼声响成一片。成群穿着草绿色军装的俘虏，放下武器，在光秃秃的山头，排起队来，沿着到处是敌人尸体和装备的巨大山谷，一批一批被带下山岭。

纵队叶飞司令员、谭启龙副政治委员风尘仆仆的脸上，才开始露出了笑容。黄昏，在华野全军协同配合下，敌人的援军仍旧被阻在周围，我们最后攻占了孟良崮和六〇〇高地，七十四师全部被歼，中将师长张灵甫也被我军击毙。

16日下午，全歼了蒋匪王牌第七十四师。北线敌人援兵五个师，南线敌人援兵六个师，都已经全部靠近垛庄。敌人已密集靠拢，不能恋战。孟良崮战役，已经取得全胜，野指决心结束战役，后撤到坦埠以北休整。敌人进占孟良崮、垛庄以后，除失去了王牌第七十四师以外，其他部队也被打得焦头烂额，被拖得疲惫不堪，只好决定全线转入防守。至此，敌人在沂蒙山区的巨大攻势暂时被迫停止，龟缩原地整整一个月未敢前进一步。



“万里长征”记

——烽火岁月中的山东省立托儿所

鲁 档

这是一次堪称壮举的大转移：一支特殊的队伍，一帮走路蹒跚的小脚妇女，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在两年又十个月的时间里，翻越崇山峻岭，涉过急流险滩，穿过敌人密集的封锁线，强渡波涛汹涌的黄海，在枪林弹雨中行程万里，进行了四次大转移，圆满完成了炮火中保护革命后代的重任，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生命赞歌。

被迫离开家园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战的全面胜利。战后的祖国大地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作为日寇重点进攻地区的齐鲁大地更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人民期待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和平、美好的家园。山东党组织为了尽快开展起战后重建工作，解脱广大中青年干部特别是妇女干部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安心于革命工作，同时妥善抚养战争期间寄养在百姓家中的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由省妇联倡办，决定建立一所托儿所。这年的11月，三个保姆（后改称保育员）怀抱五个幼小的孩子，坐上两辆装满破旧家具和衣物的胶轮大车，离开当时山东省领导机关驻地——临沂城，来到了沂河东岸的一个宁静的村庄——独树头村，安下了这个抚育革命后代的幼儿之家——山东省立托儿所。

托儿所的首任所长叫李明，他带领几个事务员从战争炸毁的庙宇瓦砾堆中，扒出倒塌的屋梁木料，做成了21张小床和几十个小板凳，找了几间民房，因陋就简，开始了平凡而伟大的保教工作。

孩子很快增加到了四五十个，从嗷嗷待哺的婴儿到五六岁的幼儿大小不等。各项规章制度也在摸索中逐步建立、完善起来。孩子们在独树头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幸福时光：没有隆隆的枪炮声、没有饥寒交迫的困窘，在和煦的阳光下自由地玩耍，按时吃饭，按时休息，医疗、免疫也都有保障。当时负责国际救济的联总人员曾多次来参观，他们看到孩子们的饮食搭配合理，营养充足，每天基本能喝到新鲜的牛奶，吃到新鲜的鸡蛋和蔬菜，也看到保育员们细心体贴的职业素养，不由心服口服：想不到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解放区的建设竟如此全面又迅速地开展了起来。

战争的阴影很快笼罩了这个宁静的村庄。1946年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大举围攻我解放区。孩子们的和平家园从此陷入动荡不安之中。枪炮声愈加近了，每天刚一黎明，保育员们就带着孩子，担着一天的饭和水，找附近隐蔽的树丛疏散。坚持了一月有余，敌机骚扰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在



负责国际救济的联总人员到托儿所视察

坚决自卫、一切服从战争需要的口号下，更多的妇女干部冲上前线，托儿所更直接、更勇敢地承担起了支援解放战争的重任。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在战火纷飞中找一片和平的土地，党组织毅然决定，托儿所向安全地带转移。

从临沂到鲁中

那是1946年一个炎热的夏日。60辆独轮小车，载着几十个孩子（还在哺乳期的有十余个），一步三回头地离开独树头村，踏上了寻找和平、寻找安宁的征程。

队伍首先向较安全的鲁中山区转移。第一天，走出没多远，倾盆大雨就哗哗而下。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小车的车轮陷进泥里无法转动。风雨交加中，大脚的保育员前拉后推，小脚的背上娃娃们，就这样陷一脚，拔一脚，天黑时终于到达一个小村庄，找了两间小屋安顿下来。大人小孩都又冷又饿，浑身上下全湿透了，保育员们照顾孩子们吃好睡下已是疲惫不堪，但为了安全，晚上还要强打精神轮流值班。

第三天，要翻过一座陡峭的高山，小车推不上去，保育员们就先把孩子们背上山，回头再下山协同民工把小车抬上去。

第四天，过沂河。河中既无桥又无船只可渡。湍急的河水深达腰际。怎么办？下水强渡！她们有的到老百姓家借来大盆，让孩子坐进去，浮水过河；有的干脆跳下水，把孩子驮在自己的肩上，一步一踉跄地涉行；有一位同志抱着孩子骑在一头借来的毛驴上渡河，不料驴欺生，把两人一同重重地摔进了河里，她置自身安危于不顾，挣扎着爬起，奋力地扑救起孩子，才长长地嘘出了一口气。

经过五天的艰苦跋涉，行程180里，到达鲁中的保护庄，因驻地太小，之后搬到涝坡庄。

1947年初，战争的硝烟蔓延到了鲁中山区，队伍在春寒料峭中又开拔到了四五十里外的沂南山区。正值春耕，托儿所的青壮年保育员自发地组织起来帮助当地生产，身体稍差些的留在驻地尽心尽力地照看孩子们。

从鲁中到胶东

住了三个月，形势更加恶化，国民党集结20万重兵进攻沂蒙山区。敌人越来越近了，距托儿所驻地不过60里，孩子们不得不又一次踏上征程，向遥远的胶东地区转移。正是孟良崮战役的前夕，黄县（今龙口）支前运粮回去的60多辆胶轮大车派上了用场，多数孩子和行李都上了大车。为避敌机空袭，一路上夜行昼伏，爬高山、穿丛林，专拣那些隐蔽的崎岖小路行走。保育员们晚上背着孩子们行军，白天还要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昼夜得不到休息。加上又值酷热的高温天气，每日骄阳似火，闷热难挡，大人孩子的体力都消耗极大，身体已濒临疲乏极限，时常有同志走着走着就突然晕倒，小孩子们则不停地哭闹。在这种情况下连续行军半个月，到达目的地乳山时，孩子不但没有一个生病的，大部分还增加了体重。

1947年9月，蒋军又恶狠狠地扑向胶东。托儿所驻地离西面敌人只有80里。党组织命令立即疏散孩子们。24日晚，乌云密布，黑漆漆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大家照例牵着大的，背着小的，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村庄，开始又一次征途。走出十余里后，天上压顶的黑云越来越密，紧接着电闪雷鸣，倾盆大雨铺天盖地地倾注而下。暴雨中，大人孩子在野外的泥浆中艰难地颠簸，走一步摔一跤，摔倒了爬起来，不等站稳又重重地滑倒，孩子们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被淹没在这山摇地动的夜晚里。挣扎中来到一条白茫茫的大河边，大家振作精神，在深达胸部的河水中手牵着手，一步一步安然渡过。幸而过河不多远就找到了一个小村庄，等给孩子们喂下热热的姜汤，安置他们睡下后，天已破晓。第二天晚上，迅速把孩子们分散到了附近村庄可靠的村民家中掩护。这时的托儿所呈高度分散状态，远的相距20多里，给安全和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强渡黄海，挺进东北

不久，国民党军队对胶东的扫荡愈加频繁。一时，阴云密布，硝烟弥漫，胶东地区也成为惊心动魄的战场。孩子们在高度分散的情况下，仍面临难于被掩护的危险。党组织果断决定，托儿所立即渡过黄海，向更安全的东北转移。

这一次的转移更可谓是在惊涛骇浪、枪林弹雨中进行的，先后历经两次强渡，才过海成功。第一次，由于船只少，组织决定只转移孩子和少数干部，大部分保育员需安插在当地百姓家中留守。这对她们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既要忍受和相依为命的孩子们生死离别的痛苦，又要冒着因口音不同会随时被敌人发现而斩首的危险。保育员们视孩子的生命高于一切，她们无条件地执行组织的命令。一面流着不舍的泪水，一面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孩子们的棉衣、口粮准备好。终于在计划出发那天的黄昏时分把一切准备妥当了，刚把一部分孩子送到船上，对面刘公岛上的敌舰就无情地开炮了，海面上顿时火光冲天，一个连一个巨大的火团咆哮着被卷起。船只不得不回头靠岸，第一次渡海计划落空。

胶东的局势越来越险恶了。半月后，组织决定再渡海。深秋的夜晚已是寒气袭人，拉着孩子们的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驶，在躲避迎面而来的一辆马车时，汽车不慎翻进沟里，两个大人、一个孩子被压死。路边掩埋了同志的尸体，大家擦去激愤的泪水，仍要握紧拳头继续前行。敌机好像嗅出了点什么，开始不停地在低空盘旋，保育员们紧张地把孩子们转移到路旁大大小小的山洞里，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洞口掩护孩子。终于来到海边了，这次全体人员都上了船。劈风斩浪，在狭小无比的船舱中经过三天三夜的颠簸，克服了呕吐、昏迷的困难，冲过了敌人密集的海上封锁线，这支历经磨难的妇孺队伍终于在辽宁大孤山（今丹东孤山镇）登陆。

到了安东（今丹东市）已是寒风凛冽，大雪纷飞的冬季。托儿所继续前行。到达通化的那天，当地的气候已达零下40度，保育员们怕孩子们冻坏了手脚，便纷纷把孩子的两手放到自己腋下，再解开自己单薄的衣襟，紧紧裹住孩子们的小脚丫。在用自己的体温温暖孩子们幼小的身体时，保育员们也給这些革命后代的心灵里照进了最灿烂的阳光。

12月初，冰天雪地中队伍到达鸭绿江边的临江城，托儿所就在这里安家度过了严冬。

回到山东

1948年春，在我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已呈强弩末梢之势。托儿所的大人孩子们都迫切地希望回到山东，回到梦牵魂绕的家乡。战火还未完全平息，他们已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南下回家的征程。

从临江到辑安（今吉林省集安市），然后顺鸭绿江漂流而下。当时搭乘的是运粮的小木船。粮食在舱里，孩子们坐在粮袋上，保育员们围坐四周。江水湍急，江风肆虐，又不时遇上急流险滩，明的暗的漩涡也是一个接一个，大家提心吊胆，一路上紧紧抓着孩子们的小手。船行了七天七夜，其间一个顽皮的小孩掏出麻袋里的黄豆塞进了耳朵，夜间风大，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避风处才点着蜡烛，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他掏了出来。

过海时夜里又遇到敌舰，相距仅四五十海里，绕过敌舰，总算在俚岛（今荣成市俚岛）登陆。不敢有丝毫喘息的时间，队伍立即开始西行转移。离开俚岛的当天，敌人就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同志们听着身后隆隆的枪炮声，无不庆幸早走了一步。

经过近三个月马不停蹄地跋涉，在炎炎的酷暑中托儿所到达益都（今青州），暂时安顿下来。

1949年5月，山东省立托儿所带着103名儿童结束了“万里长征”，终于在济南洪家楼正式安家。

两年十个月。对于今天被幸福包围着的孩子们来说，只是短短的人生一瞬，但对于经历过60多年前那段颠沛流离的生活、那次充满艰难险阻的“万里长征”的孩子们来说却是永生难忘的记忆。他们不幸生于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但庆幸的是，为了保护这些革命后代，我党领导下的托儿所即使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千里万里，也要为他们寻找一片远离战争的和平乐土。那是多么温馨的大家庭啊，保育员们不是妈妈胜似妈妈。万里征程中，颠着缠过足的小脚，风餐露宿，一路抱着背着孩子们，枪林弹雨中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着他们；每到一地安顿下来，就想方设法让幼童学习知识，没有教具，就拿树枝作笔、大地作纸，用石子教他们计算；闲暇时，教给孩子们唱革命歌曲，组织小话剧表演，还经常讲他们爸爸妈妈的斗争故事，启发这些孩子的革命斗志，教给他们勇敢和坚强。那时的保育员，没有休息日，没有一分钱的工资，每月只有少许的粮食和衣物补贴，可她们总是省吃俭用，不是贴补到孩子们身上，就是结余下来支援前线……

人们常把战争中的幼儿园比喻为战火中的摇篮。山东省立托儿所这个诞生在沂蒙山的革命摇篮，在战火硝烟的洗礼中承载着孩子们对和平及自由的无限向往，破茧成蝶，完成了它光荣的使命。

解放后，在山东省立托儿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山东省计划委员会幼儿园，继续承担起为国家培养一代又一代栋梁之材的神圣职责。

沂中锄奸二三事

王利民



八路军武工队

我是1940年7月参加工作的，1941年1月至1945年8月这四年半时间，我在沂水（沂中）县公安局历任警卫排长，区公安特派员侦察干事等职。虽然辖区内发生过或我个人经历过一些较大的事件，但岁月流逝人已晚年，我现在记忆较清的也不过有二三事。

1941年鬼子大扫荡时，日本特务头子水原清（三大特务头子之一，直属天皇领导，中将军衔）带领四五百人，先到埠前庄，后来又铜井一带活动。他打着日本共产党的旗号，所宣传的东西与共产党和八路军所说的一样，因此，老百姓对他们都有好感。实际他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利用共产党的政策破坏共产党，利用八路军的作风破坏八路军。他的任务一是挑拨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的关系；二是了解鲁中军区和山东军区领导的活动情况，放长线钓大鱼；三是搜集我军政情报。在共产党活动比较困难时，他的活动畅通无阻，对外也不保密。在敌人内部，日本鬼子的中将见了他都要立正。我们对他有怀疑，于是给他介绍了扈山区埠前庄的一个女的与他结婚，作为内线侦察他。后经日本在中国的反战同盟与日本共产党联系后，落实水原清不是日本共产党员，而是日本的大特务，最后把他抓获，在鲁中地区马牧池一带将他枪决。

1941年秋，日寇集重兵，采用“铁壁合围”战术，实行野蛮的“三光



山东省公安总局部分人员在莒南崖子村合影

政策”，对我们沂蒙山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与此同时，伪军，顽固派等反动势力也加紧侵袭和蚕食我抗日根据地。抗战到了艰苦的时期。为了打击敌伪反动势力，坚持抗战，我们不仅采取一些武力行动，也采用对敌人打进去拉出来的方法搞一些地下斗争。记得当时沂中县公安局从鲁中一团要了一个排长，叫牛衍义。因为他是伪县大队长牛仙元的叔伯侄子。郭宜春局长便派他到牛仙元手下假投降，搞内线侦察。给他的主要任务是争取牛仙元。他进去半年后当了中队长，他了解到了牛仙元的活动情报和我们内部的叛徒情报，在这方面他做了不少工作。1944年，他被牛仙元派到临沂与国民党的杂牌军打仗时牺牲了。为此事他的家属小孩受到牵连，牛衍义的老婆曾上诉到省。后来，山东省曾来人找过我两次。我为他做了证明，后来被批准为烈士。

沂水城北太平官庄的村长叫许盘明，是一起和我们搞公安工作的，他专门做瓦解敌军的工作，当时派他专与“弃暗投明”的李孝庭联系。李孝庭这个人，在日寇大扫荡前与鬼子挂上了钩。随后他跑到沂中县公安局“弃暗投明”住在公安局里，当时朱伯章经常找他谈话。在敌人大扫荡时，我们又把他派回去了。那时我们并不了解他是日本宪兵队把他派过来的。把他派回去后，他把我方的情况又提供给敌人，敌人使用苦肉计，把他打的遍体鳞伤后又把他放回来。结果在1943年秋天，许盘明在李孝庭家被敌人抓去，从沂水解到张店后被杀害。通过这一血的教训，我们再也没有和李孝庭联系。李孝庭在1943年11月也被鬼子杀了。

抗战中鲜为人知的 日特“水原清实验区”

王贞勤

在抗日根据地的边缘地区免费给群众看病、兴学，没有吃的借给粮食，营救被日寇抓走的抗日军民，日军“扫荡”时主动庇护群众……。你一定认为，这是八路军等中共武装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所作所为。其实，除了八路军，一个叫水原清的日本大特务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兴办的“水原清实验区”，在争取大众、服务群众方面做得丝毫不差，以致蒙蔽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

一个自称是“八路军朋友”的日本人

为响应大本营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政策，自1941年3月起，侵华日军在全华北开始推行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日军这个运动在战略指导上较过去有了一个基本的转变，就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其一切行动均以政治为中心，一切围绕政治。

山东境内当时有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等多支抗日劲旅，并且“十分活跃”，搞得日军狼狈不堪。因此，日军起初不惜动用重兵对山东各抗日根据地进行重点“扫荡”。没想到，山东的八路军越战越强，越“扫”越多。

日军在华北的“治安强化运动”开始后，鉴于对山东多次集结重兵“扫荡”无效，便改换了一下做法，采取多种手段，不断派遣特务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渗透。日本侵略者这种侵略方式的转变，使得山东抗日根据地隐蔽战线的对敌斗争更加复杂。

正是这个时候，一个自称是“八路军朋友”的日本人，出现在了山东鲁中抗日根据地敌我接合部的沂水县大安庄一带。这个日本人自称叫水原清，二十八九岁，中等个子，一身农民打扮，会讲点汉语。水原清称自己是日本共产党员，表示要同共产党合作，对群众不打不抓不骂，要帮群众解决困难。他经常给群众说的一句话是：“我不同意日本军阀的武士道，凶残，那个不好的，但‘王道乐土’、‘同文同种’、‘大东亚一体’是好的。”

村里人刚开始还对这个日本人“敬而远之”，不久，水原清给附近村庄的群众“帮”了两个大忙，群众开始对他“另眼相看”了。

第一件事是：库沟村有两个地下党员，一个担任伪村长，一个负责该村民兵工作。不久前，两人被敌人的便衣抓走了，乡亲们急得团团转，后来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派人找到水原清，托他给日军说说情。水原清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带着村民亲自找到日军军官，说那两人是大大的良民，他愿意提供担保。没想到，日军还真给他面子，当场就把那两人放了。水原清还亲自把他俩送回村里，两人的家属和村民们自然感激不尽。

另一件事是：日军向各村摊派粮食，小孙家庄很穷，拿不出多少粮食，村民们愁得实在没办法了，就请水原清去给“说说情”。这一次，他又爽快地答应了，往日军据点跑了一趟后，日军真的把小孙家庄的粮食给减免了。

一些群众对水原清逐渐有了好感。不久，水原清以在当地开办医院、学校需要帮手为名，在外地和本地陆陆续续找来10多个人，在大安庄设下一个据点。他们没有固定岗哨，也没有防卫设施，群众可以随时出入。日军来“扫荡”的时候，他们还允许群众躲藏到据点内，说来也怪，再凶的日军见了他们的据点也会躲着走，还真保护了不少群众。

这么一来，很多群众更加相信水原清真的是日本人中少有的好人，没事的时候总到他的据点逛逛，听他讲一些过去从未听说过的有趣的事情。偶尔，他也会有意无意地说，共产党、八路军过激了也不好，只能招来日军更大的报复，应该建立一种既没有共产党、八路军又没有日本人的“实验区”，并主张在山东大面积推广“实验区”，从而达到中日“人民”真正“合作一体”、“共存共荣”的目的。久而久之，他的话竟然引起一些群众的同感，个别群众甚至抱怨起八路军不该打鬼子。

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

随着水原清在这一带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终于引起八路军沂东敌工站站长郭中玉的注意，他将这一情况写成报告交给了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的宣传部长兼敌工部长刘子超。刘子超看过之后，一边指示上报，一边通知敌工科副科长何庆宇马上赶来。

刘子超和何庆宇仔细研究了一下水原清的事情。他们经过分析认为，水原清的出现，可能与3月份以来敌人积极推行的“强化治安运动”有关。

何庆宇根据刘子超的指示，当天下午便带一位懂日语的朝鲜族干事黎明等几人，前往沂河边的界湖镇，进一步调查了解水原清的情况。何庆宇他们到达界湖镇的碰头地点，八路军沂东敌工站的郭中玉、贺子周和沂东武工队队长邢子平已经在那里等着。经研究，他们决定马上着手抓这几项工作：一是查一下水原清的来历；二是弄清水原清的人员、武装和同他来往的人，物色、培训人员，寻机打入他的内部，达到逐步掌握、控制的目的；三是摸清水原清来到大安庄后的活动意图；四是集中力量加强群众工作，揭露其阴谋。

第二天晚上，何庆宇一行渡过沂河到达沂东武工队驻地，决定在这里活动一段时间。沂东武工队有20多人，他们个个身体强壮，机警灵活，枪法很准，一人配两支短枪。在这儿，何庆宇听说，先前那个被水原清营救出来的公开身份是伪村长的地下党员，不久前被人暗杀了，当地比较活跃的积极分子被暗杀的事还有三四起。邢子平队长分析：“我怀疑这接二连三的事，与水原清有关系，是不是水原清耍的花招？要拿出事实来揭露敌人。”

何庆宇决定悄悄抓个水原清身边的人审问一下，解开这个谜！

沂东武工队的几个小伙子就是不简单，第二天就活捉了两个水原清的送信人，并将他们押到何庆宇的面前，他们从其中一个送信人王水身上搜出了水原清写给沂水日本特务小林的一封日文信。黎明译给何庆宇他们听：“此地平安无事，我处影响扩大。不少老百姓对我们有好感，尤其是放了那两个人、减免那个穷村粮食，百姓高兴。只是便衣队杀那个通八路的村长，下手太早了，他们会怀疑是我们所为……”经过教育，王水表示了悔悟，告诉何庆宇他们，水原清的确是日军的一个大特务头子，许多日军军官见了他都要立正敬礼的。

难逃覆灭的下场

1941年8月，水原清放出风来，希望能亲自拜见八路军山东纵队副司令员王建安。纵队首长决定要敌工科先直接和他接触一下，摸清底细。经商量，决定由何庆宇、黎明和武工队的几个精干人员前往，武工队的其他人员在水原清的据点附近接应。

何庆宇他们利用夜色抵达大安庄，顺利找到水原清的住处。这是一座四合院，水原清住在堂屋里，他站在门口“欢迎”何庆宇他们。

交谈中，何庆宇单刀直入地说：“你写信要拜访王建安副司令员，王副司令员派我们来了。有什么说的，你就说吧。”

水原清说：“我钦佩司令官阁下的为人。我们先撇开日本军阀的那些话不说，我是讲友善的，联络联络，认识认识。”他操着日本腔，躬着腰，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何庆宇直截了当地用已投诚的王水作见证，狠狠揭露了他在“亲善”幌子下，抓人、放人、杀人的阴险毒辣行径。

水原清坐不住了，站起来摇着手说：“误会！误会！不是那样的。中国人就是恨日本人，不要误会我的好意。”

何庆宇要他把“好意”表现出来，他声称：愿意保持联系，提供“情报”，并保证我方联络人员的安全。

1941年秋的一天，水原清派人送来一份交王建安副司令员亲收的情报，主要讲日本华北方面军第12军所属的3个师团以及4个混成旅团正在调整部署，要向我军“扫荡”，重点是滨海地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企图迷惑八路军。为了对付敌人，我方决定将计就计，由山东纵队参谋处长罗舜初主持研究起草了给水原清的材料，说我方将参照水原清提供的情报，调整部署。虚实兼有，以造成敌人的错觉。之后，双方“情报”有来有往，打了一阵子情报“心理战”。

这年初冬，日军对沂蒙山区发动了5万多兵力的大“扫荡”。在“扫荡”中，沂东敌工站经请示上级同意，以联络方便为由，向水原清要了两个“派司”（通行证）。这是水原清的一张名片，上面写了“联络员，准予通行”，并盖了章。经使用，确有通行作用。敌人重兵“扫荡”南沂蒙期间，山东纵队的八路军持“派司”与山东分局朱瑞书记保持联系，及时向他报告有关情况。

1941年12月中旬，我反“扫荡”斗争取得了节节胜利，水原清在我方针锋相对的斗争下，感到在大安庄已经呆不住了，准备逃往有日军重点把守的沂水县城。山东纵队敌工部通过内线获悉这一情报后，经请示首长批准，决定立即抓捕水原清，并决定由何庆宇负责实施。

很快水原清就被抓获了。

后来，他在交代材料中说，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日本共产党员，而是日军的一名特务头子。他见八路军在华北“闹腾”得很厉害，便对八路军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他们常打胜仗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善于争取民心。后来，为了配合日军大本营的“大东亚共荣圈”政策和在全华北推行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他挖空心思地想出一个“不靠据点靠人心”的计策，企图同八路军展开“争取民心”的竞赛，然后逐渐“蚕食”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为此，他将这一方案上报日军大本营，日军高层十分重视，特别批准他在山东建立所谓的“水原清实验区”，待取得成效后再在全华北进行推广，同时命令山东日军全力予以配合。刚开始时，计划进展得十分顺利，他满怀信心，上司也夸奖。但后来由于种种事件相继出现，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经一个多月的审查，何庆宇他们决定将其逮捕，移交给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锄奸部。1942年秋，锄奸部根据水原清犯下的罪行，将其处决。

读《黎玉画传》

宋元明



一部杰作，凝结大家诸多心血

前不久，接到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副会长、中共山东省委原书记黎玉之子黎小弟赠送的《黎玉画传》。这是一套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人丛书，共5本，有罗荣桓、朱瑞、黎玉、陈光、萧华画传。拿起带着油墨香的《黎玉画传》翻阅，顿时令人肃然起敬。

我知道黎小弟副会长为编辑此书，可谓呕心沥血。当谈及这部书的编辑出版时，黎会长深有感触地说：1986年父亲去世，他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回忆文章、历史文献和老照片。1989年出版了《深切怀念黎玉同志》，1992年出版了《黎玉回忆录》。2006年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决定出版这本画传。光征集资料就用了好几年。这期间，黎会长走访了不少他父亲的老战友，如华楠、刘居英、孟英、李耀文等。到很多部队、党史办、档案馆查阅资料，如济南军区、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军科院档案室等，泰安市委党史办也提供了部分重要历史资料。可以说凝聚了大家的心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该书由徐向前、段君毅、王从吾、赵健民以1986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黎玉的《鞠躬尽瘁六十年》文章为代序。共分为七章：第一章，走上革命道路；第二章，投身白区斗争；第三章，发动山东抗战；第四章，坚持山东抗战；第五章，走向抗战胜利；第六章，一切为了胜利；第七章，鞠躬尽瘁为人民。收录历史照片、历史文献、地图、图表501幅，其中珍贵的历史照片261幅，有的是初次面世。这部书给人的印象是：资料准确翔实，编者精心编纂，封面设计精美，装帧清新淡雅，是一部集史料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的雅俗共赏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科书。

黎玉，知道他的人很多，能把他说清楚的人却很少。认识黎玉，可以从多种角度切入和诠释。画传会带您循着泛黄老照片的

足迹，一起探访、追寻、深思。在那些凝固着历史瞬间的照片与娓娓道来的文字中，我们得以重温黎玉的惊世传奇、精彩人生，体会他与众不同的风采与魅力。

一张名片，徂徕起义代名词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以一位党史工作者的视角仔细阅读和品味。读后掩卷思忖，感到有说不尽的崇拜和道不完的遗憾。崇拜的是：革命前辈不平凡的成长经历和丰功伟绩，是生命的辉煌；遗憾的是：老人家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也体现了生命的顽强。尤其人们说他是徂徕山起义的代名词，通过阅读你不得不自然而然地默认。

黎玉1906年生于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县）。1925年参加革命，次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共北平市委职工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北平大学法学院党支部书记、中共北平市委职工部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等职。

1936年4月，黎玉受中共北方局派遣，来山东恢复建立屡遭敌人破坏的中共山东省委，并担任书记。在黎玉等同志领导下，山东省的党组织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迅速发展和壮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部署了在山东各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工作，并派出大批党员、干部，组织领导武装起义。

山东省委转移到泰安后，在黎玉等同志直接领导下，于1938年元旦在徂徕山起义，举起了武装抗日的大旗。黎玉在回忆录中写道：“1938年1月1日，是一个我永生难以忘却的光辉的日子。起义誓师大会在大寺举行，由孙陶林同志主持。我代表山东省委宣布正式起义，起义部队命名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同时宣布了省委的决定，洪涛为支队司令，赵杰为副司令，我为政治委员，林浩为政治部主任。”当年的参加者于一川回忆说：“黎玉同志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场上报以热烈掌声。一面写有‘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的红旗高高升起，一时口号声、歌唱声、欢笑声响彻云霄，徂徕山沸腾了。”

徂徕山起义在中共党史、军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它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开启了省委独立自主领导抗战的序幕。二是起义队伍公开地打出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旗号。三是起义队伍一建立，就设立了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古田会议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而徂徕山起义队伍不仅把支部建在连上，而且在班上设立政治战士，这是党的建设上的一个创举。四是徂徕山起义为山东抗战树立了一面旗帜。1985年春，已到耄耋之年的黎玉给徂徕山起义这样题词：“徂徕山起义为山东抗日根据地树立了中心。”五是徂徕山起义建立的一支革命军队，成为敌后山东抗战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也为此后解放军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六是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和山东解放区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画传中，对徂徕山起义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花费了大量篇幅。介绍了起义的历史背景、过程、重要历史地位及深远影响。

一心一意，殚精竭虑辛勤操劳

黎玉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始人之一，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他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8年4月，黎玉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非常高兴地介绍了黎玉，高度赞扬了山东党的工作，并号召全党把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工作重点。在黎玉的请示和党中央的关怀下，大批优秀的军政干部从延安开赴山东抗日战场，是年底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山东纵队驰骋在齐鲁大



八路军第一纵队成立，黎玉（左二）、徐向前（左三）、朱瑞（左四）、陈明（左五）等合影

地上，痛击日伪军。

1940年8月，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在青驼寺召开，成立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实际上行使山东省政府的职权。黎玉任首席组长。山东省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山东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建成抗日根据地，当时在全国来说是唯一的。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中，黎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1942年冬，山东军区机关遭到日军重兵合围，黎玉率领机关和一个营的警卫部队，与万余敌军对峙。敌军在飞机、重炮配合下疯狂进攻，我军英勇反击，在打退敌军第八次进攻后胜利突围。黎玉在指挥战斗中负伤，把自己的鲜血洒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上。

1943年3月，为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委，黎玉任副政委。8月，黎玉任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9月，黎玉任中共山东分局副书记。他作为罗荣桓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担负重任，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做了大量工作，开创了崭新的局面。

1944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致电罗荣桓、黎玉的电报中指出：“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由于罗荣桓病情越来越严重，毛泽东于1945年6月9日致电罗荣桓：“病未好，甚系念。你可于休养中，在病情许可下指示大政方针，工作可多交黎玉同志办。”毛主席的信任，更增强了黎玉做好工作的信念，他的担子更重了。黎玉为即将到来的大反攻，而运筹帷幄、竭尽全力。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黎玉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8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省行政委员会第20次联席会议决定：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正式改为山东省政府，并公推黎玉为山东省政府主席。这是全国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省政府。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时，山东抗日根据地拥有2900万人口，12.5万平方公里土地。

解放战争初期，罗荣桓率主力北上，黎玉代理山东分局书记。他在积极支持主力北上的同时，以山东地方武装为基础，迅速重建山东解放军主力。不久，新四军到山东，成立



华东局，黎玉改任华东局副书记，并先后任新四军副政委兼山东军区副政委、华东军区副政委等职。他在陈毅领导下，为保卫和建设山东解放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做了大量工作，使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工商经济得到显著发展。

一往无前，经济建设再立新功

新中国建立后，黎玉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兼秘书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上海市人民政府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中央财委劳资教育组、财政组组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农业机械部、第八机械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顾问，农业机械部顾问、党组成员等职，并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三、第五、第六届常务委员。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黎玉坚决服从党的安排，能上能下，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非常认真地工作，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尤其使人感动的是，当他原来的下级成为他的直接领导时，能够诚心诚意地尊重他们，支持他们，毫无怨言地、积极自觉地完成自己分管的工作。体现出崇高的品德和虚怀若谷的胸怀。

黎玉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敢于讲真话。1959年夏初，他到湖北、河南等地检查工作，发现生产下降，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他在做了大量实地调查之后指出：“国民经济全面紧张，客观上比例法则执行不够，叫作严重失调”，“计划摊子太大了，主观性强，超过了可能性”，并提出“压缩基建项目”、“有多少米做多少饭”及“恢复日用品生产”和“搞好农业生产”的正确主张。

农业机械部成立时，黎玉任农机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当时有的干部不愿意调

农机部工作，他就耐心地说服教育，并一再强调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要重视农业机械工作。在农机部，他分管机关、干部、财务、计划等工作，任务非常繁重，很少有时间休息，但仍刻苦地钻研农机专业知识，迅速从外行变为内行。由于黎玉工作作风雷厉风行，身体渐渐多病。但他却经常抱病工作，不辞劳苦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对工作严肃认真的态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病重以后，仍十分关心农机建设。每当有农机部的同志去看望他，他总是详细地询问农业机械发展情况。

1962年6月16日，黎玉陪同周恩来总理视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6月18日，黎玉又陪同周恩来总理视察了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了解农业机械生产和使用情况。之后，在黎玉的提议和支持下，建设了一批大、中、小规模农机工厂，构成了我国农机生产的基础。并实现了在全国建800个修配厂的计划。随着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农机产品质量、数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品种也得到迅速扩大。这些成绩，是与黎玉的辛勤工作分不开的。

一身正气，高风亮节光照千秋

我一方面为黎玉感到骄傲，他早在1936年就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38年担任八路军山东人



陈毅、黎玉与美国友人

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政委，1940年担任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首席组长，可以说担任过党政军三个主要职务，为山东党、军队和政权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也为黎玉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感到惋惜。这不仅使党的事业遭受损失，而且给干部群众带来困惑。有人说，黎玉这一生实在不容易，真是只有真正的共产党员才能忍辱负重，才能在这样的环境下仍然努力工作。我有同感。

黎玉第一次受到不公正待遇是1934年。是年5月，他以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身份前往中共河北省直南特委工作，并先后兼任直南特委书记和冀鲁豫边区特委书记。当时，直南地区在敌我力量悬殊、武装斗争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开展所谓平原游击战争，使党的力量遭受严重损失。黎玉对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做法非常不满，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因此受到河北省委的批评和撤职处分。尽管如此，黎玉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讲究革命斗争策略，在濮县（今河南、山东省交界处）一带成功地领导了几次群众分粮斗争，积极慎重地发展了党的组织。不久，刘少奇来北方局担任书记。少奇同志在听取河北省委的汇报后，指出“左”倾路线的错误，肯定和支持了黎玉的意见，并取消了对他的处分。

第二次是1948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作出新四军北移山东的战略决策，并在1945年12月将山东分局改组为中共中央华东局，饶漱石任书记，黎玉任副书记。饶漱石到山东不久，即去北平参加军调部工作，后又赴东北，直到1947年1月才返回山东。这期间，黎玉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主管土改工作的副书记和山东省政府主席，按照中央《五四指示》精神，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指示》（简称“九一指示”）和《山东省政府实行土地改革的布告》、《山东省土地改革暂行条例》，领导了山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饶漱石回山东主持华东局工作后，对黎玉进行了不公正的批判，并错误地给他扣上了“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和“富农路线”等政治帽子。并“搬石头”，就是将不听话的干部撤掉。先后被撤掉的主要有：胶东区党委书记兼胶东军区暨第九纵队政委林浩、渤海区党委书记兼渤海军区政委暨第十纵队政委景晓村、渤海区党委副书记王卓如、渤海行署主任李人凤、鲁中区党委副书记霍士廉、鲁中区行署主任马馥塘等高级干部。

此时，黎玉除分管的支援前线工作外，其他的事情都被停止了。一般情况下，受冤屈之人会躺倒。但是，黎玉仍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大局下，他积极工作，没有怨言，尽一切所能组织山东民众支援前线，表现了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的坚强党性。据《山东党史资料》1985年第2期“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调查报告”一文的记载：解放战争期间，山东解放区共动员参军58.9万多人；从济南战役开始到宁、沪、杭战役结束，山东解放区共出动民工173万多人，共运送粮食8亿多斤。为了团结、为了新中国的建立，黎玉以蒙受不白之冤为代价，以牺牲自己和一大批老部下的政治生命为代价，保证了党的团结和解放事业的发展。

这一错案压在黎玉身上长达38年之久，且逢波必起。党中央对黎玉十分关心，在澄清是非的基础上，终于在1986年3月13日为其进行了彻底平反。

第三次是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黎玉任上海市委委员兼市委秘书长。在开展“三反”斗争中，上海市委于1952年2月29日决定：经华东局批准，因黎玉同志历史上一贯犯有严重错误，虽经一再教育与帮助，仍然没用改进，在上海两年多来的工作中，继续保持其一贯的家长式作风和严重的官僚主义，滥用职权，擅作威福，妨碍了市委的正确领导。在“三反”运动中，又缺乏严肃认真的检讨，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至于其兼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等兼职，则建议有关方面一并撤除。黎玉被降至劳动工资处处长。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百业待兴、人们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时候，黎玉又遭此打击，真令人难以接受。黎玉隐隐地

感到，这是山东土改的延续。但他恪守“相忍为国”的信念，又默默地承受起来。2012年10月1日，上海市委作出撤销1952年给黎玉同志撤销职务的决定，恢复其政治名誉。这个平反决定，是在他被冤枉60年、逝世26年后才作出的。

第四次是1966年。在老同志的传记和回忆录中，都隐隐约约提到了“文革”，这是一段难以磨灭的创伤。我很想知道“文革”中的黎玉，这又激起我在画传中了解他这一段历史的欲望。“文革”中，掌握大权的康生授意造反派对黎玉进行诬陷迫害，企图把他打成“叛徒”。黎玉被造反派从北京协和医院赶出，关进了“牛棚”。画传“文革”中的黎玉，面色苍老，好像疑惑不解，又像似在沉思。但他在与战友们的合影中，却显得刚毅，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粉碎“四人帮”后，黎玉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他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恩怨，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弥补“文革”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而加倍努力工作。他十分重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敢于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尽快回到工作岗位上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黎玉在临终前曾对自己的子女说：“如果党现在让我去当洋车夫，我也会无怨无悔地去做，直到生命结束。”他历尽坎坷，却敢于担当；他成就卓著，却淡泊名利。

一以贯之，老骥伏枥心系党史

黎玉退居二线后，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非常认真、刻苦地学习党的文件，积极参与党史资料的征集、撰写工作。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抢救党史资料工作中，撰写党史资料简直到废寝忘食的程度。黎玉右手落有伤残，持笔非常困难，有时手抖得厉害，一个字要写好几遍。他靠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很多宝贵的回忆文章，有的填补了党史空白。

这期间，他于1980年7月撰写了《回忆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在济南军调小组的斗争》；于1981年撰写了《山东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山东纵队的诞生和发展》；1982年5月，参加了华东七省市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1983年春，为《山东党史资料通讯》题词“深入准确活跃地探讨党史资料”；1985年6月，完成了回忆录的第一部分，等等。并为干部群众宣讲党所走过的波澜壮阔的道路和创造的辉煌历史，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告诫人们不要忘记革命前辈打天下所进行的艰苦奋斗，要让党的旗帜永不变色。充分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崇高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

黎玉还多次来济南、泰安，重走抗战之路，参观革命旧址，凭吊革命先烈。1983年，黎玉应山东省委邀请，重访徂徕山。他参观了徂徕山起义旧址，看望了起义老战士陈善。途经之处，无不详细询问政治、经济、农民生活与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并走访富裕起来的农民家庭。据泰安市政协原主席唐家品回忆：“黎玉来泰安，我参与了多次接待。老人家对泰山、徂徕山怀有深厚的感情。1983年，他在泰山游览时说，泰山拔地通天、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泰山精神就是中华精神，老人家还欣然题了词。

黎玉为党为人民兢兢业业工作了整整60年，这是革命的、战斗的60年，是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60年。正如徐向前、段君毅、王从吾、赵健民在序言中所讲的“我们深切地怀念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久经考验的优秀党员，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始人——黎玉同志。”

沂蒙匪事 (中)

李存葆

三

当我潜心研究近代沂蒙匪事时，遇到一个不能回避的史实：各路匪徒中的大头小脑，除孙氏美瑶兄弟为富家子弟外，余者几乎清一色的出自赤贫之家。按照我们惯常的阶级分析方法框之，他们应是雇农和贫农。由此，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断语：贫穷是孳生土匪的土壤，贫穷容易酿造匪患。

让我们先用历史的显影液，浸泡一下匪中大梟刘黑七，还原其为匪前的身世图像。

黑七之父刘相云是费县锅泉庄的更夫，夏秋间兼给地主看护庄稼，家中地无一垅，仅有“团瓢”（碎石垒成的葫芦状草棚）两间。刘相云儿时粗识几个方块字，年三十二仍是光棍儿一条。看坡时，刘相云曾用白石渣子在青石坡上写下扭七歪八的顺口溜，以吐腹中辛酸：“锅泉庄，出才人，才人就是刘相云，三十二岁没成亲，成亲必定是女人。”恰在这年，人称王大脚的一讨饭女来锅泉庄乞讨，与刘相云相识后自我判合。有姓无名的王大脚，单从其脚便可知其家中贫困程度。其时，在封建意识浓厚的沂蒙山区，女子不裹足，便被视为粗野放浪的贱人祸水，无人敢要敢娶。王大脚



刘黑七（右）
与日本人



不裹脚，并非不知个中利害，是因家中穷得连裹脚布都买不起。刘黑七上有两姐，下有一弟，一个山村穷更夫焉能喂饱六个“张口之兽”？刘家连方寸刀板都没有，王大脚只好用镰刀对着瓢背切菜。黑七婴儿时即随母乞讨，两姐之背成为其蹬腿挠爪的摇篮。黑七12岁时，王大脚给本村地主当了下人。经母哀求，黑七也给东家牧羊，拜老羊信唐四为师。唐四将看家本领，尽传黑七。黑七掷石击羊，不伤羊腹，只着羊角，每发必中，辄令当地羊信口叹心服。黑七肚大，饭量似牛，地主所供食物，仅充半饥，山羊啃噬青草长膘，黑七吞食野果儿果腹。费县旧俗，六月六为山神节，这年六月六，已成壮汉的黑七，又同当地羊信会聚王崮山上。叩拜山神后，打起牙祭。平日猪生生、狗活活的刘黑七，难得有顿酒饭，顷刻间便肚圆酒醉。随后，羊信们推起“牌九”，黑七大输，酒醒时死不认账，黑七拳足交加，与一羊信扭作一团。师傅唐四深觉丢脸，一脚将人贱命轻的黑七踢至崖下。王崮山崖，深达数十丈，一旦失足，定死无疑。然黑七凭借牧羊练就的攀山绝技，竟在下坠至半空时，就势抓住一簇倒悬崖壁的荆棵稳住身，遂依附层层荆丛，徐徐落脚崖下，安然逸去。

后人不得不哀叹：仁者不寿，祸害百年。

黑七坠崖未死的两年后，便以匪为业。当他将首次掠得的钱财购来鸡鸭鱼肉，提回父母蜗居的“团瓢”时，平生难有一肉之味的更夫刘相云，当即手抓嘴塞，酒肉并进，一顿饕餮，撑得肚胀如鼓，酒肉拱破如纸薄肠，疼得刘相云白汗如豆，满地翻滚，不消一个时辰，便匆匆登上鬼录。

至于自幼被卖身马戏班的赵嬷嬷，用曾时髦的话语来说是“根红苗正”。她曾在班主、师爷的棍打棒喝下翻滚、挣扎、呻吟，社会用贫穷的皮鞭过早地抽碎了她幼小的心灵，使这后来成为女匪的她心硬似铁，竟那般以兽性的疯狂对人类进行残忍的报复。

贫穷是一个庞大、无形的冷血动物，它常使一些原本安分的人在身处绝境时，因一念之差而陷进罪恶的泥淖。

蒙阴有匪首名石增福，乃桃曲村人氏。石家几代贫寒，男给富家做佣工厮徒，女给财主当婢女养娘。石增福的父母双亲为人忠厚，因贫病交加过早地撒手人寰。石增福身为长子，下有一弟两妹，生活的重轭早早地勒入他的肩胛。家住的“团瓢”四面透风，兄妹四人石条为枕，稻草为褥。石增福身高体壮，力大过人。17岁时推独轮车为货主运货，推五百斤的花生油走青口，往返几百里，别人是一推一拉双人轮替，石增福独车单人，肩不离辮，日赶夜撵，总比别人提前一天到家。1919年，他被有钱人家雇去代子从征两载，兵驻河南时娶妻。携妻回村后，生有一子。斯时当地匪患正盛，他又被邻村地主石二麻子雇去护圩放哨。在地主家吃饭时，石增福总是狼吞虎咽，提前离桌。离桌时他顺手拿两张煎饼，卷上一包豆沫子，做边吃边走状，至无人处，忙将煎饼揣入怀中。抽暇即速返家，将怀中煎饼掏给嗷嗷待哺的幼子吸食。此事终被石二麻子看破，臭骂不已，遂把石增福当家贼提防。妻儿断了食路，瘦得皮里包骨，眼看自己的饭碗将砸，全家生计无望，石增福便生投匪之念，又被石二麻子觉察。石增福被五花大绑，关进暗屋，待送官府发落。这天下午，他趁看守人不备，磨断捆绳，踹开房门，夺枪而逃，奔至费县，投靠了惯匪刘黑七。石枪法过人，又谙军事知识，很快便成为刘匪麾下的一名连长。石自感羽毛已丰，便生侈离之心，遂带领所辖匪徒返回蒙阴桃曲，占据大寨山，自为匪首……

中国是个农业文明古国。虽汉有文景之治，唐有贞观之年、开元中兴，清有康乾盛世等几番百年难遇的清穆平靖景象，但在漫漫岁月中，贫穷的幽灵始终在神州大地上徘徊。每逢战乱灾荒，近火先焦者总是农民。衮衮诸公、乱臣贼子为维系肥马轻裘浆酒霍肉的生活水准，总是将诛求无已的搜刮大网撒向天下黎民。

沂蒙虽地处偏僻，但不乏膏腴之地。那广为传播的“青山绿水多好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民歌，是对沂蒙风光的真实写照。在“土里刨食”的农耕社会中，世事若不板荡，

鸡犬桑麻、饱食暖衣的农乐图在沂蒙处处可见。民国初叶，沂蒙百姓所以陷入涸辙之鲋的困窘，是因了赋苛税重，吏治腐败。

解放后，山东省史志办及山东大学历史系曾多次组织人员，对民国年间临沂地区的赋税进行过调查，记录了百余当事者的口碑资料，赋税名目之繁多，花样之荒唐，听来令人瞠目。

当时的田赋，一年要预征数次，且年年加码。从民国初年每两正银合2元2角，到张宗昌祸鲁后期，每两正银竟飙升至19元2角。除正银外，另设地方附加税及各种苛捐杂税，计有：百户捐、牛头捐、羊只捐、羊毛捐、房屋捐、防务捐、黄河捐、飞机捐、过路捐、小车捐、篓头捐、花生捐、小榨捐、大榨捐、养儿捐、户口捐、小脚捐；屠宰税、烟酒税、丝棉税、鱼菜税、鸡狗税、发票税、行务税、树木税、集市牙行税等等；还有教育费、地方建设费，军队过境费，军队支应费……世人皆云，民国税多，由是观之，信哉斯言。

苛捐与腐败常常是一种社会并发症。那时，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其势汹汹，如恶虎扑羊；其徒济济，若飞蝗噬青。临沂县志载：“民国五年十月，县知事萧仁晖，经省议会弹劾，解省查账，所吞公款吐出，赃款无果而逃……”执法犯法者，《志》中也屡见不鲜：“十六年一月，禁烟督办方乃昌来沂，设官膏局，抽灯捐；八月，法院审判官徐鹏志诈民取财，由十七军二师党部押解赴省。”《志》中，对以此地贪官，去治彼地之民的事例，也不乏记录：“十八年二月，卸任县长周琼林一次侵吞公款四千大洋，监视数日逃去，复署临邑县（俗称北临邑，今属德州管辖）。”“二十二年六月，县法院检察官胡景清，滥罚巨款，吞没保证金，经各法团各区呈控，查实吐赃，调任他县。”……其时，旧日县衙的皂隶差役，已改为戴大盖帽的政警。政警下乡催捐征税，当差办案，各村必得杀鸡宰羊，置酒招待，并付给鞋袜费（即跑腿费）三元五元不等，否则，政警必寻衅滋事……

如此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使得沂蒙百姓室罄空悬，罗掘俱穷。张宗昌主鲁时，蒙山一带连年哀鸿遍野，饿殍载道。饥民无所不食，树皮草根，剥挖殆尽。平邑山中，有种软体白石，碾碎锅炒，略带米香味儿，四方饥民，皆来挖取，以充饥肠。然石头毕竟不是米面，饥民食后，常大便不通，腹胀而死。在费县某些村镇街头，竟出现了卖人肉者……

1928年冬，蒙阴斗方名士、代县知事左超，在呈送省府的《报灾请恤呈文》中，这样写道：“……频年以来，凶荒、兵燹、疠疫，纷至沓来，奇灾殊祸，非惟近今之世所未有，亦前古之时所未闻。死亡流离，盖已损十之五六矣。所遗残黎，强半槁项黄馘（大半人颈项枯瘦，脸色苍黄），奄奄就毙……一村之中，其死亡者，日或数人或十余人。甚至有人死求人抬村之中不能得者。送死之具，初犹用棺，继则用箔，终则箔亦用尽，割取田中禾本编之捆缚以掩埋者……自五月至八月，数月之间，死者据查已达二万三千余人，迄今犹未已焉……”此触目惊心的呈文，送达省府，竟泥牛入海。

一边是倒悬之急的债户饥民，一边却是穷奢极欲的城狐社鼠。

《山东文史资料》载，抱犊崮下的煤城枣庄，在民国时期，“虽处偏僻山野，豪华不亚都市”。尤其是中兴煤矿俱乐部里，“终年管弦丝竹，悬灯结彩，香衣鬓影，宴无虚席，军政绅商，以招妓侑酒为乐……”1925年10月，驻江苏陆军第七师蒋旅进驻临沂，上至旅长蒋毅，下到护兵马弁，军纪败坏，行同猪狗。蒋旅在临沂驻扎仅仞月，年底又奉调海州（今连云港市）。该旅以载运“军事物资”为由，向临沂县衙征调大车百余辆。可开拔时，车上竟坐着200余名丽人红袖，她们一个个穿绸裹缎，簪花戴翠，搔首弄姿，于众目睽睽之下招摇过市。可到海州不久，这批从各地诱拐来的女子，被丘八们玩腻后，或被转卖外埠，或在当地沦为娼妓……

1933年韩复榘的六十六旅驻防临沂，至“七七”事变后调防，历时五载。旅长李占标更是一淫棍色狼。时“扬州班”到临沂开设妓院，李占标将这些南国粉头花娘一一玩遍



后，又专为雏妓“开包”。开包前，老鸨为其举行合巹仪式，大肆铺张，挥金如土。更有甚者，李占标还指派心腹，以每夜陪睡50块大洋的重赏，到民间搜寻十七八岁的黄花处女，大施淫威，逼良为娼。李占标在临沂的五年里，朝朝美酒，夜夜新郎，不知糟蹋了多少处女的贞操。上行下效，李旅官兵，四处猎艳，偎翠倚红……

军阀奢靡，千金买笑，全靠搜刮民脂民膏。

一边是黎庶百姓生计无望，走投无路；一边是达官显贵纸醉金迷，花天酒地。于是，社会安定的天平便大大倾斜了。

惯匪刘黑七为匪之前，曾到青岛的车站、码头卖过一年多苦力。这山陬里走出的小小羊倌，首次目睹了一个贫富悬殊两极世界的另一极，怎能不心潮如捣。他返回锅泉庄后，对几个同伙绘声绘影地讲述了山外的花花世界后，发誓说：“我以后管的人要比这羊群还要多，非找几个大闺女当老婆不可……”《蒙阴县志》载：“蒙邑匪祸，明以前无考。”县志在陈列了明清之间仅有的几次匪患后，述道：“然罹祸虽酷，皆由外寇。而本邑之为匪者，则无也……”这足以说明，沂蒙本是民风淳朴之地。民国初叶，此地土匪如毛，实是贫穷和腐败这两个魔鬼沆瀣一气，教猱升木，逼民为匪。

刘黑七匪部中曾流传着一串歌谣：“犍牛顷地靠沙河（形容富农），不如钢枪压着脖（意即为匪）”；“要想欢，上戏班；要想玩，撑花船；要使钱，上刘团（指黑七匪伙）；要看媳妇亲兵连（亲兵连专护黑七众多的妻妾）”；“跟着师长（黑七）到处串，给个知县也不换”……在有着等级的阶级社会中，工农学商，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养家糊口、敛财聚富的手段可谓多矣，惟官吏靠权力的侵吞，土匪靠暴力的掠夺，纯属“无本生意”。前者最卑鄙，最龌龊，最无耻；后者最酷虐，最暴戾，最凶悍。但两者所攫得的金钱中，每个铜板里总有百姓含血带泪的痛苦！

对饥民来说，那是一只馒头几张煎饼便可当作旗帜挥舞的年代。当被贫穷压瘪了的百姓，即使一死也难完成对命运的抗争时，他们中的少部分人，面对物欲的诱惑，罪恶的教唆，很容易选择人生的堕落。当赵嬷嬷、孙美瑶、刘黑七们把盗旗贼幡轻轻一举，有那么多赤贫之民沦为土匪，也就不难理喻了。

四

沂蒙近代匪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怪圈。

铆焊和紧箍这个怪圈的主要链环是“官匪勾结”、“兵匪一家”。

沂蒙近代土匪，与人们惯常在唱本里、戏台上听到、看到的江湖侠客、绿林响马，迥乎其异。其时的土匪，抢劫不分贫富，杀人不分老幼，纯是社会一大公害。对这些乌合之众，只要当权者对百姓略有几分爱怜之心，降伏这些亡命之徒，虽无鹰拿燕雀之易，但也决无牵牛下井之难。

民国初时，山东军政显要从田中玉到熊炳琦，从张宗昌到韩复榘，无人不喊要剿匪，无人不嚷要缉贼，省政府年年发兵，月月进剿，匪患非但未灭，反而愈剿愈熾。

血的征剿需要鼓角，然时代的鼓角却喑哑了。在蒙山沂水间，我总算觅到了除暴安良、造福一方的两位人杰：一为爱国将领杨虎城，二是民族英雄范筑先。

1929年2月，国民革命军杨虎城部由皖北奉调临沂，旨在剿除旧军阀张宗昌的残余势力，绥靖地方。时惯匪刘黑七盘踞莒县，祸民半载有余。莒县商绅民众早闻虎城将军英名，派代表赴临沂，陈述刘匪祸莒弥天大罪，吁请杨部剿刘。虎城听罢，血脉偾张，拔剑挥军，直逼莒城。黑七亦晓虎城忠直刚烈，早已派众匪在临沂至莒县必经之路的夏庄、大店，修筑碉堡，深挖堑壕，并亲率三百余名敢死队员驻守。农历正月十四，杨部星驰而至，直取夏庄、大店。刘匪拚死顽抗，虎城志在必克。经一昼夜奋战，两据点顽匪几尽全



杨虎城对十七路军训话

毙，惟黑七带数匪狼奔莒县。逃回莒城的当晚，正是元宵节，黑七知在劫难逃，便再次剽夺城中民财，率匪部沿台潍公路向北仓皇逃遁。

虎城将军进驻莒城，目睹劫后惨状，怒火中烧，急令部队一律轻装，穷追刘匪。黑七部因女眷、财物极多，队伍臃肿，行动迟缓，见杨部追逼神速，刘匪部将女眷、财物弃之于途。杨部眼看逼近刘匪，正欲包围聚歼，不料张宗昌的残部直鲁联队师长顾震率部而来，对杨部突施截击。杨部猝不及防，官兵伤亡甚众。面对顾部的疯狂拦截，杨部处境险恶。虎城将军身先士卒，亲率警卫连冲在一线，官兵大受激励，有进无退，将顾部一举全歼……

黑七率匪伍逃亡诸城境内，又连屠数村，筑起匪窝。虎城将军侦知后，不顾连经恶战的伤亡和疲惫，又星夜率部赶至刘匪驻地，秘密对刘匪形成兜抄。关笼抓鸡，出手得卢，刘匪部桑落瓦解，一败涂地，除黑七带两个贴身护兵化妆逃匿外，众匪及眷属皆成网中之鱼。

虎城将军二月来鲁，八月调豫，戎马倥偬，时虽半载，功莫大焉。杨部不仅肃清了张宗昌残部，端掉了匪梟黑七的黑班底，还在鲁南、胶东一带，剿灭了残害百姓多年的诸如张大脸、毛大将等大小土匪十余股，虎城将军所到之处，境靖民安。

仁人志士品格如烛光，在风雨如晦的暗夜里尤显宝贵。他们总是最大限度地燃烧自己，将希望的光亮呈示给绝望的社会。因此，当他们的生命消逝后，其人格的彩虹仍会不时地在历史的屏幕上闪耀。

1933年春，临沂县因吏治腐败，群匪为虐，搅得人心惟危，民怨沸腾。省主席韩复榘来此视察时，恐生变故，急电令时任省府督察处处长、第三路军军法处处长的范筑先，来临沂兼为县长。

范公居官清廉，无出其右。到任后，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下乡查政、督学，为给区、乡省得几升草料，竟弃马学骑自行车，所到之处，一律拒摆酒宴，只食米粥菜蔬。范公生活无多嗜好，烟酒茶一概不沾。某日，范公至私立文峰小学巡视，此校乃一赵姓地主所办。赵为讨好县长，多置美酒佳肴。范公当即严词斥责，赵一再解释，此宴乃个人所设，非用公款。范县长勉强就餐，食毕交五块大洋以作饭资……上峰来人，范公不卑不



亢，不摆烟茶，待以清水，请以便饭，或让勤务到街头买两碗馄饨，或亲自带来者到饭铺叫盘包子。纵是高官显贵莅临，范公亦复如斯。即使来者不快，范公仍我行我素。

范县长禁烟禁赌禁娼，多有举措；勤政肃贪，言出法随。军阀土匪，常以烟土为伴，其时沂蒙山中，多有罂粟种植。范公知悉后，亲带随员，四处察访，将所种鸦片烟苗，铲除净尽。某日，范公率县府人员例行会操，发现征收处主任张某面黄肌瘦，疑其侵吞公款吸毒，经亲查在张某口袋里搜出白面一包，范县长着人当场将张某逮捕，查实法办。范公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每每发现，决不姑息。当他得知有数名政警下乡当差仍索要“鞋袜费”时，即令执法人员将他们各打二百军棍，当堂剥去警服，永不录用……

1934年春，早又重聚匪伍的刘黑七部，遭冀鲁豫三省国军会剿的重创后，又率残部三千从河南窜至鲁西，直趋鲁南。一时间，剿刘大军云集临沂城乡。各路人马均趁机敲诈地方钱财，县府里索要财物的副官们趑趄拥挤，不可悉数。一日，范筑先身着戎装，手持马鞭，将有恃无恐的副官们召至县大堂。范公晓之以理后，厉言正色道：“凡剿匪部队，范某只供开水、芦席，额外索取，纯属扰民。我范某现仍兼第三路军军法处处长，谁若再敢无理纠缠，休怪范某无情！”顿时，丘八们的威风为之一扫，诺诺退去……



范筑先（中间）与徐向前（左二）

刘黑七再次被逐出沂蒙后，临沂当地的小股土匪及散匪仍在滋扰百姓。范公亲率县中武装，弭盗锄奸，根除匪祸。范公勤政三载，临沂大治，社会平和宁靖，百姓乐业安居。有村夫进城柴粮未售，放诸城中桥下五日，俟下集来取，米袋仍在……

范公离任那天，城内万人空巷，百姓扶老牵幼，夹道相送。沿街门前皆摆有桌子，桌上铺着红纸。或放明镜一面，清水一盆，喻范筑先为政明如镜，清若水；或置一束青葱，一碗豆腐，喻范县长居官一清二白。范公一出县府，百姓啜泣成声。从晨至午，范公一行尚未走出三里长街。

像杨虎城将军、范筑先先生这般独步清流的耿介之士，在一个举世昏昏天下汹汹的社会中，仅靠个人品格的支撑是无力回天的。社会是那样的势利，它必然是贪婪者的大餐桌，冒险者的大赌场。

女匪赵嬷嬷所制造的八里巷惨案，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当时临沂驻有山东陆军第

五混成旅，该旅的九团就屯兵郯城。赵嬷嬷与徐大鼻子等率千余匪徒围攻八里巷时，在村外田间干活的村民们曾狂奔奔跑至驻军九团，跪请救命。该团团长戴某闻听事态严峻，边集结队伍边电话请示临沂旅部。此时，九团如发兵去救八里巷的千余村民于水火，可说是举手之劳。然而，旅部接电话者说旅长有事，九团几次催问，仍不得下文，团长只得解散待出征的队伍。第五混成旅少将旅长名李森，此人好宾客，尚宴会，喜女色，对防区内的匪患一贯熟视无睹。他给手下人立下三条铁规定：在他会客、打牌和姨太太吃喝聊天时，不得向他报事，如若违犯，严加处治。当驻郯城的九团团长给旅部打电话告急时，李森正同牌友打麻将，三小时后送走牌友，他又跟姨太太酌酒调情……这时，八里巷的代表急如星火地闯进旅部，呼天抢地哀求李森发兵。此刻，只要李森一点头，准予九团讨匪，八里巷的民众仍可免于大劫。然而，李森借口军饷未发，伸手要银，身无现银的八里巷代表答应事后交款，而李森坚持一手交银一手发兵。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一刻一时，一天一夜地过去了。八里巷民众凭借围墙与千余悍匪搏斗了近两天，圩子终被土匪攻破……

骇人听闻的八里巷惨案发生后，郯城的士绅率民众代表赴省城济南申冤。时省长熊炳奇和军务督理郑士琦，均是吴佩孚的嫡系，“二琦”靠“吴大帅”的威风作官，哪管草民死活。接到状子后，根本不予理睬。一时，省城舆论大哗。不久，消息传到北京，引起《道心报》主编张耀远的关注，张之故里乃临沂，出于对土匪、官府的愤慨和对家乡父老的同情，《道心报》连续发表“八里巷惨案”的文章，张亲撰社论，发在头版头条。社论正题为《山东盗匪如毛》，副题是“鲁南几无净土，军政大员熟视无睹”。《道心报》散发济南，省城各界声援之声日高，“二琦”这才慌了手脚，即措辞严厉地电令李森剿匪。李怕丢官，这才命令下属和各县的警备队以及地方民团全部出动，共剿赵嬷嬷。赵率众匪东逃西窜，惶惶然若过街之鼠。这天，众匪被包围在临沂城南的沟壑密林间，眼看就被聚歼。匪婆赵嬷嬷先用钱财买通了临、郯、费三县警备队，又将八千块银元交李森的教官耿某，托耿去贿赂李森及部下，央求网开一面。李森见钱眼开，枉法植私，将仅在八里巷就欠下700条人命债的罪当凌迟的赵匪婆，施以宽宥。赵嬷嬷借夜幕当即遣散数百名匪徒，仅携两个女儿及最贴心的几个干儿子化装潜逃……

人格与尊严，是构成称之为“人”的最起码且又是最崇高的元素。然而，在这里，金钱的硫酸却那样一点一滴地销蚀了官军的尊严，泯灭了李森之流的人性。为了金钱，官与匪辄是朋比为奸，兵与匪常会猫鼠同眠。

刘黑七初扯匪幡时，山东督军张宗昌，曾派装备精良的“欧营”予以剪除。但欧营奏捷归来时，俘虏的不是土匪，却是百姓的牛马猪羊……1925年，张宗昌派主力“宁旅”，会同县警备队及民团，对日见壮大的刘黑七匪部进行围剿，总算把刘黑七包抄到蒙山主峰龟蒙顶上。可当三路兵马攻上龟蒙顶时，竟不见一个匪徒。原来，黑七重金买路，从山后进剿的“宁旅”早让众匪逃之夭夭。1927年秋，张宗昌又着两团精锐对日益猖獗的刘黑七进行轮番清剿，摆出一副灭此朝食的样子。剿匪整个过程毋庸细述，仅从“雷团”与刘匪的一次“战斗”，便可尽窥个中蹊跷。其时，刘匪占据着蒙山套里的摩天岭，雷团驻扎在山下的东武安镇，兵、匪相隔八华里。早晨八九点钟许，雷团在迫击炮的掩护下接敌，炮弹声声炸裂，硝烟笼罩山岩。继而，步兵发起冲锋，山上山下，枪声响成一片，战斗显得异常激烈。午前，雷团攻上摩天岭，把刘匪打跑。官兵脱帽休息，却在帽子底下放有排排子弹。刘匪即刻反攻，官兵佯作不支退下，匪徒们上山掀开帽子，取走子弹，换上银元，复又用帽盖上。雷团二次冲锋，刘匪复又败走，官兵们各自收起帽下的银元，“战斗”遂告结束。如此反复“交火”多日，刘匪喜军火充足而游弋他乡，官兵乐钱袋鼓鼓而拨马回营……

韩复榘与土匪的勾结比之张宗昌有过之而无不及。韩的部队多吃空饷，枪支、弹药皆无定数。韩部中私卖枪弹与匪者，不乏其人。倘若说张宗昌的雷团用子弹换银元的“帽



子戏法”，尚能遮民众一时之耳目，那么韩复榘部队与土匪的枪钱互换，就显得过于明目张胆了。韩的剿匪部队常与黑七匪伙，在约定地点挖道战壕，刘匪把金银财宝放诸壕内，韩部朝天放几枪，跳进壕内取走财物，遂将枪弹置于壕中。官军一撤，刘匪即把军械取走。顽童们见韩部朝天放空枪，常尾随其后拣铜制的弹壳去换糖块吃……

在那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饥民中的地痞流氓劫枪当了土匪，“钢枪压脖”，便能掠来大批钱财；钱财不仅能使土匪于绝境中买条生路，而且能换得官军提供的枪械；有了枪械更不愁无匪兵贼马，人马多了必引起政客、军阀的关注；军阀、军棍们为在全国内战的棋盘上多一份筹码，常将已成气候的土匪收编；招安后的土匪匪性难改，此时已养痍遗患，常惹得天怒人怨，当局不得不与土匪反目为仇，再行围剿……

惯匪巨奸刘黑七，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的黑洞里钻来钻去，浮上沉下的。

刘黑七朝秦暮楚，有奶即娘。1927年冬，直系军阀张宗昌第一个给黑七戴上师长高帽，黑七部在弹冠相庆的同时，又暗通驻河南冯玉祥部的师长韩复榘，韩赠刘两千袋面粉，一万七千块大洋；黑七获利而去，却投靠了后台更硬的何应钦，何将黑七部收编为新四师；时隔年余，蒋桂冯阎中原大战，刘又倒蒋投阎，阎锡山给黑七戴上二十六军军长的桂冠；1931年，黑七脱离阎部，窜到河北大名，想法投靠了张学良；同年，黑七又窜回齐鲁，与已是山东省府主席的韩复榘再度勾结，韩将黑七部收编为山东警备军，韩、刘分任正、副总指挥，黑七部的军饷由省府供给。黑七部虽领官饷，但匪性有增无已。半年不到，韩不得不断掉已经失控的黑七部的军饷，并杀掉刘匪驻济联络处的全部人员，黑七暴怒，率匪部北窜，路过河北霸县时，掘了韩复榘的祖坟；半年后，黑七投靠伪满，被任命为第三路军总指挥，黑七趁此时机，招得千余名善骑的关外胡匪；又是半年不到，黑七脱离伪满……刘匪部此时已如无缰野马，百无禁忌，甚至在津浦线上劫火车，绑架英商。1934年春，刘匪二次窜回山东，蒋介石急电冀鲁豫三省军政，联合会剿刘匪。与黑七结下“鞭尸”之仇的韩复榘，这次才算动了真的，驻鲁部队倾巢而出，动用了飞机、大炮、铁甲车、探照灯，韩复榘亲率手枪旅的两个营，坐阵泰安指挥。此次剿刘，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然黑七及部分匪中骨干，仍漏网而逃。闹得韩复榘无颜面对国人，不得不向蒋委员长两度电请辞职……不到一年，黑七又借政局腐败之尸，还其枪多匪众之魂，继续任意荼毒生灵，草菅人命，敛钱聚财……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初，黑七匪部素常保有万名匪徒，盛时竟达三万之众。先后流窜为害鲁、豫、苏、皖、冀、津、晋、吉、辽等十几个省市，成了闻名全国的混世魔王。

是物欲与权欲锻造了“官匪勾结”、“兵匪一家”的链环。

由一个个这样的链环，铆焊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怪圈。

杨虎城、范筑先们仅靠个人品格的力量冲不破它。

历史的良知，只能在这个怪圈里哭泣……

老城夜话

(连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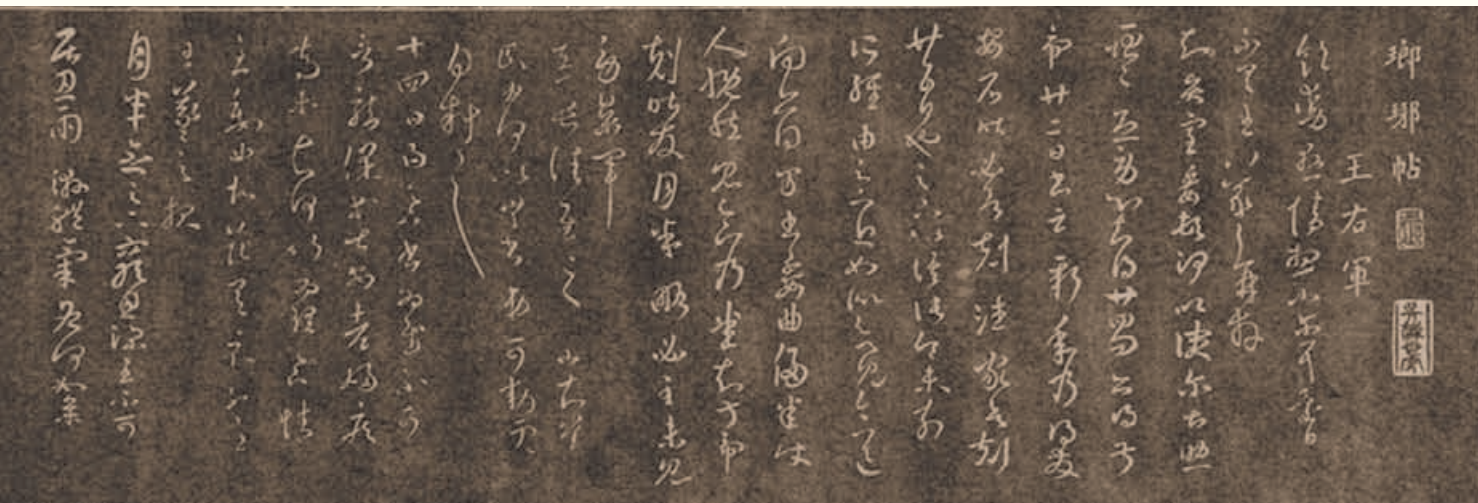
刘家骥

钱达道砚池遗爱 尹朋寿蒙山留墨

书圣王羲之在故乡的书迹，过去只有《琅邪帖》。而此帖的刻者是明万历时的沂州知府钱达道。临沂几种志书中的职官表皆将其遗漏了，但民国五年所修《临沂县志》卷十四“杂志篇”中有明万历时知府钱达道刻右军《琅邪帖》的记载。钱达道，浙江人氏，明代万历时任沂州府知府。此人非常关心临沂的名胜古迹，从《琅邪帖》的跋文中可知他去洗砚池畔寻访右军遗迹，并亲书了几块石碑：一块是“墨沼”，一块是“洗砚池”，一块是“晋王右军洗砚池”。三石碑皆立于洗砚池畔，后毁于战乱和“文革”。而今“洗砚池”、“晋王右军洗砚池”二碑重刻并建亭保护。

钱达道最大的贡献，还是翻刻了王羲之的部分书法，命名曰《琅邪帖》，此帖一直流传至今。正当他为书圣故乡无书圣书迹而感到遗憾时，他的好友临邑人邢侗赠送给他一部自己所刻的《来禽馆帖》，而此帖中正好又有王羲之的《十七帖》，这为他刻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于是他命工选石，从《十七帖》中选出部分右军书迹，共刻了六石，最后又加上他刻帖的跋文和他的幕宾周士元的一段跋文。石安放在右军祠内，供书法爱好者观赏和传拓，从此《琅邪帖》就在海内外流传。此帖刻于明万历戊戌年（1598年），至今已有400余年。

1938年日寇侵占临沂时将洗砚池古建筑作为兵营，对右军祠大加破坏。其中一石断裂为二，1945年临沂解放后，民主政府将其移于五贤祠保护，



1947年国民党军队又将五贤祠当作马号，此帖又遭破坏。1948年二次解放后移于烈士陵园加以保护，1950年又迁回五贤祠，并建碑廊加以保护。1961年请工拓裱了百部。遗憾的是1966年“文革”之役，此帖被毁，如今只剩残石数块，保存在市博物馆。

改革开放后，1979年市博物馆据拓本又重新翻刻，拓裱了多部。2003年重修王羲之故居右军祠时，又将此帖重刻。这次参考了《来禽馆帖》、宋拓《十七帖》、《绛帖》、《星凤楼帖》，按原文重新上石，使书迹更接近古帖。此石依然存放于五贤祠。

临沂在上世纪30年代闹匪患时，住城外的富户多迁居城内避乱。他们有的在城内有自己的宅子，没有的就租房住。话说迁到城内的东墀王氏家族的一家，住在营坊街庙后的城宅里，搬家时运来了一批硬木家具和一批古书字画。他家的孩子皆在教堂耀汉小学上学，后来得知他们是王薪传的族人，其所藏字画多为王薪传儿子王景禧的作品。这批字画至今还散落在民间。

王薪传，字一卿，号荷樵，是辛酉科（1861年）拔贡，同治庚午科（1870年）举人，曾做过河南襄城县知县。他擅书法，尤以颜体最佳，还喜收藏各种碑帖，对研究费县的古迹名胜做过不少贡献。他与王思衍最为知己，故兰陵的一些碑刻多请他书写。他重家教，子弟从小皆读书写字，其子王景禧即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王景禧（1867—1932年），字燕泉，又字石荪。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庚寅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兼国使馆协修，直隶学校司总办，后在多种教育部门任职。

王景禧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出生于费县的东墀村，当然费县将他作为费县的名人。后费县划给临沂，所以临沂的名人中也有他。他与兖州牛震震家族的女儿结婚，牛家要求必须住在兖州，故他又成了兖州人。滕州火车站的“孔子故里碑”和“孟子故里碑”即为其所书。兖州的名人中自然也有他。民国后他寓居天津，以著名书法家著称于津，所以天津的名人中自然也有他，后来死在天津。死后费县东墀欲运其回祖林安葬，但由于其夫人在兖州，只好葬在兖州了。

他的书法传世很多，和他父亲一样也是以颜体见长，在天津的拍卖图录中经常见到他的作品。

进德会首放电影 张家园初设戏院

临沂的影像娱乐业，民间是以皮影戏开始的。当时城内还没有皮影艺人，演出的都是从外地来的。上世纪20年代天主教堂买进了一部幻灯机，当时还没有电灯，用的是汽灯，在教堂院内播放《圣经故事》的幻灯片。这故事片配有解说和音乐，一时间市民争相观看，有的人连看数日。

1933年，为了响应省府主席韩复榘的号召，城内驻军会同地方政府筹备成立“进德会”，1934年7月1日“进德会”正式成立。成立大会会场设在关岳庙（原北大寺）。后将北大寺的戏楼改为舞台，从此开京剧演出对外售票之先河。有时候没有演员，没法演出，于是就引进了电影放映机放电影。由于临沂当时没有电厂，只好买了一台柴油发电机发电。当时已有黑白有声电影片了，市民大开眼界，称作“洋影子戏”，以后又称“玩电影片的”。当时的片子需从外地租来，一部片放映几天后就要送回去，然后再租新片。片子的内容主要是戏剧片和故事片。戏剧片多是名演员所演，如梅兰芳等四大名旦和马连良名老生的演出，其中有梅兰芳的《天女散花》、《廉锦枫》、《林黛玉葬花》，尚小云的《昭君出塞》，荀慧生的《西厢记》、《雷雨》、《茶花女》、《清宫秘史》等。有时也放时事记录片，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放过一次十九路军上海抗日的记录片，它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特别青年学生们更是受到鼓舞。

好景不长。1938年日寇占领临沂时，一把大火将进德会连同博物馆、图书馆的一系列文化设施夷为平地，直到解放后1951年，临沂开始建立电影放映队，人们才又重新看上了电影。后来建起了露天电影院。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需求，1951年又开始筹建电影院，1958年10月1日正式建成启用，放映的第一部国产片是《她爱上了故乡》。1966年临沂电影院改名为“东方红影院”，直到现在。

上世纪30年代前，临沂人看戏主要是到庙会。当时没有固定的戏院，一年中各寺庙皆有庙会，逢会必须唱戏“赛神”。天旱求雨要唱，如果下了雨还要唱谢雨戏。哪家商号失了火，事后还要给火神唱戏，一年到头不断，这也给人们创造了为数不少的看戏机会。

自从成立了进德会，开始有戏院，人们可到固定的地方去看戏了。当时的临沂还有一处戏院，那就是“张家大园戏院”，位置在古城的东南角，原是菜园地，故称张家大园。后来被人买下建成一个戏院，它是本城的第一个戏院，它是集资建成的，共投资5000元。1935年正式建成，5月5日正式演出。聘请演员昆角是杨金红，武生是丁昆山，文武老生佟西臣，名丑耿永奎。第一场戏演的是《玉堂春》，开始时座无虚席。后来本地何家班培养的演员何艳芳演青衣花旦，何麟童演武生，出台演出时引起轰动。这个戏院的演员有时被外地请去演出，戏院只好停演。为不空场，戏院也从外地租来影片放电影。此时城内已有了电厂，可以供电，故放电影甚是方便。有时新片未来到，就请杂技艺人表演杂技，请曲艺艺人表演曲艺。主要由本地的渔鼓、扬琴，还有外地来的京韵大鼓，总之是不让院子空着。这个戏院也是1938年被日寇摧毁的。

解放后这里建起职工俱乐部，成为劳动人民的娱乐场所。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职工俱乐部

苏州裱引进临沂 曲阜拓流传至今

临沂历代书画先贤辈出，留下了大量的书画作品，这些作品被装裱成各种形式的册页卷轴，有的一直流传至今。这些书画的装裱者到底是何人呢？从几家书画收藏大户可知其详。原来临沂的世家大户，自己皆聘有装裱师，像尹开勋、王思衍、密云路、庄希堂、吴小岩等名家，他们既是书画家，又是收藏家，他们家中常年聘着装裱师。听其后人讲，这些装裱师多来自济南和潍坊，战乱时他们就回家乡去了。

至上世纪30年代初，仁泰号和德生号两家杂货店的儒商蒋幼泉和赵鸿泰，合伙经营了一家南纸店，既经营各种宣纸又经营纸扇。因纸扇须装股，他们就从杭州请来了装扇师



荣宝斋装裱

傅。后来生意扩大，又请来了一位书画装裱师。此人姓叶，名诚斋，苏州人，手艺甚高。他用料考究，锦、绫、绢皆用湖州所织。他后来自己设计制作了一张朱红色的大案，上涂瓦灰和桐油，最后用桐油和银朱涂在表面。他装裱书画的轴杆皆是杉木，轴头也很讲究，有红木、青花瓷、象牙等料的。这套用料和用具让当地人大开眼界。

叶师傅来后，首先为蒋、赵两家所藏的旧字画进行了装裱，装裱后的字画焕然一新。几幅条幅全是宣和裱，全部套小边带晾燕，包首皆用耿绢。他为蒋家祖先画的一山水长卷装裱，用的是锦包首，花绫引首，黄绢隔水，花绫小边，引首和后跋皆用的玉版宣，轴顶用的白玉，别子用象牙，题签用洒金纸，装后显得十分高贵。高超的手艺很快让他在临沂声名鹊起。后来，他为临沂人修复装裱了几幅名贵的书画。记得有胡季方所藏的《汪谦九老图》，杜軫家藏的《明人罗汉图卷》，尹开勋家藏的《宋元明画册页》、《明拓玉版十三行》，王燕谋家藏的《何绍基册页》，韩春生家藏的《恽南田花卉条幅》。他还特别善裱集锦书画，因集锦书画多折扇面和团扇面及斗方，故只能挖裱而不能镶裱，所以是非技术过硬不能胜任。

这位叶师傅的手艺，只有少数临沂人跟他学习。等他走后，像孟季华、赵次和等人，也只能裱些小件，装裱碑帖一类的小活。随着日寇侵占临沂，叶师傅回原籍后，这种精细的苏州裱也逐渐消失了。

北京裱在临沂也甚有影响。1976年金雀山汉墓帛画出土后，请来了故宫博物院的装裱师张耀宣先生揭取帛画。他对有关书画家介绍了揭取古书画的常识。后来帛画运京，同去故宫的工作者又向他进行更深入的学习。不久莒县城阳书画社又请来了北京荣宝斋的老技师赵兴煜先生进行传艺，王小古老师又派赵仲三老师前去学习。从此荣宝斋的裱画技术又传到了临沂。

上世纪80年代末，地区物资局的姜正林先生退休后又重操旧业，开始了他苏州裱的传播。他本江苏扬州人，自少年即学习苏州裱。他开业后，从用料和工具皆是亲自去湖州挑选。制作浆糊，他要亲自磨面。他手艺熟练，做工认真，故他装裱的书画甚受人们欢迎，从此他的技艺在临沂传播，苏州裱的技术又在临沂大放异彩。

临沂是汉画像石和历代名碑帖保存最多的名市，这些刻石的文化艺术自古以来是要靠传拓技术对外传播的。临沂的名碑《集柳碑》，明代时的拓片即被权相严嵩所收藏。《诸葛子恒平陈颂》被多种碑帖著作所刊载。这些拓片即为当时人所传拓。

自清代以来，外地来临沂拓碑的多是碑帖商，其中来的最多的是西安碑帖商、洛阳碑

帖商和曲阜碑帖商。这些人来多住在普照寺，每日传拓《集柳碑》和《北齐造像题记》等碑刻。来的最长久的是曲阜的碑帖商。从此他们的拓碑技术也传给了临沂。

当时曲阜的技术和工具还是老一套的。闷纸用胶矾水，朴子用猪尿泡包瘪谷。这种工具和技术也教会了普照寺的和尚和传拓爱好者。自1938年后，《集柳碑》遭到日寇的破坏，曲阜碑帖商再也没来临沂。临沂人很少有学拓碑者。1961年为拓《琅琊集柳碑》，又请来了济南的技师，他们的手艺基本也是曲阜拓的手艺。

“文革”结束后，文物工作又开始复兴起来了，急需拓碑技术人才。1978年国家文物局在泰安举办石刻培训班，从北京请来了马保山、张明善两位老专家传授拓碑技艺。临沂当时也有文物工作者参加培训，跟两位专家学来了北京拓的技术，从工具到技术都有了改进。首先从保护文物角度出发，一律用“清水拓”，废掉了用胶矾水的旧法，这样既保护了古碑刻，又使新拓片更容易保存。朴子也进行了改进，用塑料纸包棉花，再加清水毡，这样的朴子既实用，效果又好。从此传来了拓古器物的技术，使临沂的传拓技术面目一新。

破“毛人”安定民心 捉“飞贼”肃清匪特

临沂自1948年二次解放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百姓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但是原盘踞在临沂的王洪九匪部的残余仍在暗中活动。上世纪50年代初，他们四处造谣说是从东海上来了一批“水鬼毛人”，夜间到居民家去喝人血挖人心，有的匪徒夜间到农村装神弄鬼，恐吓群众，有些坏分子更乘机造谣说：“水鬼毛人是铜手铁指甲，通身长着长毛”。一时间在城乡居民中造成了恐慌，家家皆不敢眠，甚至几家集体住在一起，通夜点灯至天明。一些村还集资买了些铁制武器进行防卫。造成了城乡居民的严重不安，影响了社会安定和生产。

当时的县委、县政府立即开会，研究措施安定民心。同时派出大批工作组深入农村进行辟谣，公安干警全体出动，配合工作组严查造谣生事的匪徒和乘机搞破坏的人。

经过工作组耐心细致的工作，王洪九残匪逐渐被揭穿，抓捕了造谣生事的匪徒和乘机捣乱的反动道会门的头目，同时还有乘机偷盗的盗贼和乘机卖灯油的奸商。真相大明后，群众也提高了觉悟。至1953年八九月份后，“水鬼毛人”事件就结束了，从此城乡居民又恢复安定，社会生活一切正常，敌人搞破坏的阴谋就彻底失败了。

上世纪50年代初，临沂除了“水鬼毛人事件”外，还有一个“飞贼”事件，也是闹得人心不安。

原王洪九匪部在1948年逃跑时，留下了一个排的匪徒潜伏在茶山，解放后不久即被我当时的县大队将这帮打家劫舍的土匪消灭了，但有一个漏网的匪徒，那就是“飞贼”张俊海。张是费县探沂石行村人，自幼不务正业，后来当了土匪，练就了一手好枪法，同时此人善于翻墙越屋夜间奔跑，在当地号称“飞毛腿”。土匪司令王洪九招兵买马之际，他又投靠了王洪九，王洪九即将他安置在“暗杀团”。从此这个匪徒跟着王洪九作恶，不知暗杀了多少好人。1948年王洪九逃跑时，把他留在了临沂。

潜伏在茶山的土匪被消灭后，张俊海只身逃出，昼伏夜出，继续作恶。他佩有双枪，有八个窝点，窝主皆是与他鬼混的女人。他的活动范围是从茶山到临沂城，再从临沂城至郯城，郯城至新沂、苍山。

这个匪徒杀人越货，抢人财物。他首先杀了从新沂回家过年的全光荣和他母亲。他选择的时间是正月十五的夜晚，因大家皆放鞭炮，他的枪声不被人注意。他杀人后抢了财物即逃往新沂，从此在南北线上继续作案。一时间人心恐慌，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

政府非常重视张贼杀人抢劫案。当时的地区公安处、县公安局马上组织力量调查案

情，找线索，一定要抓到“飞贼”。当时有人说他“行走如风”，从临沂可一夜到新沂。经调查果然如此，晚上在临沂作了案，第二天就在新沂发现了他的行踪。难道说他真的跑得这么快吗？经仔细侦察，发现他原来是潜伏在公路旁，有汽车经过时他就爬上汽车。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基本掌握了“飞贼”的行踪，公安部门准备收网了。

抓捕“飞贼”有一个原则：因他枪法准，要求不要被他伤到一个人，而且要抓活的。

“飞贼”张俊海把抢的钱财大肆挥霍，除了在新沂吃喝玩乐外，他还爬火车去徐州寻欢作乐。他在新沂、郯城、茶山包养了几个女人，作为他的窝点，他不固定地在这些女人家中藏身，因此几次抓捕都扑了空。

1952年2月，抓捕“飞贼”的机会终于到了。这个“飞贼”有三好：好色、好酒、好洗澡。原来此贼每到一处一定要去澡堂洗澡。于是，新沂、郯城、苍山等各澡堂皆有我们的埋伏。这次他又到苍山县城澡堂去洗澡。有两个公安战士过去干过澡堂搓背工，他们就在澡堂重操旧业。“飞贼”张俊海警惕性很高，一听到有临沂口音的人就马上离开。这次他一听皆是苍山口音，于是放了心，将双枪放进皮包，下池洗澡去了。当他正趴着搓背时，只听搓背工大吼一声“抓捕”，几个公安人员一拥而上，在背面将他双手铐住，这个作恶多端的匪徒终于落网了，没费一枪一弹，没伤着一个人。给他加上了十八斤的大镣后，当天即用汽车将他押回临沂。

不久，在今东方红影院护城河南岸的广场上召开了“飞贼”张俊海公判大会，县公安局的领导陈海涛、彭玉陪等人将张俊海及窝主交给了法庭，将其押上了审判台，法庭公布了犯人的罪行，同时宣判，判处张俊海死刑。

这真是大快人心之事。城乡居民闻讯后，皆来观看“飞贼”的末日。公判后将其押往他作恶最多的地方义堂乡进行处决，从此城乡居民们再也不用担心夜间来“飞贼”了（本节资料由当事人、原临沂县公安局副局长彭玉陪提供）。

旧社会一去不返 新中国万年常青

进入21世纪的临沂，已是气象万千，一派物阜民丰、国泰民安的景象。在这百年间发生了数不清的变化。旧社会带给人们的痛苦一去不复返了。过去的饥民遍地饿殍卧街的现象再也见不到了，城四角的棚房也被高楼大厦替代了。更值得一提的是人的变化和习俗的改变。

男人留辫子、女人裹小脚的陋习彻底不见了。现在，除了9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外，再也看不见小脚了。

八种社会陋习也消失了。如各种鸦片烟馆、大小赌场、妓女院，这些丑恶的现象是一去不复返了。公开纳妾和童养媳的现象也不存在了。由于有了社会保障，再也没有喊街的人了。“青黄不接”时也没有卖儿女的了。再也见不到了衣不遮体的人了。

更重要的是医疗条件的改善，死人的现象大大减少了。新法接生的普及，再也见不到官地扔小死孩的现象了。

还有更重要的是人权得到了保障，人身得到了自由。人们可以自由出入临沂城了，曾记否，日伪时期施行“良民证”，出入城门要有“良民证”，没证者一概不准出入，周围农村的村民由于没有良民证，抗战八年间他们从未进过一次城。更有甚者还是王洪九统治时期，他继承了日伪衣钵，继续施行“良民证”制，而且还分成两种，普通居民是蓝色的良民证，共产党的烈军属和街道干部则是红“良民证”，持红“良民证”者出入城门被查得更严。这种罪恶的制度至到1948年临沂解放后才彻底废除。

过去，教育不普及，文盲特别是妇女文盲众多，而今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已基本消灭了文盲。



临沂人民庆祝新中国成立

过去的临沂城只有南门里大街一条石铺路，其余全部是土路，每逢下雨泥泞满地，现在已全部是硬化的路了，市民也不用买胶鞋了。

过去临沂城夜晚一片黑暗，出门要打灯笼，现在是不夜城，灯笼铺也永远消失了。

居民现在已全部实现了电气化，生活方式已是现代化。过去的交通工具皆进入到博物馆，好多生活用具也进入了博物馆。

医疗条件的改善，过去流行的一些疾病也消失了，现在街上见不到麻子脸了，因为天花病已经消失了。人们有病去医院，再也没人去送“瘟神”了。

有了消防部队，健全了消防设施，群众不用再去敬“火神”了。

过去从临沂到昆明要走一年，现在乘飞机只要两小时即可到达。

过去是“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人们生活和医疗条件的提高，70岁已不再稀有了，百岁老人也不稀奇了。

回忆过去，展望未来，不能不使人浮想联翩，过去的事物要写入史册，使人不能忘记。了解过去，展望未来，更能使人振奋精神，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临沂和全国一样，其未来将更加辉煌。



临沂钩沉之李全一家 (中)

高 雷

杨妙真，亦称“四娘子”。李全流寇山东之时迎娶的押寨夫人。《大金国志·宣宗纪》：“其（李全）妻亦勇而有力，少为群盗，在山东聚众万人，能飞马植枪，深入一尺，令全飞马而拔之，全不能拔，下马屈服，遂为夫妇”。杨妙真生于淄青交界之处的杨家堡，为巨盗杨安儿的妹妹。《两朝纲目备要》中说：

“先是，有杨安儿者，李全之妇翁也。见金人政乱，起兵叛之，践踏山东数郡，依山负海，时出时入。”《宋史》上记载：杨安儿兵败被杀后，“安儿妹四娘子狡悍善骑射，刘全收溃卒奉而统之，称曰‘姑姑’，众尚万余，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众附，杨氏通焉，遂嫁之。”李全的归附，既有武艺略逊一筹，也有势利地屈人之下的原因。他们的联姻是一种历史的机遇，也为山东盗匪向宋朝民兵转变打下了基础。

宋朝嘉定十一年（1218年）李全偕杨妙真带领部属移居淮河下游就食。“宝货山积，而不得食，相率食人。”不得已投靠宋朝，被改编为忠义军。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李全受宋军淮东前线指挥部派遣率部与金四驸马阿海战于化陂湖，大捷，杀金数将，得阿海金牌。被宋廷进封为达州刺史，杨妙真也因此被封为令人。令人是宋朝命妇的第五个等级的封号，一种相当高的荣誉称号。



嘉定十五年（1222年）李全驱逐张林，率军进入青州。此时，杨妙真留守楚州。

“十六年二月，（贾）涉劝农出郊，暮归入门，忠义军遮道，涉使人语杨氏，杨氏驰出门，佯怒忠义而挥之，道开，涉乃入城。自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被召。卒。”（《宋史》）贾涉时为淮东制置使，是杨妙真的直接上司，通过这件事情显示了杨妙真的计谋与威望，也暴露了李全夫妇的狼子野心。从此，李全夫妇与宋王朝的矛盾逐渐加深。“十七年正月，（许）国之镇，杨氏郊迓国，辞不见，杨氏惭以归。（许）国既视事，痛抑北军，有与南军竞者，无曲直偏坐之，犒赆十裁七八”。（《宋史》）“十一月，国集两淮马步军十三万，大阅楚城之外，以挫北人之心。杨氏及军校留者恐其图己，内自为备”。

（《宋史》）“后（李）全遣庆福还楚作乱，适湖州潘壬事败，全党益不安。或教杨氏畜一妄男子，指谓人曰：‘此宗室也。’且语僚佐曰：‘会令汝为朝士。’”（《宋史纪事本末》）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二月，楚州杨妙真部作乱。淮东制置使许国自缢，“乱兵悉害其家人，纵火焚官寺，两司积蓄，尽为贼有。”（《宋史纪事本末》）李全夫妇对宋朝派遣的长官玩于掌中，宋廷仍然羁縻承奉，由其坐大。

五月“戊寅，刘全以券易制司钱，不如欲，复谋乱，杨氏出二千缗解之，乃止。”（《宋史纪事本末》）

宝庆二年（1226年）李全被蒙古军孛鲁围困于青州。楚州得到的信息，李全已死。宋淮东制置使刘瑄欲乘机消灭杨妙真及其统领的部众。“瑄令夏全盛陈兵楚城，李全之党震恐，李全妻杨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将军非山东归附耶？狐死兔悲，李氏灭，夏氏宁独存？愿将军垂盼。”全诺。杨氏盛饰出迎，与按行营垒，曰：“人传三哥死，吾一妇人，安能自立？便当事太尉为夫，子女玉帛、干戈仓廩，皆太尉有，望即领此，诚无多言也。”夏全心动，乃置酒欢甚，饮酣，就寝如归，转仇为好，反与福谋逐瑄矣。”（《宋史纪事本末》）此段的精彩之处在于：乞求——“愿将军垂盼”；许诺——“当事太尉为夫”；贴现——“就寝如归”。这种道德污点无论如何权变，也是歪门邪道，为世人所不齿。

“辛卯，夏全令贼党围州治。焚官民舍，杀守藏吏，取货物。时瑄精兵尚万余，窘束不能发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缒城，仅以身免。镇江军与贼战死者太半，将校多死，器甲钱粟悉为贼有。”（《宋史》）刘瑄夜半缒城，只身逃往扬州。夏全逐走刘瑄后，杨妙真又将他拒之门外，夏全只好出楚州，后投附金朝。

宝庆三年（1227年）姚翀为淮东制置使，宋廷因姚翀与李全关系特殊，所以下达了这项任命。《齐东野语》记载：“时李全犹未还，王义深、国安用为权司。刘庆福与张甫谋就楚之淮河缚大浮桥。或告李姑姑以二人欲以州献金人，姑姑即遣人请姚议事，不获已而往，则大厅已设四果卓，余二客则庆福及甫也。庆福先至，姑姑云：‘哥哥不快，可去问则个。’谓李福也。时福卧于密室，凡迂曲数四乃至。庆福至榻前云：‘哥哥没甚事？’福云：‘烦恼得恁地。’刘觐福榻有剑出，稍心动，亟出，福急挥剑中其脑。既而甫至，于外呼云：“总管没什事否？”福隐身门左，俟其入，即挥剑，又仆之，福遂携二首以出，乃大张乐，剧饮。姚遂揭榜，以刘、张欲谋作逆，密奉朝旨已行诛戮，乃闻于朝。李福增秩，姑姑（杨妙真）赐金，进封楚国夫人。”

杨妙真之流饱则用命，饥则噬人。姚翀亦难免复蹈前人旧辙。六月，因忠义钱粮不济，大难临头，被杨妙真逼死。

“朝廷以淮乱相仍，遣帅必毙，楚州不复开阍，就以帅杨绍云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军，命通判张国明权守，视之若羁縻州然。贼徒党支邑民田皆以少价抑买之，自收赋以贍军，犹不给。”（《南宋书》）

这种状况加大了忠义军内部的分裂，许多人认为：“‘朝廷不降钱粮，为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议杀福及杨氏以献，于是众帅兵趋杨氏家。（李）福出，（邢）德手刃之，相

屠者数百人。有郭统制者，杀全次子。（阎）通杀一妇人，以为杨氏，函其首并福首驰献于绍云。绍云驿送京师，倾朝甚喜。檄彭牾、张惠、范成进、时青并兵往楚州，便宜尽戮余党。未几，传杨氏故无恙，妇人头乃全次妻刘氏也。”（《宋史》）

时李全已投降蒙古，闻讯断指起誓，率兵南侵。至海州始知杨妙真未死，合兵后重返楚州，自此杨妙真一家“服大元衣冠，文移纪甲子而无号”。

绍定三年（1230年）十二月李全与宋军大战于扬州，互有胜负。绍定四年正月望，李全置酒携妓高会平山堂，被宋军所围，“全窘，从数十骑北走，（赵）葵率诸将以制勇、宁淮军蹙之，贼趋新塘。新塘自决水后，淖深数尺，会久晴，浮战尘如燥壤，全骑陷淖不能拔。制勇军奋长枪三十余乱刺之，全曰：“无杀我，我乃头目。”先是，令诸阵上，众获头目无得争以为献，故群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马器甲，并杀三十余人，类非卒伍，俱不暇问。”（《宋史》）

“全死，余党欲溃，国安用不从，初议推一人为首，莫肯相下，欲还淮安奉全妻杨氏。（赵）范、葵追击，大破之。”“五月，赵范、赵葵复帅步骑十万攻盐城，屡败贼众。遂薄淮安城，杀贼万计，焚二千余家，城中哭声振天。”（《宋史纪事本末》）

杨氏谕郑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今事势已去，撑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尔。杀我而降，汝必不忍。若不图我，人谁纳降？今我欲归老涟水，汝等宣告朝廷，本欲图我来降，为我所觉，已驱之过淮矣。以此请降可乎？”众曰：“诺。”翼日，杨氏绝淮而去。（《宋史》）

“杨氏窜归山东，金后以彭王妃诰命招之，不肯出。”（《南宋书》）

《金史·国用安传》：“（国）安用率兵万人攻海州，未至，众稍散去。（刘）安国因劝安用当赤心归国，安用亦自知反复失计，事已无可奈何，于是，复金朝衣冠。（杨）妙真怒其叛己，又惧为所图，悉屠安用家，走益都。安用遂选兵分将，期必得妙真。自此淮海之上，无宁岁矣。”

杨妙真不仅把金朝搅得天翻地覆，而且还充当了蒙古灭宋的马前卒。袁甫《陈时事疏》代表了宋人的担忧：“臣窃谓今日事势不当论安危，当论存亡。夫关于国家存亡之最急者，莫急于北边。秋高马肥，必谋大举，传闻将以三路并进：台与逆全妻（杨妙真），将自山东窥我淮甸……万一果如所闻，国家何以御之。”

《山左金石志·董进神道碑》记载：“国王（孛鲁）南来，李帅（全）迎降，承制以为益都行省。西拒金人，南御楚寇，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帅因攻扬州，歿于城下。公（董进）率麾下推其夫人权主军务，众皆悦服。越明年，杨氏入觐，得绍夫职，假公以军帅之□，使代征戍之劳。又尝乘传赴阙奏事，进贡诸物。杨氏辞政，公亦寻解兵柄。”在民族战争中，充当了异类的帮凶；在卫国战争中，沦为了可耻的汉奸，对杨妙真尽管有人惺惺相惜，但中华民族的子孙无法容忍。

当然杨妙真一家所作所为，也受到了蒙古帝国的褒奖，耶律楚材《答杨行省书》中称：“某再拜，复书于行省合下：辱书，谕及辞位事，请闻奏施行者。惟圣代之深仁，赏延于世伟；闺门之内助，贵繫于夫。故行省李公：虽稽北觐之期，颇着南伐之绩。时不适愿，天弗假年。伏惟合下：族出名家，世传将种。无儿女子之态，有大丈夫所为。吏民服心，朝廷注意。遂授东台之仕，冀舒南顾之忧。今也抑意陈书，引年求退。惧折鼎覆餗之患，避牝鸡司晨之讥。虽曰谦尊而光，曷若随时之义？分茅列土，无忘北阙之恩；秣马厉兵，可报西门之役。今因人回，谨复书以闻。山川辽阔，书简浮沈。比获瞻依，更希调护。不宣。”

三月三 赶青山

孙 健

三月三，赶青山。在平邑县南部和相邻的枣庄市山亭区、滕州市，济宁市的邹城市和附近的费县，一提起白彦镇的青山庙会，那可是人人皆知，许多人说：青山庙会是一个物资交流大会，更是一个说书唱戏、带动一方经济发展的大型传统庙会。

在白彦镇驻地南1公里处，有大、小两座拔地而起的山头，当地群众称之为大青山和小青山。大青山在西南，海拔500多米，占地面积在200亩左右，小青山在东北，海拔约350米，占地面积在180亩左右。两座山相互依恋，如同一对姊妹，自当地有人居住起，就有“小青山不小，大青山不大”的说法，可谓山不在高、远近闻名。

小青山山势突兀，气势雄伟，上栽植有侧柏、马尾松、刺槐等百年以上树木500余棵，常年被树木所覆盖，一年四季常青，有望景台、良心石、海豚石、指天剑石等景点和造型逼真的巨石，山下建有青山革命烈士陵园，安置着100余名在革



命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

小青山地处临沂、济宁、枣庄三市的交界处，是古代佛教文化传播和文人墨客聚会的青睐之地，据当地老人说，小青山在唐开元年间就建有小型寺庙，在明朝嘉靖年间进行扩建，在清朝康熙年间再次进行大规模扩建，历经多次修建和扩大，庙宇规模和建设达到顶峰，占地面积5亩，建有三间正殿堂、六间偏堂，六间东西廊坊、诵经台、法师殿、功德殿等大小建筑30余间，庙前建设有大戏台，庙后山顶平坦处建设有玉皇庙，供奉有玉皇、南海观音菩萨、财神等神像，是当地群众和信徒祈福许愿的重要地方。大庙东西两侧有石碑30多块，记载着青山庙宇建设和发展历程及施善行乐之人事迹。庙东建设有文昌阁，为文人讲学之所，道士修道之处。整个庙宇背依小青山梯次而建，布局合理、古树参天、名胜古迹和传说故事较多，是远近闻名的风景名胜。

一年一度的古历三月三是拜佛念经许愿的传统庙会，也是十里八乡重要的物资交流的盛会。每年的三月三时节，方圆几百里的人前来赶会，推车的、担担的、骡马驮着、挑着篮子水桶乱转的，在小青山庙宇前的山坡上，会摆起长达200余米的商摊10余条，操着南北各地口音的商贩带着当地群众急需的簸箕、笊子、竹篮、木锨、铁质工具、桌子、板凳、布匹、衣物等当地没有的物资进行售卖，而当地人赶着牛、羊、猪、驴等牲畜，带着花生、地瓜、小麦、荞麦、芝麻等外地人需要的农副产品进行交易。在交易过程中，由于资金缺乏，还出现了以物换物的交易方式，南方客商用缸盆碗、丝绸、染布、小镜子、木梳子、稻米等物品换当地人豇豆、芝麻、花生、牲畜毛皮等物品。

庙宇前的大戏台更是人们聚集的好去处，有当地富豪商贾邀请来的多家戏班子一字摆开唱大戏，豫剧、柳琴、大鼓、落子轮流上演，群众过足了戏瘾。青山西侧是说书的、玩杂耍的、变魔术的、耍猴的、套圈的、理发的、镶牙的、卖膏药的、相面看病和卖手工艺品、玩具的。一个个小摊席地而摆，群众在看得过瘾的同时，随手扔上几个小钱，让演出者更欢乐尽心地表演。

庙宇正南面为卖农用家具和木材、门窗、大筐、麦秸、黄草、石灰等基本生产、建筑物品的，还有打铁的市场，十几台红炉沿路排开，为人们加工锄头、镢头、铁锨、大刀等。铁匠炉前，打铁师傅拉着风箱，喊着号子，配合着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场景甚是壮观。

戏台东北角是卖蔬菜和饮食的。蔬菜大多是当地人种植的，那个时候蔬菜品种不多，只有菠菜、白菜、山药和储藏过一冬天的土豆等。挨着卖菜的有不少卖茶水的，一把大铁壶架在大火炉子上，木头桌子上十几个大黑碗，赶会的群众喝上几碗，解渴又舒坦。烧丸子汤、炸油条、馓子和卖羊肉汤、猪下货汤的，生意也很红火，赶会的群众三五成群，在这些小吃摊上，要上两个小菜，打上一壶老白干，捂上一袋土旱烟，喝着酒、听着不绝于耳的戏曲，甚是惬意。

在青山庙会期间，看戏的、烧香拜佛的、赶闲会的更是多得很，一时间，南腔北调的叫卖声，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抑扬顿挫的说唱声，整个庙会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最兴旺的时候，从三月初一，一直赶三月初六，赶会的可达10多万人，可谓是人山人海。青山前的贾岭、大地地、东面的龙湾、西石门、后面的青山后、白彦、小营等村邻近农户为这些客商提供了良好居住条件。青山庙会不愧是当时鲁南和淮海一带出了名的大型庙会，当地人把青山庙会还编成了顺口溜：

三月三，赶青山。
南来的，北往的，
都到青山赶场的。
青山会，摊子多，
十条商铺带拐角。

江苏的，河南的，
还有浙江卖盐的。
大戏台，真热闹，
百台大戏轮番瞧。

据当地老年人回忆，他们从小就听老人讲，青山庙会从建庙初期到鼎盛时期，历时300余年。后来还以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开集，逐渐演变成当地的重要集贸市场，建设了饭店、旅社、茶水房、牲口棚等配套服务设施，整修了场地，修建了道路，往东面扩展了庙会面积，成立了由当地威望高的人士参加的庙会管理组织，做到热心迎客商、坚决不欺商，青山庙会因此声名远播，规模扩大，越办越活，成为了当地群众日常农副产品交易和购买生活用品的重要集散地，为繁荣地方经济发展、改善群众物质生活起到了不可估量作用。

青山庙会在民国初年，基本正常运营。直到1943年，青山一带成为抗日武装重要活动基地，当时的白彦战役、太皇崮战役等重要战斗都是在青山庙宇里指挥的。日伪军对青山庙宇和其他建筑进行了肆意破坏，青山庙堂、大殿、戏台等被拆掉，景亭被推倒，石碑被砸碎，把拆掉下来的木料运到白彦村修建工事堡垒，庙宇基本上所存无几。青山庙会的厄运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再次发生，红卫兵又将仅存的庙宇基础和数块石碑砸坏，把黑砖、石碑修路、建设院墙，大量古树名木被砍伐，青山庙宇成为了一片废墟。

上世纪90年代，白彦镇党委、政府从弘扬传统文化出发，对青山进行了科学规划，按照建设红色革命根据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建设，先后投资150多万元，在山顶建设了观景台，整修了上山道路，在青山下建设了青山革命烈士陵园，对太皇崮战役、白彦战役等战斗中牺牲的革命烈士进行了重新安葬，设立了纪念碑，恢复了部分文物设施，栽植了大量树木，青山重新焕发了新颜，成为了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游人和参观者逐渐多了起来。

今天，白彦大集逐步取代了青山庙会，每年的三月三白彦大集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物资交流大会，农副产品交易、畜牧买卖、食品加工、说书唱戏，白彦三月三物资交流大会越办越大，规格越来越高。



东泇河源头考

平凡



位于季家白露村的东泇河源头

读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其中提到泇河：“泇河二源，一出峄县，一出费县，称为东西二泇河。”朱东润先生说的东泇河，上游在费县，中游在苍山县，下游在江苏邳县汇入运河。费县有温凉河、浚河、枋河、涑河“四大河流”，泇河的级别不够，只能算是小河。大多数的费县人，甚至不知道费县有个泇河。不过，在历史上，泇河的名气并不小。

明代，南方的粮船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往北方，漕运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头等大事。当时从宿迁到韩庄中间还没有运河，从淮安到宿迁、再从宿迁到徐州茶城，就以黄河作为运河，时称“借黄为运”。黄河屡次决口，直接危及漕运安全。身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曾经计划开泇河，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却因耗资庞大，最终没能实现。这是万历三年的事情。直到万历三十二年，在总河侍郎李化龙、曹时聘的手里，这一工程计划才得以完成。清代治河专家靳辅评价说：“有明一代治河，莫善于泇河之绩。”

查阅《辞源》，其“泇河”条目说：“泇河，水名。有东、西二泇。东泇源出山东费县东南箕山。西泇源出枣庄市东南抱犊崮。二泇东南流至江苏邳县三合村汇合，南入运河，称为泇口。”

《辞海》说得更为详细一点：“泇河，有东西二泇：东泇源出山东费县东南箕山；西泇源出枣庄市东北抱犊崮。二泇南流至江苏邳县三合村相会，又南至泇口集入运河。明以前泇河自泇口以下又东南流循今运河至窑湾会沂河，又南至直河口（今江苏宿迁县西北皂河集西）入黄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河督李化龙征集民工开泇河，自夏镇（今山东微山）李家口引运河东南合彭河、承河至泇口会泇河；自此运道改由泇河经微山湖东，西北直达济宁，避开旧道从直河口溯黄河而上至徐州三百余里的风险，时称‘东运河’。”

两部辞书都说东泇河的源头在费县箕山。其根据，是《乾隆沂州府志》卷二《山川》：



“洳河有东西二源，东洳水自费县旗山下发源，东南流入兰山县界。”

箕山又名其山、岐山、旗山，是费县东南部的一座山峰，位于原刘庄镇驻地西4公里，海拔325米，面积5平方公里。《光绪费县志·卷二·山川》说：“其山：县东南四十五里。《府志》作旗山，俗讹为箕山。自方山而东南起此山。顶平，长数里，石淡紫色，可作砚。山前有古寺。南、东俱濒于涑。”

如果身临箕山实地考察，可以很容易地发现，箕山并不是东洳河的源头。这里确实有一条发源于箕山的季节性河流，它的名字不叫“洳河”，而是叫作“寺口河”，北起寺里，南至窦家村，长约3公里，在窦家村汇入涑河。箕山的西面有一条名为“牛田河”（俗称“洗耳河”）的小溪，南流汇入涑河。箕山所处的涑河流域，与洳河流域之间，被几辈崖、白皮崮、刘家崮、居林山这条山脉所阻隔，根本不属于一个水系。由此可以断定，东洳河发源箕山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对此错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成书的《光绪费县志》早就予以指正：“《续山东考古录》‘东洳水发源于崇山’，可证旧志‘源于箕山’之误。崇山后为北源，崇山前为南源，至刘家庄东南合为一，荆山涧水入之。至中村东南惠民庄河入之，又东南入兰境（由卞庄径郯境，又南入江南邳州界，至三合村与西洳会）。 ”

1990年出版的《费县水利志》第二章《河流》第四节《洳河》，也沿袭了“东洳河源于箕山”的错误说法：“东洳河：上源分二支，东支源于费县马庄镇梧桐峪村西刘家崮东麓；西支分二，其一源于费县新庄乡官庄东北箕山南麓，其二源于新庄乡大芦山北麓。”试问，在费县新庄乡官庄东北，哪里有个箕山？作为费县本乡本土的水利专业人员，竟然如此不求甚解人云亦云，很不应该。

《辞源》、《辞海》乃至《费县水利志》，都是简单化地采信了《乾隆沂州府志》的说法，没有详加求证，由此得出东洳河发源箕山的结论，当然也就不会正确了。

《光绪费县志》认为：东洳河的源头不是箕山，而是崇山。

崇山是费县南部的一座山峰，位于新庄镇驻地东南8公里，海拔294.6米，面积0.5平方公里。由于重峦叠嶂，本名重山，后演化为崇山。《光绪费县志·卷二·山川》说：“崇山：县南微东五十余里，脉自大山而东起此山。左马山，右虎山。虎山之西为芦山。芦山后为东洳北源，芦山前为东洳南源，流至马山东南合为一。《续山东考古录》谓东洳发源于崇山，是也。山之南有天齐庙。”

崇山南麓、北麓的河流，是东洳河的南北两源。说东洳河发源于崇山，似乎已经接近于正确了，但还不够精确。

东洳河的南北两源，都是季节性的小溪，冬、春季河水干涸，夏、秋季则有河水流淌，因此源头还可以继续向上追溯。

北源的起始点，在大芦山北面的南芦山村西；南源的起始点，在《光绪费县志》所说的“大山”（又名“鹅顶山”）东侧的季家白露村南。相较之下，南源比北源更长一些。因此，季家白露村才是东洳河的真正源头。

2001年出版的《临沂地区志》，吸收了关于洳河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东洳河”条目说：“东洳河：源出费县新庄乡季家白露村南，东南流入苍山县小马庄水库，东南流经矿坑、仲村、卞庄、三合、南桥、长城等乡镇，在前芦汪南入江苏邳县境。在边界下6公里入邳苍分洪道。总长68公里，流域面积390.3平方公里，境内长62公里，流域面积390平方公里。”这一表述才是符合事实的。

《孟子·尽心下》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夫子要求人们不要过于依赖书本，要学会怀疑，善于独立思考问题。《辞源》、《辞海》应该算是最权威的辞书了吧，但是关于“洳河”源头的说法，就不能相信它。每一个问题，想要弄清它的真相，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需要做一番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调查研究功夫。



临沂出土文物之

西汉刘疵印

高昂



刘疵印，高1.6厘米，边长2.3厘米，重16.25克。玛瑙质，微白略显粉红色，上刻覆斗纽，横钻细孔，印面呈正方形，篆刻阴文“刘疵”。1978年5月出土于临沂县岔河公社洪家店西北隅。

洪家店村，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洪姓来此落户，以开店为业，故名。村西北角原有土墩一座，1978年5月人民公社时生产队取土烧砖，发现已塌陷的古墓一座，临沂地区文物组即派人前往临沂县协助清理。该墓为土坑竖穴单葬墓，南北向，石槨木棺。墓圻南北长5.65米，东西宽4.2米。槨周用不规则的石块垒砌而成，西侧为棺室，木棺偏南放置，东侧为边箱。槨顶由大小不同的石板覆盖，部分盖石已塌陷，槨内满是淤泥积水。边箱内随葬的漆木器均已腐朽无存，仅见有残漆片，尚可辨识的器形有奩、盘、耳杯等。在耳杯的残耳和漆盘的残底上，均有“当道北里”隶书四字。墓内木棺长2.3米、宽1.3米。棺盖北端上置玉璧一块，已被下落的盖石压毁。棺木已朽，只剩下一层有红色条纹的黑漆皮。骨架仅见痕迹，在骨架处发现由金缕玉片缀成的头罩、手套和脚套，玉片质量良好，金缕色泽鲜明。头北向，足向南，从头罩到脚套长1.8米。头部东北角有一件铜弩机。西北角有汉初半两钱一串，90余枚，已锈蚀，其中部分为文景、武帝时期的四铢半两钱。左、右手下及右肩下各置铁剑一把，三剑均已锈残。右手执玉佩一件。腰部靠近右手套处有白玛瑙质印章一枚，边长2.3厘米、高1.6厘米。玛瑙质地洁白细腻，阴文小篆刘疵二字，当是墓主人姓名。随葬品中还有镶嵌金银宝石的琴瑟四件、玉剑腊、玉饰件、铜带钩等殉葬品。

刘疵印属于私印性质，缪篆字体，在琢磨好的玛瑙印石上直接镌刻而成，印文结构匀称，笔画饱满，线条平正，体现了西汉前期的特点，尤其是形体之间的挪让，依据笔画的繁简，参差有致，令人惊叹。该印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被国家文物局收录进《中国文物精华大词典》。

潍县战役：胜利日^(上)

本 编



络绎不绝的拥军群众

潍县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上的第一个攻坚战，是华东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后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1947年，华东野战军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山东战场的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48年初，山东兵团按照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解放全山东的作战计划，从胶济路西段开始，发起了强大的春季攻势，打响了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进而解放全山东的一系列战役，揭开了山东解放战场新的历史序幕。

潍县战役历时一个多月，歼国民党军4.6万人，生俘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四十五师中将师长陈金城，击毙国民党山东第八保安总队长张天佐。潍县的解放，使胶东、渤海、鲁中三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大大改善和巩固了山东解放区的战略地位。



小朋友们向解放军赠送慰问品



大嫂们为解放军洗衣服



群众向英雄部队献匾



会餐

从《王琳墓志》看“颜体”演变形成^(上)

佚名

前言

在中国书法史上，王羲之的书法被尊为“尽善尽美”，走上了“书圣”的神坛。尤其初唐时期，时人对王羲之的顶礼膜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书坛完全被王氏书风笼罩。一直到盛唐，这种局面才因颜真卿的出现而打破。颜真卿在书法史上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可以说，楷书至颜真卿，完全成熟并发展到极致，上承至前代诸种书体，下开创了此后1000多年的书风，将大雅与实用融为一体，自宋代开始直到清代，颜体成了楷书的典范。本文从颜真卿32岁作品《王琳墓志》着手到最终颜体成熟时期，看一代书法大家书法演变之路。

一、颜真卿书法

(一) 颜真卿其人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祖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他出身于一个世代擅长书法艺术，精通文字学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唐代名臣，杰出的书法家、政治家，曾做过平原太守，吏部尚书，太子太师，殿中侍御史等官。26岁举进士，两年后擢制科，累迁殿中侍御史。杨国忠怒其不附己，天宝末出为平原太守，故世称“颜平原”。时安禄山反状已萌，真卿乃募勇士，与从兄杲卿共举兵抗击，后援绝力穷，乃弃郡还朝，封鲁郡开国公，故又称颜鲁公。真卿立朝正色，刚而有礼，事四朝不变其节，兴元元年（784年）被叛贼李希烈缢杀。

(二) 颜真卿主要作品

颜真卿的楷书在美学的历史上堪称一次历史性的变革，他从贵族文人典雅的书风中走了出来，深深地根植于平民广博的土壤中，他的书法讲究艺术形式，追求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他的书迹作品，据说有138种。楷书有《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等，是极具个性的书体。如“荆卿按剑，樊哙拥盾，金刚瞋目，力士挥拳”。行草书有《祭侄文稿》、《争座位帖》、《裴将军帖》、《自书告身》等，其中《祭侄文稿》是在极其悲愤的心情下进入的最高艺术境界，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米芾《书史》评价《争座位帖》“有篆籀气，为颜书第一，字相连属，诡异飞动，得于意外”。

（三）颜真卿书法评价

宋欧阳修评云：“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庄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爱也。其见宝于世者不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朱长文也赞其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志，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

元郑杓《至朴》篇：“颜真卿含弘光大，为书统宗”，其《古学》篇云：“真卿‘剑池’、阳冰之‘讲台’、‘祠宇’等作，纵横生动、不假修饰，其署书雄秀者乎！”

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其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如锋绝剑摧，惊飞逸执，其千变万化，各俱一体。”然而，鲁公的书法正如其仕途的坎坷，问世以来，贬斥之音，也不绝于耳。南唐后主李煜，视其为叉手并足的田舍汉；宋代的米芾，认为无平淡天成之趣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清人梁颢则云其古意已失，徒形宽懈，终非正格；标新立异的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卷三中专列“卑唐”一篇，怒斥颜书“出牙布爪，无复古人渊永浑厚之意。”

朱长文《续书断》：“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故观《中兴颂》，则闳伟发扬，状其功德之盛；观《家庙碑》则庄重笃实，见夫承家之谨；观《仙坛记》，则秀颖超举，象其志气之妙；观《元次山铭》，则淳涵深厚，见其业履之纯，余皆可以类考”。朱熹谓“余少时喜学曹孟德书，时刘贡父方学颜真卿书，余以字书古诮之，贡父正色谓余曰：‘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余嘿然无以应，是则取法不可不端也。”“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其实唐以后，承其法乳者甚多，从五代的杨凝式到宋元明清诸多名家，几乎都受到了颜书的影响。宋四家之一的苏轼便对鲁公的书法极为推崇：

“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而此后历代书家的盛赞更是不绝于耳，以至于俗称楷书四大家，颜为第一，柳、欧、赵只能望其项背，自惭形秽。颜真卿的书法，褒贬参半。客观地说，颜真卿的书法，的确打破了二王流美书风的一统天下，为后世提供了一整套有迹可循的师法规范，逆锋起笔，中锋行笔，回锋收笔是典型的唐楷笔法。横平竖直，平画宽结，空间均匀则是极度规范化了的楷书造型。它的美也适合了绝大多数中国的胃口；端庄伟岸，堂堂正正，法度森然，有庙堂之气，有君子之相。

颜真卿少时家贫缺纸笔，用笔蘸黄土水在墙上练字。习字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广收博取，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自成一格，一反初唐书风，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慨凛然，人称“颜体”。“颜体”奠定了他在楷书史上千百年来不朽的地位，使颜真卿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最富影响力的书法大师之一。他的“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对后世影响巨大。

二、颜真卿最早的作品《王琳墓志》

（一）关于早期作品的争论

以前，人们见不到颜真卿早期的作品，就以当时所见最早的《多宝塔感应碑》为其早期作品。《多宝塔感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岑勋撰文，颜真卿书丹，徐浩题额，史华刻字，现藏西安碑林。此碑是颜真卿早期成名之作，书写恭谨诚恳，直接二王、欧、虞、褚遗风，而又与唐人写经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说明颜真卿在向前辈书法家学习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从民间的书法艺术吸取营养。整篇结构严密，字行间有乌丝栏界格，点画圆整，端庄秀丽，一撇一捺显得静中有动，飘然欲仙，是他继承传统的作品。《书画跋》：“此是鲁公最匀稳书，亦尽秀媚多姿，第微带俗，正是近世撰史家鼻祖。”《多宝塔感应碑》于天宝十一年（752年）四月廿日建，颜真卿写此碑时已43岁，而

且此碑的个人特色也较突出。在此之前，颜真卿的书法应有一个较长的演变过程。

1997年，河南偃师出土的颜真卿《郭虚己墓志》，书于天宝八年（749年），时年41岁，墓志拓本面世，令书界振奋不已，被称为颜氏最早之作。《郭虚己墓志》总体上风格清晰，可谓是纤尘不染，刚柔并济。最主要的特点是字体周正、端庄，笔画布局极其匀称，隐隐地还能看出褚遂良用笔特征。

然2003秋，出土于洛阳龙门镇张沟村的《王琳墓志》，打破了上述颜真卿早期作品的说法。洛阳学院副院长张保明教授说，“颜真卿书《王琳墓志》，时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年），颜真卿才32岁。由此可见，颜真卿最早期作品是《王琳墓志》，乃颜真卿40岁以前的唯一遗作。《王琳墓志》恰是我们能见到的颜真卿书法史上的始点，也显现出颜真卿早年的书法功底。

（二）《王琳墓志》介绍

《王琳墓志》全称《唐故赵郡君太原王氏墓志铭并序》，书于开元廿九年（741年），墓碑为石灰岩质，长、宽皆为90厘米，厚18厘米。志文一共32行，满行32字，全文共计913字。字的大小约为2厘米见方，彼此之间有浅界格。志石左侧有“开元廿九年记”一行6字。因深埋地底，保存完好。

“王琳出生中国著姓，六代祖士良，五代祖得衡”。《周书》、《北史》有传。据墓志开篇题款，志文由死者王琳的丈夫“润州刺史、江南东道采访处置兼福建等州经略使、慈源县开国公徐峤”撰写，由“朝散郎、前行秘书省著作局校书郎颜真卿”书丹。徐峤两《唐书》有传，曾“撰易广义卅卷、类二戴礼百篇、文集卅卷”。他的志文对亡妻推崇备至，说她“生温惠和，性克柔婉，孝慈穆于中外，礼乐备乎周旋。丝絃组紃，彩就雕缕，凡曰女工之妙，自然造微”，18岁嫁给自己，“一和琴瑟，垂四十年”。王琳随丈夫到润州（治今江苏镇江市）卑湿瘴疠之地，开元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不幸去世。一生信仰佛教，临死前交代丈夫把自己埋葬在洛阳龙门石窟附近，遂于当年十一月二日葬于龙门西岗清河王岭。这里“前瞻伊阙，傍对伊川，宝塔灵龕，尽为极乐之界，鲸钟鱼梵，常送大悲之声。即是楞伽之峰，自然解脱之岸，岂比夫北邙之塋，西陵之原，白杨萧萧，夜杂鬼哭，苍烟漠漠，昼掩魂游者乎”！徐峤身为封疆大吏，既然亲自为爱妻撰写墓志，自然要找书法名家书写。颜真卿时年仅33岁即被委以此任，可见其书法成就和名气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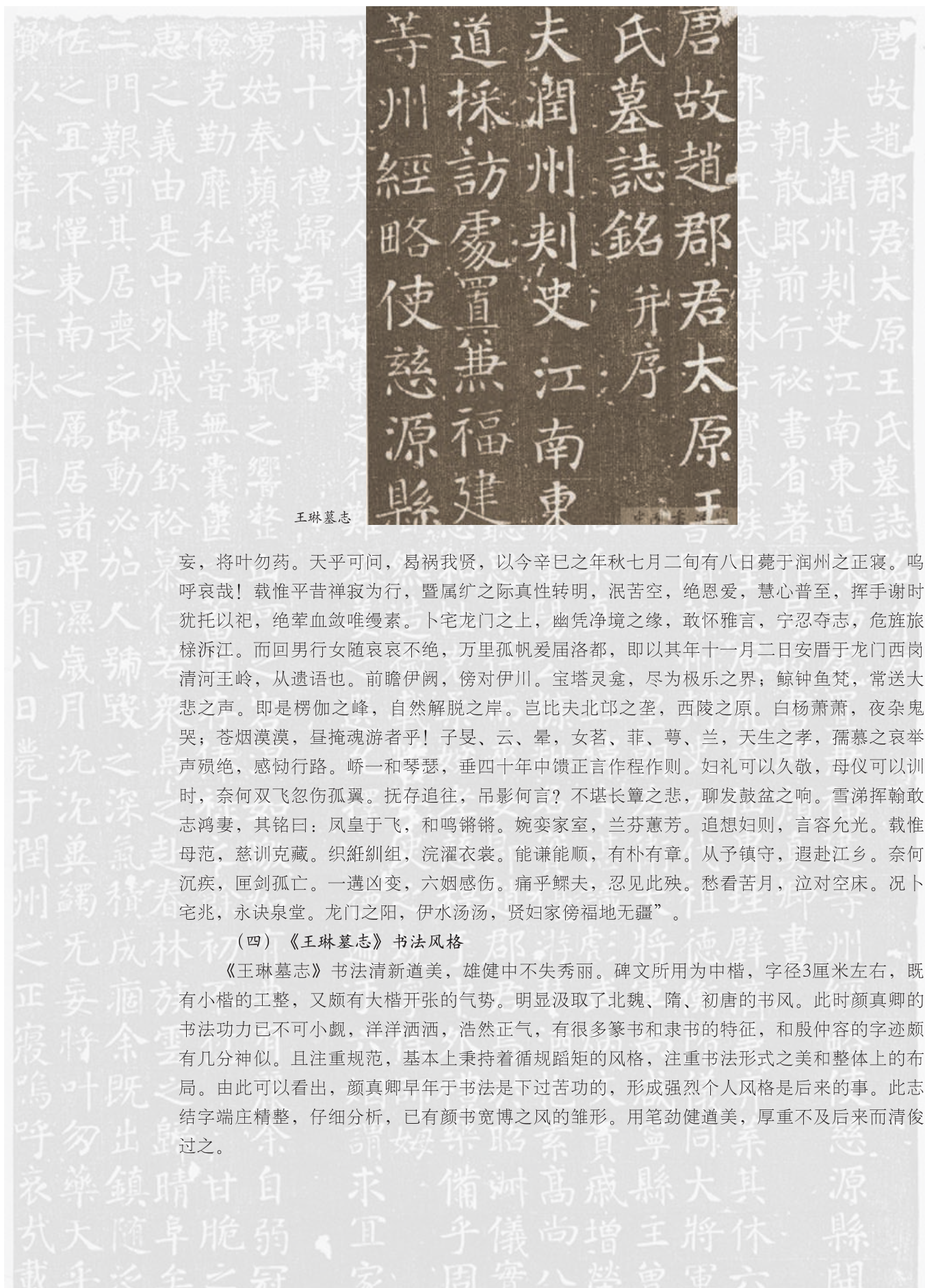
（三）《王琳墓志》全文

文曰“唐故赵郡君太原王氏墓志铭并序：

夫润州刺史江南东道采访处置兼福建等州经略使慈源县开国公徐峤撰。

朝散郎前行秘书省著作局校书郎颜真卿书。

赵郡君王氏，讳琳，字宝真，族望太原，胤承仙胄珪璧，济美弈业其休。六代祖广昌郡公士良，周小司徒、吏部尚书、隋并州刺史。五代祖德衡，隋仪同大将军。并周隋，史有传。高祖武英，隋枣阳公、皇朝左卫大将军，尚咸宁县主。曾祖神感，判凉府节度、西州长史。祖仁肃，尚秉直长，并伟才湛识，彪武炳文，贵戚增荣，戎麾总寄清仕，令望克传家声。烈考猷，袭枣阳公，糠粃名，实优游，琴酒抱素，高尚八十而终。夫人弘农杨氏生一子一女，子听思未仕而卒，女即赵郡君焉。于昭淑仪，实著令范。吾见其懿，可略而言尔。其生温惠和，性克柔婉，孝慈穆于中，外礼乐备乎周旋。丝絃组紃彩就雕缕，凡曰女工之妙，自然造微。载惟女史之规宁，俟师姆、我先太夫人重笄枣之行，难齐姜之选，允择四德，遍于六姻。谓求宜家，俾正妇道，年甫十八礼归吾门。事舅姑，奉蘋藻，节环佩之响，整山河之容，温如噉如，有典有丽。余自弱冠登于宦途，克俭克勤，靡私靡费，尝无囊篋之蓄，固存俸禄之余。初不愆甘脆之资，终能广散惠之义，由是中外戚属钦裕慕仁，若众鸟之赴春林，族云之归晴阜矣。开元中，及丁二门艰，罚其居丧之节，动必加人号，毁之深，气积成痼。余既出镇，随泛江皋，允遵辅佐之宜。不憚东南之厉，居诸卑湿，岁月沉沉，异蠲无



王琳墓志

妄，将叶勿药。天乎可问，曷祸我贤，以今辛巳之年秋七月二旬有八日薨于润州之正寝。呜呼哀哉！载惟平昔禅寂为行，暨属纆之际真性转明，泯苦空，绝恩爱，慧心普至，挥手谢时，犹托以祀，绝荤血，敛唯缁素。卜宅龙门之上，幽凭净境之缘，敢怀雅言，宁忍夺志，危旌旅楫，沂江。而回男行女随，哀哀不绝，万里孤帆，爰屈洛都，即以其年十一月二日安厝于龙门西岗清河王岭，从遗语也。前瞻伊阙，傍对伊川。宝塔灵龕，尽为极乐之界；鲸钟鱼梵，常送大悲之声。即是楞伽之峰，自然解脱之岸。岂比夫北邙之塋，西陵之原。白杨萧萧，夜杂鬼哭；苍烟漠漠，昼掩魂游者乎！子旻、云、晕、女茗、菲、萼、兰，天生之孝，孺慕之哀，举声殒绝，感恻行路。峤一和琴瑟，垂四十年中馈，正言作程作则。妇礼可以久敬，母仪可以训时，奈何双飞忽伤孤翼。抚存追往，吊影何言？不堪长簟之悲，聊发鼓盆之响。雪涕挥翰，敢志鸿妻，其铭曰：凤皇于飞，和鸣锵锵。婉变家室，兰芬蕙芳。追想妇则，言容允光。载惟母范，慈训克藏。织紵紉组，浣濯衣裳。能谦能顺，有朴有章。从予镇守，遐赴江乡。奈何沉疾，匣剑孤亡。一遭凶变，六姻感伤。痛乎鰥夫，忍见此殃。愁看苦月，泣对空床。况卜宅兆，永诀泉堂。龙门之阳，伊水汤汤，贤妇家傍福地无疆”。

（四）《王琳墓志》书法风格

《王琳墓志》书法清新遒美，雄健中不失秀丽。碑文所用为中楷，字径3厘米左右，既有小楷的工整，又颇有大楷开张的气势。明显汲取了北魏、隋、初唐的书风。此时颜真卿的书法功力已不可小觑，洋洋洒洒，浩然正气，有很多篆书和隶书的特征，和殷仲容的字迹颇有几分神似。且注重规范，基本上秉持着循规蹈矩的风格，注重书法形式之美和整体上的布局。由此可以看出，颜真卿早年于书法是下过苦功的，形成强烈个人风格是后来的事。此志结字端庄精整，仔细分析，已有颜书宽博之风的雏形。用笔劲健遒美，厚重不及后来而清俊过之。

抗战期间全国汇集山东根据地的干部名录（三）

八路军第一纵队入鲁干部

罗 加

1939年5月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通知：根据中央书记处决定，组织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新黄河以北山东境内及萧华区各正规部队及各游击部队，以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委。

这时，徐向前司令员正在冀南，朱瑞政委在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领受任务后，选调干部，组建了第一纵队机关。5月5日，朱瑞政委率队离开八路军总部，向山东进发。徐向前司令员在冀南接到命令后，率领一个警卫小分队，到河北馆陶与朱瑞一行会合，一同前往山东。

从山西到山东，要跨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四省和平汉、津浦两条铁路，还有数不清的封锁线，经常遇到敌人的阻挡和追击。再加上恶劣的气候，时遇滂沱大雨、山洪暴发，常常被迫停止前进或绕道而行，所以整个行程难以计算。我们这一行共有200余人，主要是干部，勤杂人员很少，也没有武装部队，沿途由各地的八路军部队一段一段地负责护送。

行军途中，在徐向前司令员和朱瑞政委领导下，由罗舜初、谢有法、刘子超、李竹如、袁也烈等同志，临时组成一个精干的领导班子，负责与沿途我军联系，掌握敌情，确定行军路线，安排食宿，收容掉队人员等事宜。

第一纵队机关，主要由几个方面的干部组成：一是从八路军总部（即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简称集总）抽调的干部；二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从所属单位和地方选调的干部；三是从延安抗大、马列学院、陕北公学等院校结业后分配到华北敌后的部分青年干部；四是原在石友三部队做统战工作，石友三反共后撤出的我党干部。随同第一纵队从山西到山东的，还有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的一部分同志。

这几方面的干部，虽然来自五湖四海，过去多不相识，但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在行军途中彼此关心，互相照顾，蔚然成风。有些同志年大体弱，行军有困难，特别是夜间行军，患夜盲症的很容易掉队，还有怀孕的女同志，才出生几个月的婴儿，更需要别人帮助。遇到山洪暴发、河水泛滥时，一些年轻力壮的同志就组成人链，协助一个个老弱妇孺过河。途中生病的同志，也受到很好的关照。一路上没有掉队失散人员。

6月12日，我们过了老黄河，进入鲁西地区。徐、朱首长在鲁西与刚刚经过陆房突围的一一五师首长陈光、罗荣桓等同志会面，然后我们越过津浦铁路，6月29日到达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所在的沂蒙山区。

最近，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的同志，为了整理历史资料，约我搞一份第一纵队入鲁干部的名录。我是当事人之一，承担这一任务义不容辞。但是，事隔70多年，现在已经不可能搞出一个完整的名录。我根据徐向前元帅和谢有法等同志的回忆录中提到的名字，再加上我的回忆，能够写出姓名的有以下同志：

徐向前：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红军时期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抗战初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1939年5月任第一纵队司令员。1940年6月返回延安，后任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代理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朱瑞：红军时期任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抗战初期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和组织部长。1939年5月任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1943年9月启程回延安参加七大。后任延安炮兵学校校长、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等职。1948年10月1日，在辽沈战役攻克义县战斗中牺牲。

王建安：红军时期任第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1939年随第一纵队到山东后，历任山东纵队副指挥、鲁中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沈阳、济南、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央军委顾问。1956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罗舜初：红军时期曾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一局参谋、第二局副局长。抗战初期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1939年5月起任第一纵队作战科长、山东纵队参谋处长。抗战胜利后历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政委，第四十军军长，海军副司令员，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副主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谢有法：红军时期曾任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干事。抗战初期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1939年任第一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山东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后任兵团政治部主任、总政组织部副部长、沈阳军区副政委、政治学院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刘子超：1926年起在上海等地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抗战初期任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司令员，晋冀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1939年任第一纵队政治部宣传科长、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敌工部长。1941年11月，在山东沂水反“扫荡”战斗中牺牲。

李竹如：1927年起在山东、南京、上海等地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曾任中央大学中共支部书记。抗战初期任晋冀豫区党委《中国人》报社社长。1939年起任第一纵队政治部秘书科科长、山东纵队政治部民运部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42年11月2日在沂水对崮峪反“扫荡”战斗中牺牲。

张雨帆：抗战前曾任中共天津塘沽区委书记。抗战初期任山西和顺县县长。1939年调入第一纵队政治部任副科长。后任山东分局组织部科长，鲁南区党委书记、副书记，鲁南军区政委、副政委，商业部、水产部副部长等职。

徐黎平：红军时期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一局任参谋。抗战初期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参谋。1939年任第一纵队司令部第一科科长，后任山东纵队司令部第二科科长、鲁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1944年在攻占沂水城战役中牺牲。

苏书轩：红军时期曾任第十五军团卫生部医官兼外科教员，抗战初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代医务主任兼野战医院院长。1939年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卫生处长。到山东后历任山东纵队卫生部野战医院院长。鲁中军区卫生处长，第七兵团卫生部长，济南军区卫生部长等职。

王强珠：1930年参加革命。曾任第四方面军排长、指导员、营长。1939年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部股长、副科长、科长。后任东北军区纵队供给部长，中国人民

志愿军后勤第一分部部长，吉林省军区后勤部长等职。

孙 光：抗战初期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工作。1939年任第一纵队司令部第五科科长。后任山东纵队司令部第四科科长。

夏熙芳：红军干部。河南新县人。1939年到山东后，任第一纵队司令部机要科长。后任山东纵队、山东军区司令部机要科长。1942年11月2日在沂水对崮峪反“扫荡”战斗中牺牲。

罗文华：红军时期任第一军团保卫局科员、团特派员。抗战初期在延安抗大学习。1939年调入第一纵队，到山东后任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一团、第三支队十团政委、特务团参谋长。后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二军副师长，空军第七航校参谋长，海军南海舰队副司令员等职。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 钦：红军时期任第四方面军师作战科长、团参谋长。抗战初期在延安抗大任队长兼教员，到山东后任山东纵队司令部第一科科长、团参谋长。解放后任安徽、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黄 萍：红军时期任第十二军电台报务员、第四方面军电台报务员。抗战初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电台报务主任。到山东后任山东纵队电台报务主任、山东分局电台区队长。后任华东军区业务处处长、军委通信兵副参谋长、总参通信兵部副主任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 政：1936年在山西参加牺盟会。1938年加入共产党，同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后任南进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团政委、师政委、福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凌青：抗战前曾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抗战初期被派往张发奎部队战地服务团工作。后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1939年调入第一纵队。到山东后，曾任山东文协会长、《山东文化》主编等职。上海解放后，一直在上海文化界工作。

白汝瑗：早年先后就读于辅仁、燕京、复旦等大学。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曾在上海出版诗集，成为中国诗坛的一颗新星。1938年5月到延安，入抗大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后任《新华日报》华北版记者。1939年调入八路军第一纵队，到山东后历任《大众日报》社副总编辑、胶东大众报总编辑。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历任《东北日报》副总编辑，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黑龙江日报》总编辑，黑龙江大学党委书记等职。

曹秉衡：早年就读燕京大学，1938年被中共北平市委送到抗日根据地。1939年调入八路军第一纵队，到山东后任山东纵队、山东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兼摄影记者。1944年10月，在莒县战役中牺牲。

贾 霁：抗战初期在延安抗大学习，是鲁艺文学系第一期学员。后任《新华日报》华北版记者。1939年调入八路军第一纵队。到山东后历任山东纵队鲁迅宣传大队戏剧教员，《前卫报》编辑，山东文协人民剧团团长。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大众电影》主编等职。

陈若克（女）：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全面爆发后，入华北军政干校学习。1939年调入八路军第一纵队，到山东后历任山东纵队直属工作科科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妇委委员、山东省妇女救国联合会常委、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驻会议员等职。1941年冬在沂蒙山区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

亓青若（女）：抗战初期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工作。1939年调入八路军第一纵队。到山东后曾任山东妇女救国联合总会副会长。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工作。解放后在山西、安徽工作。

陈 岱（女）：抗战初期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工作。1939年调入八路军第一纵

队到山东。解放后曾任济南市委党校副校长。

林 毅（女）：1939年调入八路军第一纵队。到山东后从事文化艺术工作。解放后在上海继续从事文艺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9月，中共北平市委派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军事部部长袁也烈到国民党石友三部队做统战工作，任中共工委书记，并先后调入一批我党的干部进入石部，我就是其中之一。1938年4月，由于石友三投靠国民党反共，袁也烈奉命组织我党在石部工作的干部撤出，调入八路军第一纵队，随徐向前、朱瑞同志到山东工作。这批干部有：

袁也烈：1925年入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叶挺独立团连长、副营长，南昌起义时任营长。后任团参谋长，红八军纵队长。1939从石友三部队撤出后，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副校长。后任渤海军区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等职。

李 钊：1939年任第一纵队司令部第二科科长。抗战胜利后赴东北，曾任抚顺市市长等职。

李志南：1939年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山东纵队司令部第四科科长。抗战胜利后赴东北，曾任辽宁省建委主任等职。

马振清：红军长征干部。抗战初期被派到石友三部队工作。1939年撤出后到第一纵队。到达山东后分配到部队工作。

王有才：红军长征干部。抗战初期被分配到石友三部队工作。1939年撤出后到第一纵队。到达山东后分配到部队工作。

周吉一：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1939年从石友三部队撤出后到八路军第一纵队，任政治部教育干事，山东纵队政治部民运部科长。后任新四军三师九旅二十五团副政委，第三野战军二十一军六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国防科工委办公厅主任等职。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李钦哲：1937年10月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5月毕业后被派到石友三部队做统战工作。1939年从石部撤出后到八路军第一纵队。先后在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山东纵队军政干校任区队长、指导员。1940年秋回延安军政学院学习。后在三五九旅工作。抗战胜利后赴东北。解放后曾任第四十七军政治部主任、桂林军政干校政委等职。

王振邦：山西永济人。1937年4月参军，10月入党。1938年被派到石友三部队做统战工作。1939年从石部撤出后，调入八路军第一纵队到山东。后调冀鲁豫军区，曾任团长。抗美援朝战争中曾任第一八〇师参谋长。后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等职。

张 建：1939年调入八路军第一纵队，到山东后任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山东纵队军政干校、抗大一分校政治教员。

高建新：1939年调入八路军第一纵队，到山东后任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山东纵队军政干校、抗大一分校任政治教员。

李 林：1939年调入八路军第一纵队，到山东后任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山东纵队军政干校、抗大一分校教员。

韩立中：在石友三部队任队长，1939年调入八路军第一纵队，到山东后在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山东纵队军政干校军事教员。

赵 超：北京大学学生。1939年第一纵队到山东后，任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山东纵队军政干部学校、抗大一分校教员、科长、副处长。



罗加（女）：1936年在洛阳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7年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4月到石友三部队做统战工作。1939年4月撤出后到八路军第一纵队，任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宣传股长。后在清河军区、渤海军区工作。解放后曾任海军医院副政委、纺织工业部机关党委组织部长等职。

王泽南（女）：1939年从石友三部队撤出后，调入八路军第一纵队任随营学校组织干事。

第一纵队出发前，从抗大一分校中，抽调了原籍苏、鲁、豫、皖四省的73名学员，组成一个队，队长是红军干部，姓王。

指导员是：

赵易亚：抗战初期在抗大一分校任队指导员。1939年任第一纵队政治部副科长。后任新四军第三师第九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华东野战军宣传部副部长，第二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解放军报社总编辑等职。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队员还有：

刘立封：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调入八路军第一纵队，后任山东纵队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师组织科长，军后勤部副政委，师副政委，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第二炮兵政委等职。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赵行志：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初期在抗大一分校学习。1939年调入八路军第一纵队。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科长，上海市人事局副局长、外办副主任，中国驻喀麦隆、伊拉克大使，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政协副主席等职。

王箴西：1939年调入第一纵队，到山东后在山东纵队工作。1961年4月任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时，调到中国科学院负责组建拉丁美洲研究所，任副所长。

辛荫民：1939年调入八路军第一纵队。1946年8月，任山东军区第八师团政治处主任时，在攻打泗县县城战斗中牺牲。

杨启哲：1939年随第一纵队到山东，1955年曾任山东政法干校校长。

1939年，在八路军第一纵队和我们一起到山东的，还有田克明、许冠群、黄笃厚、徐景郁、冉宪秀、冉宪仪等。年龄最小的是勤务员李祥和刘德文。

随八路军第一纵队，从晋东南集总到山东的还有——五师后方留守处人员。其中有朱涤新、邝任农、李作鹏及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萧华夫人王新兰、邝任农夫人肖英等。还有刚出生几个月的罗荣桓的儿子罗东进。

在徐向前、朱瑞率领我们到山东以后，中央和集总又抽调了两批干部到山东。一批是从延安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抗大、陕北公学中抽调的，共有20多人，由林平加带队，有穆林、田力夫、曲文、刘云鹏、仲星帆、黄成章、刘启源、李光等。他们于1939年6月从延安出发，到晋东南后，从石友三部撤出的王焰、马连辉跟随他们一起于11月初到了山东。

另一批是我们从晋东南来山东时，正在晋冀豫区党委党校学习的从石友三部队撤出的一部分原籍在老黄河间的同志，朱瑞要他们毕业后到第一纵队来工作。这批同志由于克（于一川）带队，包括初光、刘砚田、洪波（女）、方志西（女）、葛明（女）、鲁可南（女）、陈亚琦（女）、吴亚南（女）、鲁克里（女）等共有20多位。1939年8月从晋东南启程，10月到达山东。路经鲁西时，几位女同志被留在鲁西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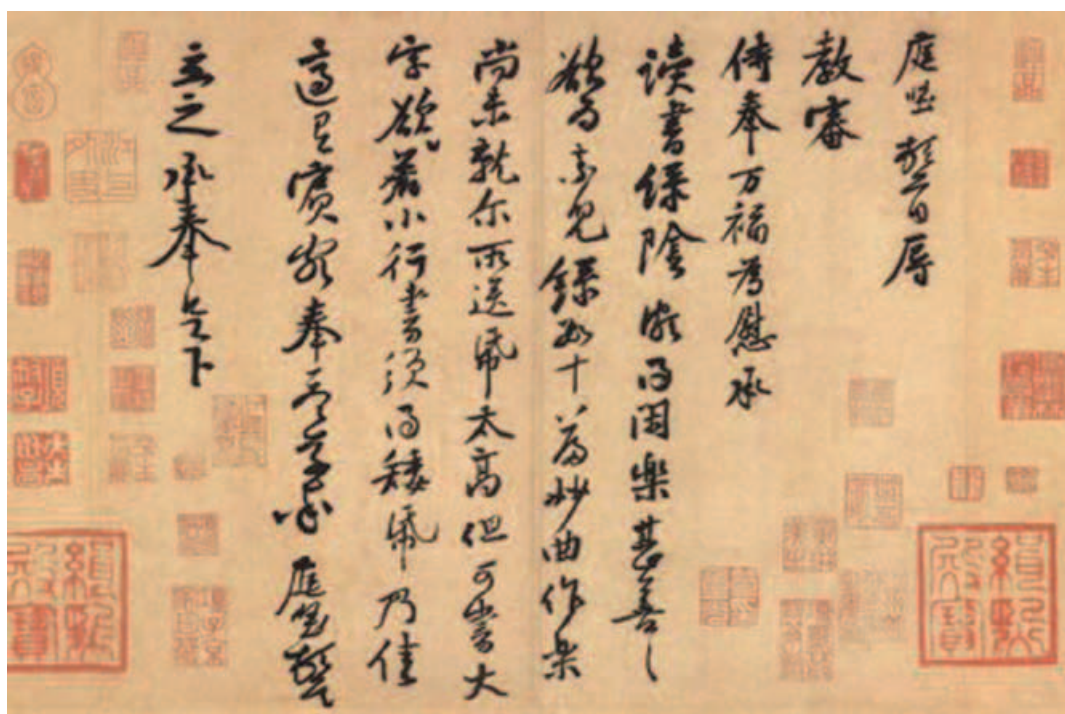
（本文系罗加追忆，李维民整理）



姓氏百家漫谈——黄姓 (下)

赵丹峰

宋朝是继唐朝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出现了一大批文学艺术家。诗人兼书法大家的黄庭坚，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黄庭坚系英宗治平进士。初任县尉、知县，哲宗元佑初，召为校书郎，编修《神宗实录》，后迁起居舍人。新党用事，迫害元祐旧臣，被安以修实录不实的罪名，遭到贬谪，最后被除名编管宜州（今广西宜山），终至在荒僻的贬所去世。其文章、诗词为苏轼所重，系苏门四学士之一。在文学创作上，黄庭坚反对因袭前人，主张自出己意，另辟蹊径，论诗推尊杜甫，主张“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提倡“无一字无来处”。其诗作立意曲深，颇富思致，以其独特的风格开宗立派，被后人奉为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其诗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今存诗达1500余首。《登快阁》是黄庭坚最为著名的诗作之一，诗人吟道：“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因全诗对仗工整，意境隽永，寄情远思，形象鲜明，遂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寄黄几复》诗亦系黄庭坚的代表作：“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此诗是反映作者耿介兀傲个性与其瘦硬奇峭诗风的一篇佳作，其中第三、四句皆以名词造句，以乐衬哀，感人心扉，成为国人传诵的名句。黄庭坚亦喜填词，



黄庭坚书法

其词与秦观齐名。早年词风似柳永，晚年词风则变得豪放慷慨，所作《念奴娇》便颇具代表性：“断虹霁雨，静秋空、山染修眉新绿。桂影扶疏，谁便道、今夕清辉不足？万里青天，姮娥何处，驾此一轮玉？共倒金荷家万里，难得尊前相属。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笛！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这首写初秋赏月的词作，表现了作者不畏远谪，坦然处之的博大情怀。因该词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均极具特色，故当时有人评之为“可继东坡赤壁之歌”。

黄庭坚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还是一位享誉书坛的大师。他与苏轼、米芾、蔡襄被誉为宋书四大家。黄庭坚善行草书，楷书亦自成一家。他写行书，以“画竹法作书”，善藏锋顿挫，纵横齐倔，给观者以沉着痛快的感觉。其《诸上座帖》笔势飘动隽逸，实属稀世佳作。

黄道婆作为元代乃至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女纺织技术革新家而传誉遐迩。黄道婆，亦称黄婆，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市徐汇区东湾村）人。早年乘船渡海流落至海南岛崖州（今海南三亚），从当地黎族人民那里学得先进的纺织技术，因聪颖好学，逐渐成为一名出色的纺织能手。后来她返回故乡乌泥泾，与当地的一些能工巧匠合作，首先推广、改进了捍、弹、纺、织等一整套的纺织工具。捍，即轧车、踏车，主要用来去除棉花籽；弹，即使棉花松软；纺，即纺车。经黄道婆改进的纺车，较之旧时纺车转速快、功率高；织，即织布机，经黄道婆改制的织布机能织出多种鲜艳的花色。其次，黄道婆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技艺，使普通的棉布能如五彩丝锦一般，织出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各种美丽的图案，观之缤纷如画。黄道婆随即将这些先进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人，使这一工艺很快在当地推广，一时间，乌泥泾棉织品名声大噪，饮誉江浙，淞江一带很快成为全国的纺织业中心，对当时的植棉和纺织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久，棉花种植就由长江流域扩大到黄河流域。

明清时期，一批黄姓贤达分别在吏治、思想和文化领域各有建树。沂州籍（今临沂市）的黄和系明代万历甲辰进士。他品行高尚，年少时一次拾得钱物后，即张贴招领启事，将钱还于失主，一时荣誉乡里。初为官时，恰遇大宦官之弟郭成枉杀人命，他不畏权势，将罪犯依法惩处。后官临洮太守。时遇荒年，他开仓赈济，救活饥民数万众。任潼关守备时，忠于职守，使当地太平无事。后于苑马卿任上告老还乡。其子黄图昌，系崇祯戊辰进士。官仕山西泽州，勤政爱民，吏部考绩后被列为优等第一。待父丧归里守孝时，泽州数万百姓于路旁焚香哭送，并为其立生祠崇祀，以感念其爱民勤政之德行。

在思想学术方面建树突出者有黄宗羲，是杰出的思想家和史学家。明天启时，其父黄尊素官任御史，系晚明东林党人，被魏忠贤等阉党杀害后，黄宗羲入京诉冤，请诛阉奸。后成为复社领导人之一，坚持反对宦官权贵的斗争。明亡之后，曾在浙东一带随军抗清。失败后隐居家乡浙江余姚，讲学著述，拒不入仕清廷官场。后成为浙东学派的一代宗师，与孙奇逢、李颀并称为当世三大儒。他学识极为渊博，对天文、数学、乐律，经史百家及儒道之学无不精通。在史学方面成就尤著。所著《明儒学案》凡62卷，开清代浙东史学研究之先河。而后又续写成《宋儒学案》和《元儒学案》，三书相合，成为宋代以来儒学发展史的巨著。在哲学上，黄宗羲反对宋儒“理在气之先”之说，提出“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的观点，认为“理为气之理，无气则无理”。但在心物关系上却受王守仁心学影响，提出了“盈天地皆心”的哲学命题。黄宗羲亲历明朝亡国之祸，痛感宋儒将所谓“君臣之义”视为天理的伦常观所造成的误国害民的危害，认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而今“以君为主，天下为客”，进而揭露了君主一人私有天下产业的弊端，作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大胆结论，指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通过学校士人的议政和提高相权来限制君权。他还主张改革土地、赋税制度，并提出工商皆本的观点。他的这些观点与超前见解，无疑对后世民主思想的兴

起，起到了积极的启蒙作用。

黄以周系清末著名汉学家。曾任分水县训导，后任南菁书院讲席。其父黄式三，治经长于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三书的合称）。黄以周继承家学，深研三礼，博徵群书，详加考辨，在此基础上著成《礼书通故》100卷。该书兼采郑玄与朱熹之说，对三礼的名物制度及其演变，作了科学缜密的考证梳理，特别对前人争议之处，多有订正。被誉为与杜佑《通典》比隆，是清代汉学治《礼》的代表性著作。

此期，在文学创作方面饶有成就的黄姓名人有黄景仁和黄遵宪等。黄景仁16岁应童子试名列第一，后屡次应乡试不第。为生计，先后为湖南按察使王太岳和安徽学政朱筠的幕客，后经陕西巡抚毕沅资助，捐县丞，然尚未补官便病卒。黄景仁虽终生不得志，但在诗歌创作方面却饶有成就，其诗作有的俊逸俏丽，有的则凄恻悲慨，在清代诗坛上占有重要位置。《癸巳除夕偶成》是诗人24岁时于除夕之夜吟成的诗作：“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因该诗意境幽深且颇富哲理，故被经久传诵。黄景仁的词多悲凉慷慨之作，《摸鱼子·归鸦》即颇有代表性：“倚柴门，晚天无际，昏鸦归影如织。分明小幅倪迂画，点上米家颠墨。看不得。带一片斜阳，万古伤心色。暮寒萧索。似卷得风来，还兼雨过，催送小楼黑。曾相识，谁傍朱门贵宅？上林谁更栖息？几丛枯木惊霜重，我是归飞倦翮。飞暂歇，却好趁渔船，小坐秋帆侧。旧巢应忆。笑画角声中，暝烟堆里，多少未归客！”此词借咏暮鸦而寄情，风格沉郁苍凉，诵之令人心动，堪称清代词苑佳作。

黄遵宪系清末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诗人。光绪举人，历任驻日、英参赞及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后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变法新政，先后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课吏馆、妇女不缠足会，创办《湘江新报》和《湘报》，使湖南变革新潮领先于全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黄遵宪受命出使日本，刚行至上海，便发生戊戌政变，被“请旨飭拿”，因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和日本驻华公使出面干预，方得以辞职回故乡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州市）。黄遵宪在担任驻日本参赞5年间，学习日文，遍搜文献，撰著成《日本国志》。该志重点讲述了日本明治变法以来至明治十五年（1882年）的基本国情状况，以类分成12分志（编），对地理、经济、政治、文化、民俗等诸多方面加以记叙，自称“凡牵扯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旨在为中国变法提供借鉴。清廷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四国大臣薛福成在巴黎为此书作序，称该志书系数百年来未有的奇作。此书系中国人编纂的一部日本史志，不仅对推动当时的变法维新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亦受到日本学者的高度称誉。在文学上，他主张“我手写吾口”，要求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被梁启超誉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他写作了不少反映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诗篇，表现了强烈的维新救国思想，堪称一代诗史。如他在《赠梁任父同年》诗中写道：“寸寸山河寸寸金，侑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这首写给梁启超的诗，对清廷及朝中投降派丧权辱国的罪行作了抨击谴责，并坦露出要为拯救国家而甘愿献出一切的赤子心迹。黄遵宪多年担任驻外官员，足迹遍及欧美及东南亚，特殊的外交官经历，使他深谙东西方诸国变革的经验，以观天下之眼界及心得审视国内时势与痼疾，自有其独到的体味与深刻见识。他在罢官一年后于《已亥杂诗》（之二）中吟道：“移桃接李尽成春，硕果花浓树愈新。难怪球西新辟地，白人换尽旧红人。”此诗表面上看似写美洲开辟，通过变革得以成功之事，实则借美洲变迁而暗讽国中朝野之保守势力，虽字面不求论理而理趣自现，读后发人深思。

在艺术方面，黄道周系晚明书法名家。他在书艺上颇富创造精神，隶书自成一家，行草笔意离奇超妙。所作《五言诗轴》，线条映带飘逸，笔画方峭沉实。黄慎系清代著名画家，“扬州八怪”之一。家贫，以卖画为生。人物、山水、花鸟画无一不精。人物画初学上官周，后受怀素狂草启发，遂将狂草笔法带入画中，用笔纵横，气势雄伟。多以神仙故



黄慎《苏武牧羊》

事、文人士大夫生活为创作题材，有时亦画市井众生。其山水、花鸟画亦是用笔奔放，颇富生趣，风格与人物画相同。

自辛亥革命至今的百余年间，众多黄姓人士，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中华崛起的宏伟大业，拼搏奋斗，矢志不移，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作出了重要建树，他们中有：

黄兴，系杰出的中国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时期武装起义的重要组织者和指挥者。青年时代便立志推翻清王朝。1903年在家乡湖南长沙组织华兴会，任会长。翌年秋，策划长沙起义，事泄后出走日本。1905年在日本协助孙中山创建中国同盟会，任执行部庶务，成为仅次于孙中山的同盟会领袖。在辛亥革命时期，时人多称其为黄克强，并将他与孙中山并称为“孙黄”。此期，黄兴将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武装起义方面。1907—1908年，他相继参与或领导了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和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27日，他与赵声领导发动了广州黄花岗之役。是日，黄兴亲率敢死队130人攻入总督衙门，并分路与大队清军展开激烈巷战。起义军浴血奋战一昼夜，终因敌众我寡，伤亡过重，被迫退却。上述起义虽均遭失败，但却使清廷屡遭重创，且进一步唤起了广大民众的觉醒。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被任命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指挥汉口、汉阳保卫战。苏、沪、杭等地光复后，他被多省都督府代表会议推举为大元帅和副元帅代行大元帅之权，但均未赴任。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临时政府北迁，他任南京留守。当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破坏民主共和时，黄兴旋即随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日本。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在入党时按指印，宣誓服从孙中山的命令，黄兴认为此举不妥，拒绝加入。是年夏，他离日赴美。在美期间，仍积极策动讨袁斗争，与孙中山呼应。1916年袁世凯死后，黄兴回到上海，不久病逝。

黄公略和黄克诚系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黄公略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后参加北伐和广州起义。1928年，他与彭德怀、滕代远一起领导平江起义。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前委候补常委，他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显示了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干。1931年9月在江西吉安遭国民党军飞机轰炸牺牲，年仅33岁。

黄克诚系人民解放军开国大将。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曾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八路军二纵、四纵政委和五纵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中共苏北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东野第二兵团政委，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屡建勋劳。作为共和国十大将军之一，黄克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相继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作为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为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因支持彭德怀的正确意见，反对大跃进运动中“左”的失误，而被作为所谓彭、黄、张、周“右倾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文革”中又遭到残酷迫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出任刚刚恢复、组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邓颖超和胡耀邦分任第二书记和第三书记），主持中纪委日常工作。在历史新时期，黄克诚有两件大事引人注目：一是不计前嫌和个人恩怨，正确评价毛泽东。1980年，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对待毛泽东有过激看法倾向的问题，黄克诚适时发表了长达1.3万余字的长篇讲话。他联系历史事实，讲述了毛泽东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在领导革命斗争中所建立的他人所不可比拟的不朽功勋，对毛泽东在巩固人民政权、领导三大改造的正确决策，亦作了充分肯定。对其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及其原因，也联系当时的客观实际和历史背景，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总结与分析。指出，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既要扬弃毛泽东在建国后一些错误的理论和错误实践，又要坚持其正确的内容，通过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面光辉的旗帜上写下新的篇章。黄克诚这篇讲话，是他晚年政治生活中所做的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一件事，这篇讲话对稳定当时局势，澄清错误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和积极作用，是代表了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毛泽东评价的官方意见。二是作为中纪委主要负责人（他先后担任中纪委常务书记和第二书记），黄克诚将其晚年的主要精力放在抓党风廉政建设上。他先后参与起草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等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发生在某些高级干部身上的不良之风，给予了严肃批评和处理；对重大的违纪案件更是坚持排除阻力，一抓到底。如1980年“渤海二号”钻探船遇沉、造成75人死亡的特大事故发生后，他及时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了处理意见。最后，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国务院分管副总理和石油部部长分别给予了相应处分；对一些地方搞新的个人崇拜的现象，黄克诚也提出严肃批评与整改建议，使这一苗头性倾向得到及时纠正。

此期，在其他领域卓有建树的黄姓人士还有：黄瑞纶，著名农业化学家。作为中国农药事业的创始人和农药残留研究的前驱者，他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如在灭蚕蝇研究方面获得国家创造发明奖。黄耀曾和黄鸣龙都是著名的有机化学家。黄耀曾为发展中国的氟塑料、氟表面活性剂及核武器中使用的高爆速塑料粘性炸药做出了特殊贡献。黄鸣龙改进的基希纳-沃尔夫还原法，被称为“黄鸣龙还原法”，为世界各国广泛使用。他还指导用新方法合成可的松与地塞米松及甾体口服避孕药，被誉为中国甾体激素药物工业的奠基人。黄昆系著名物理学家。1947年，他提出固体中杂质缺陷导致X射线漫散射的理论，1950年，与A.里斯一起提出多声子的辐射和无辐射跃迁的量子理论。翌年，又提出晶体中声子与电磁波的耦合振荡模式。作为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他为建立中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与培养该学科的技术骨干队伍，做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被瑞典皇家科学院聘为国外院士。黄文熙是著名水工结构和岩土工程学家。作为中科院资深院士，他对水工结构和岩土力学有重要贡献。他创立的由实验资料确定土的弹塑性数学模型，于198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他参加了中国许多重大工程的咨询工作，为这些工程的科学



黄宾虹画作

立项与实施，做出了特殊贡献。黄文弼系著名考古学家。他曾多次赴新疆，对高昌古城、交河古城、雅尔湖故城等遗址和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弄清了楼兰、龟兹等古国及一些古城的位置与演变情况。黄宾虹系著名绘画大师。他师法前人，兼采众长，屡经变革，自成一家。中年后画风苍浑清润，晚年尤精墨法，创“五笔七墨”之说，所画山水墨气淋漓，具有浑厚华兹的神貌。对画论画史尤有精研，见论精辟。黄自系著名作曲家。其代表作有管弦乐《怀旧》和电影音乐《都市风光幻想曲》、康塔塔《长恨歌》以及歌曲《点绛唇》、《南乡子》、《思乡》、《花非花》等。“九·一八”事变后创作的《抗敌歌》、《旗正飘飘》和《九·一八》等歌曲，在群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被广为传唱。



状元手

——散记韩相珍

刘凤才

2003年元月，临沂市人民医院为激励全院外科医生学习先进，开拓进取，开展了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评选“手术状元”活动。经综合评选，在当时的数百名外科医生中，仅有5人“金榜题名”，韩相珍的名字赫然列在其中。而这双“状元手”，恰恰又是专门医手的。俗语道：“画虎难画走，画人难画手”。要让我这一双拙而笨的手，去刻画全市手外科学会主任——韩相珍的这双“状元手”，确实不敢轻易“下手”。然而，我又偏偏遇上了一个子曰“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君子。韩相珍这位手上功夫堪称一绝的专家，却不擅嘴上功夫，而且见人总是一脸腼腆，象个规规矩矩的老媳妇。与之交谈，他只讲简单地讲了几个医案，讲了老百姓有病是多么不容易，讲了孩子们得了病是多么让人心疼，几乎没谈自己的多少“英雄事迹”。无奈，只得从所了解的一鳞片爪中，为之作一个“散记”。



填补空白成“高手”

“状元手”的由头很早，迄今已近40年；起点很高，是全国的“榜眼”。

韩相珍的杏林生涯，开始于“我们都是向阳花”年代的“赤脚医生”。1974年，他从平邑三中高中毕业。村支部见这个后生忠厚本分却十分内秀，于是让他当了赤脚医生。他认认真真地参加培训，闷不作声地埋头自学，全心全意为广大贫下中农服务。没用多长时间，象感冒发烧、腹泻肚疼、跌打损伤等常见毛病，他都可以搞定摆平。大家都夸他是毛主席的好青年，贫下中农的贴心人。这让他很有成就感，从那时就坚定了此生要当一个老百姓的好医生的“革命理想”。当然，他没想到将来要成为医行的大专家，因为那时专家还是“臭老九”。

时代开始拨乱反正，正本清源。1978年，他考入山东医学院医疗系。这给他实现人生理想扎上了强劲的翅膀。想到那些缺医少药的乡亲们。他把理想与理解全部变成学习的动力，恪守着“学海无涯苦作舟”的古训，分秒必争、只争朝夕地苦读深研。五年寒窗，终于“梅花香自苦寒来”，学业大成。毕业前，全国医学院校举行统考，韩相珍一举夺得全国第二，荣登“榜眼”。同时，他又向老师和同学们交了一份人生答卷：“潭深波浪静，学广语声低。”

1983年，韩相珍毕业后分配到地区人民医院。院领导为加强一级科室的力量，把这位本科高材生安排在放射科，1985年转到骨科。这一“转”，让“榜眼”一跃而成了“状元”。

韩相珍进入骨科时，院中尚未开展断指再植术。一个1000多万人口的大市，2000多万只手，两亿多手指。尤其是工农战线，每双手、每根指头每天都可能在为改革开放、振兴沂蒙而忙碌，受伤致残绝对是大概率。一个泱泱大区的最高医院，没有断指再植，怎么能行呢？填补这个空白，时不我待，迫在眉睫。于是，院领导决定在骨科抓紧开展断指再植术。为做好前期技术准备，在骨科专门建立了动物实验室。对挑选从事这项新技术的人员，科主任老汪几乎没费斟酌，第一目标就选定了韩相珍。韩相珍把领导对自己的信任作为极大鞭策与鼓励，把全部精力用在了断指再植技术的学习钻研中。白天，他坚持正常上班临床。到晚上，他就一头扎进实验室。他在兔子耳朵上苦练再植，在大白鼠的断尾巴上练习小血管吻合，翻来覆去，反反复复，不觉枯燥，不知疲倦，常常是通宵达旦。这一练，就是3个月近百天，从未停顿间断。

就在他对能否应对临床实战挑战还不敢完全肯定之时，挑战就上门了。

韩相珍所做的第一例断指再植患者，是个16岁的少年，在帮着大人铡草时一不留意，一根食指的末节全部被切断。手术并不算大也不算难，再植吻合手术很顺利，似乎“一炮打响”。然而，凡是“第一”必定不会一蹴而就，一帆风顺，都会伴生着一波三折的故事。果然，再植的断指很快出现了一根静脉回流不畅，紫红肿胀，如不及时恰当治疗，这“第一例”就会宣告失败。韩相珍面临新的考验。反复考量，决定采用放血方法。整整一个星期，他完全成了一个“陪床”，一天24小时盯在患者床前，每隔两三个小时就亲自为患者手指放一次血。工夫不负有心人。患者终于痊愈，韩相珍终于渡过了难关。

新手出马，首例手术，意外考验，终于成功，填补空白。这几个关键词，充分说明韩相珍在潜质里注定是个未来“高手”。他的“处女作”，在院里爆了一条新闻，给大家一个惊喜。此例手术当年获得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也开始确立了他在手外科的地位。

1990年，韩相珍到青岛401医院全军手外科中心进修学习了8个月，进一步掌握了显微外科技术。回院不久，便遇到了一位患病30余年的胫腓骨慢性骨髓炎病人，其右小腿严重溃疡，流脓流水，长期不愈，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及劳动。韩相珍用显微外科手术，对其

伤口进行了彻底清创，去除坏死的骨质及软组织，游离移植了胸脐皮瓣，吻合了血管，覆盖了创面。半个月后，患者痊愈出院，3个月后完全恢复了日常生活与劳动。

韩相珍的技术日臻成熟，面临的挑战与考验的难度系数也日益加大。

2006年夏季的某个黄昏，手外科来了一位十万火急的急诊。伤者是某印刷厂的青年工人，可能是干活儿时走了一下神，“咔嚓”一下，切纸机象恐怖的老虎口，一下将他十指中的八指切了下去，有七指从中、末节一刀两断，一指被咬去末节肌肉。这是韩相珍也是本科遇到的第一例数量最多的断指伤。当然，此时他已经完全有能力有把握应对。他胸有成竹，镇定自若，迅速在全科组织起七八位医护人员，分成三组，分别进行清创、标记、吻合，有条不紊、紧张有序地实行手术。整整16个小时。第二天早上，他们迎着朝阳将患者推出手术室时，宣告了手外科又一纪录的诞生。手术完全成功，断指全部成活。

从1985到2006，21年；从第一例、一指再植，到七指再植，韩相珍从一名年轻手外科医生成长为大名远播的专家。今天的他，已担任着山东省医师协会骨科分会副主任，省骨科及中西医结合等学会委员，华东六省一市手外科委员，山东省手外科委员，市手外科学会、手显微外科研究中心主任，市北院副院长兼骨科主任。先后被临沂市委、市政府授予“临沂市跨世纪青年科技人才”，评为省卫生系统技术能手，市党外优秀知识分子，院最佳医生与手术状元、医德医风先进个人等等。临床30多年，他成绩斐然，在手外科及显微外科上独树大纛，共进行断指（肢）再植800余例，成功率大于97%；拇手指部分再造17例，全部成活；各种带血管蒂皮瓣转移和游离移植187例，成功率达99%。能够熟练进行手内在肌功能重建技术、周围神经吻合术、肌腱吻合术等，并把显微外科技术熟练运用于骨科。他还擅长各种复杂骨折、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滑脱、椎管肿瘤、骨结核，人工关节置换、骨肿瘤保肢治疗等疾病的治疗。

“高手”之美誉，韩相珍当之无愧。

起死回生之“妙手”

“高手”之“高”，是一种能力水准，指“常手”所不能及者。而“妙手”则是一种境界，妙在能使枯木逢春，起死回生，把看似不可能的变成可能。韩相珍具有这种境界。

1988年夏天，费县一位有点冒失的青年，开手扶拖拉机时不慎翻进路沟，左小腿被砸成重伤。送到县医院，不能收治，急忙又转到市人民医院。正在值班的韩相珍立即为其作了诊断，属于严重挤压伤，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整个下肢已大部离断，伤口参差不齐，沾满尘土泥沙，污染十分严重，按常规基本不能再植，即便再植也全然没有把握，唯有截肢。青年的母亲紧紧抱着孩子血肉模糊的伤腿，“扑通”跪于韩相珍面前，哭求声让他撕心裂肺：“俺家就这么一个儿子，以后全家的活路都得他干，今后的日子还得全靠他呀！大夫你行行好，怎么也得给孩子保住这条腿呀！”韩相珍再也没有犹豫，立即组织实行手术，从清创、标记，到用钢板固定断骨，再做血管移植，吻合神经血管肌肉，整整7个多小时，尽上了最大努力，终于再植成功，保住了青年这条原本不可能保留的下肢。孩子的母亲又禁不住跪在了他的面前。秋收时节，已经能拄着拐杖行走的青年，陪着母亲，带着花生栗子，专程远路赶到医院，向韩相珍表示感谢。韩相珍万分感慨地对同事们说：“老百姓自古有上跪天下跪父母的说法，可是人家为什么给我们下跪？还不是因为我们尽了一点应尽的义务。这样的大礼，我们受之有愧啊！”

1996年，平邑一位16岁的楞头楞脑的少年，扛麻袋时导致寰枢椎半脱位，造成四肢高位截瘫，大小便失禁。科里在对其进行牵引复位治疗过程中，因其呼吸肌麻痹，数次导致呼吸严重困难，两次窒息，生命垂危。韩相珍及时对其实行气管切开抢救，保住了患者生命，然后又对其实行恢复治疗。其间，恰巧省里来了一位青年志愿者专家。在观察了患者

病情后，他下了结论：此病人已经完全没有恢复希望，不是无治而亡，就是终生瘫痪。面对“权威”对患者的“死亡判决”，韩相珍没有放弃对病人的治疗，而是更加精心，更加科学。奇迹发生了。一个半月后，患者身体开始部分活动；半年后，四肢能够活动；一年后，能够站立行走。现在，他早已在外打工，娶了媳妇，生了孩子。年前，韩相珍回老家探亲，仍然没忘记这位“死而复生”的小老乡，专门绕路前往其家看望，把其家人感动得涕零俱下。

“运乎之妙，存于一心”。为文如此，为医尤这样。韩相珍之所以能成妙手，关键在于他心系病人。同时，为了更好地治病救人，他又时刻心系“高妙”，努力寻求治疗上的新理念、新技术，为病人服务。他曾到德国柏林Helios医院、奥地利维也纳Gersthof骨科医院学习培训，到澳大利亚、港台地区多家医院参观学习。在治疗骨肿瘤上，他及时引入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瘤段切除保肢技术”，进行深入研究与实践，采用早期化疗、瘤段切除灭活回植或大块异体骨植骨或人工关节置换、术后化疗相结合的术式，从而保住患者肢体，提高生存质量，并使5年以上生存率达到了60%以上。在韩相珍为之手术的患者里，河东区一位患股骨上端肿瘤的女青年，至今已健康生活7年；目前健康生存四五年的若干例。

2005年，韩相珍收治了一位全身下体主要关节罹患类风湿的年轻患者，其双髋、双膝、双踝6个关节相继发病，疼痛难忍，行动困难，基本失去了工作与生活自理能力，十分悲观绝望。韩相珍一边鼓励她，一边为其分阶段实行治疗，一直坚持了7年，先后为患者做了双膝、双髋置换和双踝融合术，使之终于完全康复。患者根本没有想到，自己都已失去了信心与毅力，韩相珍作为一个大专家，能坚持这么多年为她治疗，感激之意无以表达。至今，韩相珍与同事们共实行人工全髋关节及膝关节置换术260余例，均取得了良好效果。

这些年，韩相珍在核心期刊共发表论文7篇，获市科技进步二、三等奖6项，其所创造的“椎体肿瘤切除人工椎体置换术”还填补了市内空白。

诚心出妙手，妙手出硕果。交谈中，韩相珍谈起省某大报的一位学者，虽未谋面，听到他的事迹，主动为他题写了一副对联转交与他：“心悟手从竞智巧，柳叶神飞释膏肓。”我不得不佩服大学者之学问，一下就点化出了“妙手”的真谛，而且精巧用典。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韩相珍不正是用自己的这双妙手，为无数患者剪除了严冬，裁出了生机盎然的生命之春吗？



扶贫爱幼紧“牵手”

为了救死扶伤，韩相珍的一双仁慈之手，曾经对无数患者做过紧紧的“牵手”，把他们从伤残甚至死亡的边缘挽救回来。但是让他心中最牵挂、握得最紧的，是那些最需要救助的贫困患者和伤残儿童的无力之手。

1993年，他参加了上级组织的医疗扶贫，来到平邑县卞桥镇卫生院。乡亲们听说来了市院的大大夫，还是老乡，纷纷慕名而来，找他看病治病，其中有许多不是骨外科疾病，而且当时镇的手术条件也远非市医院能比，有些手术未必能做。但是他不忍乡亲们满怀期望而来却失望而去。只要可能，他都力所能及、想尽办法给予认真细致的治疗。因为找他看病的太多，他基本上天天守在镇院，顾不得回家看望一下。半年时间，在这个乡镇小医院里，他亲自主刀，为各种疾病患者做了80多台手术。他给乡亲们留下了一片爱心，被评为全市支农先进个人。

儿童肢体残疾特别是先天残疾，如脑瘫导致的肢体瘫痪、先天性髋关节脱位、小儿马蹄内翻足、多指畸形等，是孩子的最大不幸之一，直接关系到小小生命的生存与成长。电视上报道的一则真实故事，至今让韩相珍揪心长叹：一位年轻母亲所生的两个孩子，都患有脑瘫，母亲天天背着两个残疾孩子生活，终于不堪重负，痛不欲生，竟然将两个孩子一起溺死，然后自杀。母亲虽经抢救活了过来，又被判刑。让韩相珍得到极大安慰的是，自2009年起，国家、省、市三级残联等部门，联合启动了国家残疾人事业专项彩票公益金康复项目——“贫困肢体残疾儿童矫治手术”，而韩相珍领导的骨三科，正是此项目定点医院的定点专科。韩相珍既为残疾儿童们的幸运感到欢欣，更感到了自身的责任。他带领全科同志，积极行动起来，把党和政府的热情关怀，通过自己的双手，送给残疾儿童。他们科当时不仅承担着本市、还承担着日照和潍坊两市的扶助任务，患儿多，任务重，要求严。他绝没感到是包袱，反而当作政府的信任与群众的信赖。科里准备了专门病房，作为“患儿之家”，为孩子们提供最好的服务。患儿随到随收随查随治，不耽误一分一刻。有些患儿进行手术后，还对其进行精心的康复治疗。在韩相珍带领下，全科同志纷纷向患儿们伸出温暖之手，给孩子们买玩具，赠书本，捐衣物，送食品，倍加关怀，无微不至。3年时间，他们共为249名病患儿童进行了手术，全部成功。看着孩子们日益健康成长，韩相珍和同志们都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从不知倦乃“圣手”

在韩相珍30年的外科生涯中，1992年夏季那“一天”，是他记忆最深的：因为那不是一天，实际是两天一夜，准确地说是40多个小时，他一直在高度紧张地、一台连一台地手术、手术……从头上上班起，他就进了手术室，做了几台，记不清了。紧接晚上值班，没等坐下，来了急诊，随即又进了手术室，标准的“通宵达旦”。第二天上午，又来了急诊，手术；下午，还是急诊，还要手术。直到半夜，他才终于喘了一口气，是被人架着还是抬出的手术室，也记不得了。其间，只用最短的时间草草地吃了两顿饭。

或许有局外人不太相信韩相珍这种“连轴转”的本领。那就例举一“折”。同年夏天，某印刷厂车间主任大约是为了加班加点，亲自上阵干活，不料机器“认生”，竟然将这位主任的一只手一下子齐刷刷从手腕部斩了下来。送到手外科时，是下午两点。厂长爱将，亲自把患者送来，竟然也膝盖一弯，跪于地上，苦苦央求韩相珍：务必要保住患者的手。还无意“将”了韩相珍一“军”：都知道您是大专家，肯定能行呀！韩相珍根本听不进也听不懂这种语言，他只知道尽自己的职责，尽最大的努力，把对患者所能做的做得最

好。手术中，仅手掌需要吻合的肌腱，就有20多条，他一一认真细致地吻合。就这一例手术，就用了7个小时。半年后，患者之手功能完全恢复，而且与韩相珍成了至友。

在医院，韩相珍是公认的“大专家”，又是无人不知的“老黄牛”。大家在提及他的时候，甚至更喜欢和习惯于用“老黄牛”作为对他的敬称，后面的注脚是：“这是个就知道干活的人。”多少年来，每一天，他几乎都要进行手术；每一台手术，都几乎需要数小时有的甚至是十几小时；每一台手术后，有时往往又需要紧接进行下一台手术。这种“天天干、连轴转，不分昼夜、没有上下班”的状况，他早习以为常。他当然常常会感到极度疲惫，当然也需要必须的休息。但是，第一，他深知病人需要他，患者等不得，他更不能让患者等。第二，他深知“业精于勤荒于嬉”，作为一个专业的外科手术师，必须坚持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

马克思主义认为，手既是劳动的产物，也是劳动的器官。既然是人的器官，正常的人手肯定知道劳累，知道疲倦，需要休息。而对韩相珍这双为了病人、为了事业，从不知辛苦滋味的手，我们只能怀着尊敬，称之为“圣手”。

甘当人梯做“扶手”

在业内及患者心目中，韩相珍技艺超群，医德高尚，可谓德艺双馨。但在同事们心目中，这位大专家、老黄牛又是一座“人梯”，他是大家成长进步的一副真心诚意、心甘情愿的“扶手”。

多数儿童生性活泼好动，溜滑梯，蹦蹦跳，你推我，我绊你，结果乐极生悲，一个小摔倒，“咔嚓”，就酿成了小儿“肱骨髁上骨折”的常见伤，手外科平均每年都要接治这样的患者200多例。孩子伤疼，大人心疼，原来的切开治疗方法也疼。2007年，科里一位青年医生去天津医学院进修，引进了先进的“闭合整复经皮克氏针固定方法”，治疗此类骨伤，使用微创手术，不用切开，减少了孩子的痛苦，节约了大人的开支。他向韩相珍一汇报，立即得到主任的大力支持，在科里大力学习推广这项技术。迄今已治疗400多例，取得了“孩子不哭大人无忧”的良好效果。

他是一位好老师，承担着山医大等省内多个医学院的本科生的教学工作，还被滨州医学院聘为副教授。多年来，他共培养进修医师57人次，实习生242人次，可谓桃李满天下。

1999年，骨三科成立时，只有一个科，十几个人。在韩相珍的带领下，业务范围不断扩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特色品牌不断增多，成为我市唯一集手足显微外科、小儿骨科、骨肿瘤科于一体、为特色的专业科室。配备了德国、美国生产的先进仪器设备，常年与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小儿骨科、手足显微外科医生交流合作，整体技术水平达到省内先进。在开展多指离断、手指末节离断、小儿断指（肢）再植、拇指旋转撕脱伤再植、拇指再造等方面，年完成再植手术平均200多例，成活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时至今日，科中人员已达到70多人，科内的特色专业业已形成规模，韩相珍的得意门生们，每个人也都能独挡一面，挑起大梁。为适应发展的需要，院领导决定，骨三科一分为五，独立成五个科，可谓根深叶茂，生机蓬勃，前途无限。看到这种形势，韩相珍发自内心的高兴。

当然，这位当年的“状元手”，也开始了一个新起点。新年伊始，这位荣誉满身的专家，又获得一份新的重要荣誉，被评为“全市十大杰出医生”。这是对这双“状元手”的总结肯定，也是一个新的激励。跟他聊到此处，这位老实人极为认真地观望了一下自己的双手，一付摩拳擦掌的模样，似乎已经着手开始创造新的篇章了。

临沂市旧志考述 (中)

解修丽

二、历代修志概述

1、《沂州志》及《临沂县志》

《明史·艺文志》有载：“舒祥，沂州志四卷。”此处所记《沂州志》未见于其他史书，故无从考证。舒祥，明新安（今属河南）人，生平不详。在志中收录了舒祥的十首诗，其中有《琅琊八景》八首，另外还有《登晒书台》一首和《王祥墓》一首，这十首诗都是对临沂地区风景名胜的描写，这或许至少可以说明舒祥对临沂是比较熟悉的，主持纂修《沂州志》有一定的可信度。

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山东地方志联合目录》、《山东地方史志纵横谈》及《山东方志汇要》等文献统计，共有《沂州志》四种、《临沂县志》两种。两种为明代纂修，另外四种为清代、民国纂修；其中有目无书者一种，现存世者五种。

明嘉靖年间，沂州知州龙山（今济南历城区）人何格主修《沂州志》四卷，王宗性（郡人）纂，此志已亡佚，仅有王宗性于嘉靖辛亥所撰志序录于《（万历）沂州志》内。

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沂州知州徐汝翼纂修《（万历）沂州志》十卷，还有15人参修、刻本。卷首有徐汝翼《重修沂州志叙》，还有嘉靖辛亥郡人王宗性撰旧志序。凡例8则。图考列有禹贡周官山川之图、尧王封建国邑之图、沂州总图、沂州城境之图、署图、学图、郯城县图、费县城图。志目为：卷一图考、沿革、星野、灾祥附、疆域、形胜附、山川、里社、市集、风俗、土产；卷二城池、公署、学校、书院附、秩祀、祠庙、寺观附、兵防、恤政、邮铺、桥梁、坊表、陵墓、古迹；卷三田赋；卷四州县、教职、监司、武职；卷五征辟、进士、举人、岁贡、武科、例监、省祭、封荫；卷六宦迹、人物上；卷七人物下、孝义、贞烈、藩封、帝迹、后妃、仙释；卷八宸翰、艺文上；卷九艺文中；卷十艺文下、奸雄、杂志。卷后有训导孤竹康世亨、滇南王皋于万历戊申撰跋及古郢李应赐撰《重修沂州志后序》。明天启年间增补重刻万历志，在卷前录有天启年间“御乱平寇纪略”两篇，记载了天启年间徐鸿儒农民义军斗争的史实，可补他志之缺，为考证徐鸿儒农民义军的斗争提供了宝贵资料。此志是现存最早的沂州志书，国内已经没有全本，原刻仅在北京图书馆藏有孤本，缺第九卷，内亦有一部分字迹已模糊不清，难以辨认。

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知州邵士修《（康熙）沂州志》八卷，干壤、尚天成等人参修、刻本。版式为四周双边，白口，单黑鱼尾，半页10行，每行20字，小字双行同。卷首有邵士、尚大成、王壘等人撰序，康熙十一年礼部奏疏，兖州府帖文，州图七幅。凡例10则。此志总目称“部”，全书分入部，其中人物部和

艺文部分上下，部下再分四十六目，八卷。志目为一规制部：建置、星野、疆域、山川、藩封、祠庙、秩祀、物产、风俗、古迹；二政事部：户口、地亩、赋役、钱粮、农桑、学校、兵防、驿递、附邮铺、恤典、捕盐；三官常部：职别、衙署、种官、宦迹；四仕进部：科第、制贡、例监、杂职、武科、胥弁、封荫、诰命、坊表、陵墓附；五人物部上：帝后、名献；六人物部下：忠贞、孝义、节烈、懿行、流寓、隐逸、仙释；七艺文部上：沿革、附文传；八艺文下：赋、诗、遗文、杂志。

清代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沂州升为沂州府，府治兰山，辖一州六县，辛亥革命后废府，因为仅清代是“府”，所以沂州府仅在清代乾隆年间修一种府志，即《（乾隆）沂州府志》，由沂州知州李希贤纂修于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李希贤，字复庵，四川长寿人，拔贡出身。清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任沂州府知府。他上任之初，“取州邑之志而观之，或繁而未提其要，或简而未悉其详”，感到难以为用，便于1754年秋调集人员，亲自主持纂修《沂州府志》，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年刊行。全志凡36卷，填补了沂州无府志的空白。此志体例采用两级分目体编写，为通记体。先分为十六大门类（山东按察使沈廷芳撰序记为十五门），下辖六十细目，记事范围贯通古今。此志门类完备，编次有序，各门首有小序，总述门类，之后按所属州县分记，总述分记融为一体。很多类目关及国计民生，如舆地门之水利目，食货门之盐法目等，讲求实用，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春，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南巡，召见李希贤询问情况，对他予以褒奖和赏赐。

民国时期，临沂府、州均废，改兰山县为临沂县，属山东省济宁道，修撰有《临沂县志》两种。第一种《临沂县志》由前后三任知县沈兆祯、陈景星、杨孝则督修，费县人王景祐总纂。于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刻成，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又有此志铅印本。卷首有知县沈兆祯、杨孝则等人的五篇志序及沈兆祯所书详报修志书文一篇，还有舆图城区略图等五图。志目为：卷一疆域、通纪；卷二山川、古迹；卷三民风、物产；卷四秩祀、教育、宗教；卷五食货、建筑；卷六登进；卷七藩封、职官、宦绩；卷八兵防、警察、交通；卷九至卷十一人物；卷十二金石、著述；卷十三艺文；卷十四杂志。此志虽是民国志，实际上是续《（乾隆）沂州府志》，主要记清代史实，所以仍然属于旧志。第二种《临沂县志》由临沂县长范筑先纂修，十七卷卷首一卷，于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刊印发行。范筑先于1933年至1936年担任临沂县长，期间主修并兼总纂《续修临沂县志》。志前有范筑先、李宗仁、庞作梁等人撰序五篇，凡例七条。全书体例分图、表、记、志四部分，志后附志外编。志目为：卷一图（临沂县全图、城关图、交通图、名胜图等）；卷二表（疆域沿革表、职官表等）；卷三大事记；卷四舆地志；卷五党务志；卷六至卷十一为政务志；卷十二司法志；卷十三民社志；卷十四文献志；卷十五艺文、著述、金石；卷十六人物；卷十七烈女、志外编。此志存本很多，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图书馆及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皆有藏本。

2、费县县志

费县历代修志共有七种，其中三种为明代纂修，这三种皆已亡佚，另外四种为清代纂修，皆有存本。

费县修志的历史，源远流长。据《（光绪）费县志》载，金正隆年间，张万公任费县主簿，在《费侯闵子祠记》中云：“初予举进士，筮仕兹土，览《费志》，乃知费为闵侯恭桑之乡。”这说明在金以前可能就已经有《费县志》。

明嘉靖年间，有王圭峰主修费县志两卷，山东通志录此，但已不存，无可考。

明万历年间，山西阳曲人杨果任费县知县时，主修费县志八卷。杨果，字汝实，号槐全，以吏员起家，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以特荐知县事，当时费、承民生凋敝，杨果施行一系列有利于民的政策，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百姓很爱戴他，为他立生祠祀之，有

杨公生祠碑。是志早佚，仅见万历教谕宿州施伯祚撰志序录于《（光绪）费县志》，其余不可考。

明崇祯年间，有费县知县汪桂茂纂修费县志，后志提到曾纂有此志，早佚，其余不可考。

清康熙年间，江南南陵举人黄学勤任费县知县时，组织邑教谕李瑞、王玉等十六人，撰修《费县志》十卷，于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刻印，发行较广，为现存最早的一种志书。此志卷首有按察使李炜撰序；费县儒学训导王玉题跋；详文；纂修姓氏；凡例十一则，费县志图说，包括四境图、城廓图、县治图、学宫图。目次为卷之一地理志：沿革、星野、疆域、形胜、山川、风俗、物产、古迹、陵墓；卷之二建置志：县治、城池、学宫、县署、公署、县属、库仓、街道、牌坊、社学、义学、学田、里社、市集、镇店、铺舍、桥梁、公圃、典恤；卷之三宦师志：名宦、知县、县丞、典史、教谕、训导；卷之四赋役志：丁口、地亩、起运、存留、仓粮；卷之五秩祀志：文庙、坛祠寺观；卷之六科贡志：征辟、进士、举人、贡士、例监、乡宦、封荫；卷之七人物志：世官、名献、侯封、孝子、后妃、节妇、烈女、乡贤、德义、仙释、流寓；卷之八至卷之十文籍志：宸翰、艺文、诗章，共八门，内辖六十二目。此志重点在接古上，汇集古文，存有很多明代佚闻。

清康熙年间还有一种费县志，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此志为朱约纂修，八卷，清康熙间刻本，此志纂修日期已不可考，国内已无全本，仅国家图书馆藏有一册残本，为七、八卷。朱约，江苏宝应人，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副贡，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任费县知县时主修《费县志》，后升直隶晋州知州。卷之七为人物志；卷之八为文籍志：宸翰、艺文、诗章，收有张养浩、颜师古、颜真卿、苏轼、施伯祚等撰文。

清光绪年间，先后有五位知县主修县志，并将《费县志》三次增修续修刻印，广泛发行。《（光绪）费县志》卷前有光绪年间费县知县李敬修、陈荣伦、陈爰、谢曦所撰序各一篇，费县教谕刘宝鼎撰序一篇，还有光绪年间邑人杨佑廷撰志跋一篇。此志共有县图六幅：行宫图、山川图、村舍图、城池图、学宫图、衙署图。卷首为谕旨、恩诏、巡幸、恤典。卷一疆域、村社、风俗、物产；卷二山川，记叙了费县地区境内的山川情况，后附艺文，收有明代蒙阴人公鼐的《东蒙山赋》、清代宝应人朱克生的《蒙山记》、清代沂州知府四川人李希贤的《万松山记》等文；卷三封建、职官、宦绩，封建记录了自周以来至宋费县地区的封建情况，职官表列出了自周至光绪二二十五年的历代职官，宦绩记录了自周以来至光绪十六年的职官宦绩，卷后附艺文；卷四赋役、仓储、恤政，后附艺文；卷五祀典，后附寺观，附艺文；卷六学校，后附书院、义学，附艺文；卷七选举、仕进、封赠、荫袭、人瑞；卷八营汛、铺递、兵事，其中兵事记录了汉代以来历代的兵事，尤以清代的记录为详；卷九城池、公署、街道、桥梁；卷十、卷十一、卷十二为人物；卷十三古迹；卷十四金石，收录了历代金石器物碑碣；卷十五邱墓、牌坊；卷十六祥异、轶事。

费县还有一种乡土志，即清朝末年由邑人李景星根据府、县志，并采集口碑资料，编成《费县乡土志》两卷。此志分上下两卷。上卷为费县历史，包括本境建置年代，本境未置以前及本境既置以后；政绩录有兴利、去害、听讼；兵事录内收有捻军的活动；耆旧录有事业、学问、附载诸祠；本境人类录有汉人、回人；本境户口录；本境氏族录。下卷为地理、山、水、桥、道路、古迹等。记事至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

争议中的“草根明星”：草帽姐

高雪萍



“草帽姐”的名字被大多数人熟知，但是徐桂花这个名字却鲜为人知，因为在舞台上经常戴着一顶草帽，所以徐桂花被大家称为“草帽姐”。家住兰陵县庄坞镇后銮墩村的徐桂花是80后，但她在舞台上的穿着打扮却充满了质朴的农民气息，经常在田间地头唱歌的她，练就了一副好嗓子。

“草帽姐”首次出名是在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的一档娱乐节目中。2012年7月10日，草帽姐身穿碎花衬衣，头顶草帽，与普通农村妇女别无两样，但一开口，声音清脆洪亮。评委笑称，草帽姐穿越而来。草帽姐没有华丽的服装，没有亮丽的外形，但是她一亮嗓子就把所有评委和观众震惊了，光是唱了一首《沂蒙山小调》就把现场所有人的眼泪唱了下来。2012年10月，草帽姐获得了第一季《让梦想飞》的亚军。“草帽姐”一夜蹿红，在百度风云榜热点人物排名中，一度飙升到第二位，成为网络红人。之后，草帽姐的成名之路越走越顺利，获得2013年星光大道年度分赛第五场冠军，进入总决赛前六强。

经过不懈的努力，草帽姐在2013年CCTV网络春节联欢晚会中完成歌曲《我爱你中国》的演出。之后又登上了中央电视台2013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实现了“我要上春晚”的梦想。

随着草帽姐的越来越红，争议也越来越多。有人说她是天使，因为她带着原生态的歌喉和最质朴的梦想；有人说她是噩梦，说她的梦想和一切都是伪装。因为丈夫李超曾经参加过星光大道，对徐桂花的参赛，也有很多人指责她炒作。还有网友说：“李超（草帽姐的丈夫）两口子只是农村唱红白事和在集市上搭台演出的民间演艺人员，演出的内容低俗，其夫妻素质低劣。”

随后，网络上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多，“草帽姐”一时间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

尖。草帽姐清亮的歌喉让很多观众非常疑惑，甚至是怀疑，一个农村的农妇，怎么能唱的这么有感觉呢，她到底是不是个农民？还是借着草根农民这种背景进行炒作？记者带着疑问到了草帽姐的家里进行采访，草帽姐正跟家人一起干农活，挽着裤脚，熟练的剪着大蒜上面干枯的蒜苗和蒜根儿。家里的房子很普通，大大的过道进去，里面是一个小院子，正屋是瓦房，房子里面简单的摆了几件家具，除了稍显破旧的沙发和有些年岁的桌椅橱柜，最让人注目的是一台组装电脑。

草帽姐在正屋门口种了柿子树和葡萄树，她说，自己喜欢种东西，不仅家里地里种满了蔬菜，就连屋顶上都被她种上了西红柿。草帽姐经常穿着拖鞋下地干活，熟悉她的村民都知道，草帽姐干活的时候都喜欢唱歌。“她就是喜欢唱，你走到她屋后头就能听见她唱歌。”

草帽姐的舞台形象固然经过了一定的装扮，但现在的娱乐圈，任何明星都经过装扮，不过草帽姐采取了另类的装扮策略。

徐桂花一开始想上节目唱歌并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自己也只是想唱歌，没有想有更大的梦想，只是自己村子里的学校没有音乐老师，她就跟自己村里人说想要让孩子们唱歌，让村里学校有音乐老师。

徐桂花从小便喜欢唱歌。小学五年，在班里都是文艺委员，升入初中依然是。徐桂花的“声乐之路”，从未有专业人士指导，一直是自己“瞎摸索”，跟着唱片学。没钱买录音机和磁带，她就在暑假里卖冰棍。一个夏天的忙碌换来一抽屉磁带时，徐桂花无比幸福。她喜欢的歌手是才旦卓玛，原因竟然是“不用什么技巧，放开嗓子唱就行”。

可惜，徐桂花初中只上了一年便辍学了。谈起辍学原因，徐桂花依然一脸委屈，“俺爹说小丫头上学没用，钱要供俺哥哥，他当时在上技校，花钱多。”农村孩子的梦想，上学是唯一能够实现的路径，一旦失学，一切便都破灭了。“不让俺上学，俺很生气，一个人偷偷哭，很长时间没和俺爹说话。”接受记者采访时，徐桂花说。

徐桂花的成名是偶然的，也是当代社会支持草根明星的舆论大环境下的必然。无论争议有多大，徐桂花现在还在努力着，也在改变着，期待在将来，她能够更加真诚，正如今年3月初的星光大道上她担任特约嘉宾时所说，“我现在是兰陵县的政协委员，我的责任是传递和弘扬红色沂蒙精神”，希望她能够将沂蒙精神传递给全国的观众，真正体现临沂人的质朴和勤奋。



省史志办副主任刘娟到临沂检查指导方志馆建设工作。1月16日至17日，省史志办副主任刘娟、省方志馆馆长徐盛章到临沂检查指导方志馆建设工作。刘娟听取了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关于临沂市方志馆建设情况的汇报，实地察看了方志馆展厅、阅览室、库房等，对市方志馆建设给予充分肯定，代表省史志向市方志馆赠送了部分二轮省志。

市史志办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3月12日下午，市史志办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朱海涛主持会议并作动员讲话，市委第十八督导组副组长、市纪委监委驻二组副书记沈继丽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市委督导组全体成员、市史志办全体党员和受邀群众代表参加了会议。

朱海涛在动员讲话中指出，开展好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史志办全体党员要充分认识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以整风的精神，着力解决“四风”问题；要深入学习领会中央和省、市委的部署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积极投身教育实践活动；要认真做好每个环节的工作，确保教育实践活动扎实开展；要按照这次大会的部署，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采取有力措施，真正把教育实践活动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沈继丽代表市委督导组对史志办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前期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强调：史志办全体干部职工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切实开展

好教育实践活动。要深入领会并把握“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把学习教育、群众参与、解决问题、整风精神、领导带头贯穿教育实践活动全过程。要找准问题、解决问题，科学安排各环节工作，坚持教育和实践相结合，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市史志办到莒南县、兰陵县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调研。2月27日，市史志办调研员伊永航、市史志办副主任段洪、副调研员王卫东、秘书科科长杨晓莉、一行到莒南县、兰陵县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调研，并召开了座谈会，同志们围绕“四风”问题和史志业务工作向市史志办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临沂年鉴·2014》组稿方案下发。3月3日，中共临沂市委办公室下发《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沂年鉴·2014〉组稿方案的通知》（办字〔2014〕16号）。《临沂年鉴·2014》组稿方案从篇目设置、取材及行文原则，以及图片的选择和稿件的质量等方面对年鉴的组稿编写做出了明确要求。随着组稿方案的下发，《临沂年鉴·2014》的各项编纂工作正式启动。

市史志办传达学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相关文件精神。3月5日，市史志办召开全体人员会议，集中传达学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相关文件精神，会议由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朱海涛主持。会议重点学习了中央领导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临沂重要指示精神。

市史志办参加义务植树活动。3月12日，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带领史志办部分干部职工参加义务植树

活动。在兰山区汪沟镇田家庄村植树现场，市史志办干部职工挥锹挖土，扶苗校正，培土拉提，一丝不苟，合力种下一颗又一颗树苗，在完成既定任务后，还帮助其他单位完成植树任务，共计栽种竹柳40余株。

临沂市首家地方历史学会在莒南成立。1月11日，莒南县地方历史学会成立大会和第一次会员大会举行。市史志办副主任于芹到会致贺词。会议选举了学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事、理事，杨永早当选会长。

《沂水年鉴2012》正式发行。近日，《沂水年鉴2012》正式发行。《沂水年鉴2012》是沂水县第七部综合年鉴，全书设20卷，共56.6万字。该鉴全面、系统地介绍了2012年沂水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发展情况。

《莒南年鉴2013》出版发行。近日，由中共莒南县委、莒南县人民政府主办，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纂的大型资料性综合年刊《莒南年鉴2013》由中国图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沂南县史志办到沂水县交流史志业务。2月27日，沂南县史志办与沂南县界湖镇党委有关人员到沂水县交流学习乡镇志编纂工作。沂水县沂城街道的志书编纂人员介绍了当前志书编纂情况。双方对志书的篇目设置、资料征集、人物的编纂等进行了经验交流。